

摘 译

外国哲学历史经济

上海外国哲学历史经济著作编译组编

7

1 8 7 5

上海人民出版社

摘 译

外国哲学历史经济

一九七五年第七期(总第七期)

上海外国哲学历史经济著作编译组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总发行所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80 1/32 印张 5.25 字数 120,000

1975年7月第1版 1975年7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2171·84 定价: 0.39元

内部发行

目 录

· 苏修的侵略扩张野心 ·

老沙皇的幽灵在蠢动

——〔苏〕齐赫文斯基主编的《中国近代史》一瞥

..... 陶友之 (1)

苏联在巴尔干地区的战略

..... 〔美〕约翰·C·坎贝尔 (8)

苏联和东欧——新路和老道

..... 〔美〕R·G·凯撒等 (28)

· 跨国公司问题 ·

跨国公司剖视 薛 路 (42)

跨国公司：静悄悄的革命？ 〔美〕戴维·C·金 (47)

跨国公司和发展中国家 〔美〕彼得·F·德鲁尔 (67)

追逐利润 迁厂国外 〔美〕米切尔·齐默尔曼 (69)

跨国公司在考验中 〔美〕戴维·W·尤因 (75)

• 历史上的杜鲁门主义 •

杜鲁门主义和希腊	(85)
希腊.....[美] M·D·唐兰 M·J·格里夫	(86)
十五个星期.....[美] J·约瑟	(92)
干涉.....[美] 理查德·J·巴尼特	(112)
希腊人民的控诉.....	(118)

* * *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宪法改革

..... [美] J·M·吉尔森 (125)

修正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的文化勾结

..... [新西兰] 《共产主义评论》杂志 (133)

一只普通的手.....[苏] Y·马拉巴根 (136)

此地无银三百两.....晓 阳 (139)

一九七五年美国老年人的生活

.....[美]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 (143)

伊朗国王巴列维的雄心.....[日] 笹川正博 (147)

苏联出版动态..... (163)

苏修的侵略扩张野心

老沙皇的幽灵在蠢动

——〔苏〕齐赫文斯基主编的
《中国近代史》一瞥

陶 友 之

苏联的一个所谓“汉学家”，也是苏联外交部的一个司长，姓齐赫文斯基的，在一九七二年主编了一本《中国近代史》。该书一出笼，《真理报》等苏修报刊就肉麻地大肆吹捧，说什么这本书是“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令人信服而明确地写成的”，是“促进苏中两国人民更能彼此了解和相互友好”的“巨著”。但是，人们一翻开这本所谓“友好”的“巨著”，迎面扑来的却是老沙皇侵略中国的魔爪。原来，这是一本全面地、系统地伪造近代历史，百般美化老沙皇的侵华罪行，疯狂地反华反共反人民的大毒草。

这里，仅仅辑录了书中捏造的老沙皇对中国人民的一些所谓“友好业绩”，并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有关论述加以对照；从这个对照中，人们可以看出苏修叛徒集团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紧跟老沙皇侵略脚印的丑恶面目。

老沙皇跟中国的关系，是否和“西方列强不同”？

亚洲三个国家，即中国、
土耳其、波斯，现在被日、俄、

在对中国的关系上，俄国
政府与西方列强不同，它奉行

英、法这四个进行“解放”战争的强盗弄得四分五裂。

列宁：《论欧洲联邦口号》，《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707页

尼古拉二世则更进了一步：现在沙皇不仅是欧洲的宪兵，而且是亚洲的宪兵，他力图用阴谋、金钱和最野蛮的暴力，把土耳其、波斯和中国的一切争取自由的运动镇压下去。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选举纲领》，《列宁全集》第17卷第478页

老沙皇是侵略中国领土还是“收复失地”？

俄国的努力决不只限于发展这种陆路贸易。它占领当今中国统治民族的故乡——黑龙江两岸的地方，……

马克思：《俄国的对华贸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页

另一种政策，致力于建立友好睦邻关系。

（齐赫文斯基主编《中国近代史》，一九七四年中译本第128页）

俄国不同于英国和法国，它在十九世纪中叶继续同中国保持着睦邻关系。

（同上书第228页）

俄国移民对黑龙江流域的经济开发，他们所建的大小城镇和塞堡，引起了当时只控制着满洲南部不大一片土地的清朝当局的不安。清朝将领为了把势力扩展到那些向俄罗斯国家缴纳皮毛税的毗邻部落（鄂温克、达斡尔、杜彻尔等部），在十七世纪五十年代多次发兵攻打小股的哥萨克队伍。

（同上书第72页）

正当英法两国的海陆军向香港调集的时候，西伯利亚边防的哥萨克部队却缓慢地、然而继续不断地把自己的驻屯地由达呼尔山移向黑龙江岸，而俄国海军陆战队则在满洲的良好的港湾周围设立堡垒。

恩格斯：《波斯和中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页

至于俄国，它的地位就完全不同了。它除了分沾英法所得的一切明显的利益以外，还得到了黑龙江沿岸地区，这个地区是它悄悄地占领的。

恩格斯：《俄国在远东的成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9页

俄国并不满足于这一点，它已设法成立了俄中委员会来确定边界，而我们知道，这种委员会在俄国手中是什么东西。我们曾看到这种委员会在土耳其的亚洲边界上的活动情况，二十多年来它们在那里把这个国家的领土一块一块地割去，……我们曾看到，

根据《尼布楚条约》从俄国夺去的土地，在随后的一个半世纪中（直到这些领土归还俄国），不仅没有进行经济开发，甚至也没有清帝国的臣民去居住。

（同上书第77页）

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关于把远东领土还给俄国的问题已提到俄中关系的议事日程上来，这些领土是俄国按照一六八九年的《尼布楚条约》暂时失去的。

（同上书第229页）

为了执行《天津条约》所达成的协议，伊格纳切夫与恭亲王于（一八六〇年）十一月二日（公历十四日）在北京缔结了新的条约。根据这个条约，清政府确认了一八五八年《璦琿条约》各条款，并承认乌苏里江以东地区为俄国领土。

.....

俄国人怎样在吉尔吉斯草原建立起自己的军事堡垒线；我们深信不疑，用不了几年，同样的一条路线将穿过戈壁沙漠，……

恩格斯：《俄国在远东的成功》，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
39、40页

因此，一六八九年俄国失去的大部分领土重新归还了俄国……

（同上书第230页）

老沙皇对中国实行的是不是一种“睦邻”政策？

沙皇政府在中国的政策是一种犯罪的政策，它更使人民破产，更使人民腐败和受压迫。

……

沙皇政府对中国实行的政策不仅侵犯人民的利益，而且还竭力毒害人民群众的政治意识。

列宁：《中国的战争》，《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217、216页

目前在报刊上大肆攻击中国人，叫嚣黄种人野蛮，仇视文明，俄国负有开导的使命……

列宁：《中国的战争》，《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216页

巴伊阔夫使团实质上是第一个正式使团，俄国政府希望通过这个使团与远方的中国建立外交和商务关系。俄国沙皇在给中国皇帝的国书中说：俄罗斯君主（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愿与中国皇帝永世友好、亲善和互通书信。

（同上书第72页）

分析了十七世纪的俄中关系，就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俄国政府曾一贯希望同中国建立睦邻关系，希望扩大同中国的贸易和文化联系；第二，清政府百般阻挠俄中商人

之间业务接触的扩大,这妨碍了
两国之间建立密切的政治和文化联系……

(同上书第889页)

第四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特别反对俄国政府的对外政策。……痛斥强占蒙古这种破坏我国同伟大的兄弟之邦中华民国的友好关系的行为。

列宁:《关于杜马中的工人代表和他们的宣言问题》,《列宁全集》第18卷第415、416页

……并依靠沙俄的援助,蒙古王公和喇嘛于一九一二年十二月一日发动了反清政变,宣布蒙古脱离清帝国独立。

(同上书第678页)

老沙皇是“帮助”中国反侵略,还是在侵略中国?

欧洲资本家的贪婪的魔掌现在已经伸向中国了。俄国政府恐怕是最先伸出魔掌的,但是它现在却扬言自己“毫无私心”。它“毫无私心地”占领了中国旅顺口,并且在俄国军队保护下开始在满洲修筑铁路。

列宁:《中国的战争》,《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214页

俄国沙皇的慷慨不在于帮助庄稼人……为的是在中

由于沙俄在法、德两国支持下对日本政府强加压力,一八九五年五月八日日本和中国在北京交换批准文书时,从《马关条约》中删去了中国割让辽东半岛的条款。

(同上书第347页)

为了实现清政府的愿望,普提雅廷提议由俄国供应武

国割取一块更肥的肉。

列宁：《评国家预算》，《列宁全集》第5卷第302页

器和派遣军事教官，以便清政府能够建立“新军”，用以帮助“制止其他国家采取暴力的企图”。

（同上书第221页）

老沙皇是不是鸦片贩子？

中国人方面提供的主要商品是茶叶，俄国人方面提供的是棉织品和毛织品。……毛皮以至鸦片。

马克思：《俄国的对华贸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页

虽然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有其反动性，但是俄国政府坚决谴责在中国进行的鸦片贸易和一八四〇至一八四二年的英中战争。

（同上书第156页）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沙皇政府公开表示愿与中国维持睦邻关系；一八四一年四月十二日，尼古拉一世曾发布“不准鸦片进入中国国境”的命令，同时还采取一切措施使北京尽快知道这个文件。

（同上书第157页）

俄国熊无疑也是什么事都能做，……

马克思：《俄国对土耳其的政策。——英国的工人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89页

沙皇俄国同中国的贸易不同于英、法和美国，它主要地不是通过海路，而是通过陆路；俄国没有向中国输入鸦片，没有从中国输出苦力，也

没有用传教士作为商业扩张的间谍。

(同上书第 288 页)

老沙皇是“支持”还是镇压中国人民的革命？

而“先进的”欧洲呢？它掠夺中国，帮助中国民主、自由的敌人！

……并与那个野心家，卖国贼，反动势力的朋友袁世凯联合起来扼杀“落后”亚洲的共和制度！

整个欧洲的当权势力，整个欧洲的资产阶级，都是与中国所有一切中世纪反动势力实行联盟的。

列宁：《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列宁全集》第 19 卷第 83 页

沙皇俄国对于加强北京袁世凯政府并无兴趣，它甚至试图跟南方共和政权建立尽可能友好的关系。

(同上书第 653 页)

恩格斯说：“任何俄国人，只要他是沙文主义者，迟早总会拜倒在沙皇政府的面前”。（《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18 页）从齐赫文斯基“巨著”的寥寥数例中，我们不是完全可以看出，老沙皇的幽灵今天已附在新沙皇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的身上蠢蠢欲动吗？！

苏联在巴尔干地区的战略

〔美〕约翰·C·坎贝尔

内容提要：本文共分八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中，作者认为，如果说巴尔干和中东仍然是“火药桶”的话，那就是由于苏联正在插手和干涉这一地区的事务。第二部分论述巴尔干和欧洲对苏联的重要性时，作者认为苏联的战略重点在欧洲，但它并不放弃对巴尔干国家的控制。第三部分论述苏联在中东的战略，认为苏联将继续利用阿以冲突、阿拉伯的激进主义以及塞浦路斯的纠纷等，企图在该地区建立同美国争霸的实力地位。第四部分关于苏联和希腊的关系，认为苏联对希腊右翼军人集团采取亲善政策，挑拨希腊和土耳其的关系，都是为了削弱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力量，以达到从中渔利的目的。第五部分关于苏联和土耳其的关系，作者认为，由于土耳其控制了苏联的黑海出口，地位重要，苏联如果要想在“中东登陆”，就必需改善它同土耳其的关系。第六部分关于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关系，作者认为，苏南关系象个钟摆，“摇摆充分协作和完全对抗之间”，但从未达到这个弧形的极限。第七部分论述苏联和罗马尼亚的关系，认为罗马尼亚所奉行的独立政策，还没有达到挑起苏联进行军事干涉的程度。最后，作者认为，苏联在巴尔干地区的政策是为了利用巴

尔干国家的合作去“磨掉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政策的反苏棱角”。

巴尔干地区和中欧一样，位于北大西洋条约和华沙条约两个军事集团之间的分界线上。自从一九六九年以来，由于勃列日涅夫、勃兰特和尼克松领导的几国政府相互往来，产生了一系列条约、宣言、最高级会议和多边会谈，结果形成了今天所说的“缓和”或“和平共处”。自从那个时候以来，巴尔干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正在改变着的关系的影响，受到在欧洲出现的全面调整的影响。但是，在巴尔干地区，一切并不是象人们根据这种总趋势所预期的那样，是和平、安宁和稳定的。

和平共处的宣言和边界的神圣不可侵犯性，难于稳定这样一个地区的局势。那里的两个联盟体制在边界上正在发生摩擦，那里老的民族不和睦的情况未能消失，那个地区某些国家的内部紧张局势可能引起国际危机，而且由于两个国家（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都有积极的外交政策，都没有参加两个联盟体制，还由于中国在共产党国家之间的关系上的重大影响，使这一地区的形势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了。如果这个地区和附近的中东联系起来，仍然具有世界“火药桶”的称号，那末，其主要原因是，苏联正在那里大力推行它的大国政策，并且象过去历史上那样，正在插手其他国家的利益和当地民族主义的一些纠纷。

一些总的观察

粗略地和稍许随便地说，巴尔干地区包括：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希腊和土耳其。这六个国家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保留了奥斯曼帝国的遗产。它们经常在地

区域性基础上互相发生经济和文化的关系。它们的统治者相互访问,并会谈巴尔干的团结问题。但是,在政治上,它们由于意识形态的不同,各自的利害冲突,以及大国的争夺等而被分裂。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许多岁月里,我们首先看见苏联的势力迅速地推进到这个地区。后来,由于它在希腊和土耳其,受到了当地和西方的联合反对而遭到阻止时,才逐渐撤退。随后,又在一九四八年从南斯拉夫和一九六一年从阿尔巴尼亚被迫撤退。一九五八年从罗马尼亚撤出苏军,并因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人主张半独立的对外政策,苏联在罗马尼亚的力量,也受到了削弱。

对苏联最近几年的巴尔干政策的估计,必须从这样一个事实出发。虽然人们对苏联军事力量的惧怕,仍然无可否认是强烈的,但是,苏联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在这个地区的政治影响,却降到了最低点。苏联在巴尔干有一个忠诚的盟国保加利亚,这个国家忠实地派军队参加了一九六八年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领导人,正好在杜布切克下台前,对布拉格进行了礼节性访问。他们对苏联的行动感到震惊,并谴责了此事。他们重申自己的独立,宣称将保卫独立,反对任何类似的进攻。阿尔巴尼亚自从和莫斯科破裂以来,和中国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它谴责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虽然对捷克斯洛伐克修正主义并不表示同情),正式退出了华沙条约,甚至允诺倘若苏联对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发动进攻时,它将给予支持。苏联在中欧的力量是巩固的,那里(在一九六八年八月以后)苏联有大量的军事力量驻扎在东德、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而巴尔干的情况正好相反,在那里,没有一点苏联部队。

中欧和巴尔干两个地区形势的明显差异,提出了一个关于苏联优先考虑的问题。克里姆林宫允许这种差异继续发展并选择不武装干涉巴尔干地区的事实(正如克里姆林宫曾经在中欧

不止一次已经做过的那样),但这是不是意味着克里姆林宫对它在该地区丧失威望、影响和战略地位是漠不关心的呢?难道它没有使用武力,就意味着它将永远不这样做吗?

很清楚,答案必然是否定的。

巴尔干地区和欧洲

欧洲安全会议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开始了,但是到了一九六六年华沙条约政治委员会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才确定了现在这个名称。苏联在争取召开欧安会的不断活动中,基本战略仍然照旧,主要的重点始终是在中欧。

巴尔干地区在苏联对欧洲的总战略上并未处于中心地位。它在日内瓦几乎没有引起多少注意,而在维也纳则根本不被注意。从莫斯科的观点来看,不仅没有必要就巴尔干国家的问题同西方进行谈判或达成协议,而且,苏联在同它自己的巴尔干盟国打交道时,在同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或者同希腊和土耳其打交道时,就会产生一个绝对的不利条件,苏联的行动自由将受到限制。在均衡裁军会谈中排除匈牙利作为一个正式的参加国,甚至把它排除在会谈所包含的地区之外(这是由于苏联的坚持而使匈牙利尴尬的情况下干的)。这便是一个信号,苏联企图在这个国家原封不动地保留他的军队,成为对邻近的巴尔干国家的现实威胁,而苏军从它和西方协议所包括的地区里撤出去倒可以增加他们的数量。莫斯科还表示,它一点也不同情南斯拉夫的那种主张:欧洲人的安全将是不完全的和靠不住的,除非这种安全延伸到地中海。俄国人从实际的立场出发认为,南斯拉夫这个扩大欧洲安全会议的建议,是要使这些讨论从眼前的主要问题上转向。因为在他们看来,如果地中海国家的一个东道国

加入进来,并且所有中东未解决的问题都设法进入议程的话,那末,他们要欧安会去完成的任务将变得极为复杂了。但是,他们采取这种态度,还有远为重要的原因,即在克里姆林宫的一般战略中,巴尔干对于地中海和中东地区的作用相当有关的一些原因。这个作用不是外围的,而是中心的;既是由于明显的地理上的原因,又是因为东地中海业已成为当地活跃的冲突和苏美间潜在军事对抗的场合。这里,苏联领导人不得不考虑那些比日内瓦讨论的原则更为具体的供应路线、港口、基地和其他事情。

在中东的战略

将近十年间,苏联已是一个地中海的海军大国,并且它还深深地卷入了中东事务。苏联看到,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和海军实力进入希腊、土耳其和其他地区的基地,成为一个既对中东利益,也对苏联领土和苏联盟国(包括保加利亚)的威胁。对于这种威胁,苏联想通过施加政治压力和对抗性的军事力量来加以抵销。苏联的地中海舰队在那里提供了这种力量,并且还达到其他的一些目的:支持苏联的阿拉伯盟国并提供一种对付阿以危机的手段;作为对这个内海两岸的国家(包括北约成员国家在内)显示苏联实力的一个标志和象征;并且,特别是作为向美国挑战的全球海军力量部署的组成部分。苏联的舰队是以黑海的一些港口为基地的,但是它的自给能力不足,还需要友好的地中海国家给予补给和维修的方便。在某些阿拉伯国家,例如埃及和叙利亚那里,这些方便是可以得到的,但是却一直受到变动的政治风向的影响,象在一九七二年七月那样,埃及总统萨达特急剧地减少了苏联在他国家内的军事驻防和特权。所以,苏联的海军将领们非常希望能够使用亚得里亚海东岸南斯拉夫和阿

尔巴尼亚的港口和设备。

苏联在中东的地位还以另外的一些方式，影响着它在巴尔干的政策。那种地位主要依靠在和平同战争时期向苏联的中东朋友和盟国运送武器。苏联的海上航线要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达达尼尔海峡和爱琴海，因此，它就必须考虑土耳其和希腊的政策。飞机必须飞经南斯拉夫、希腊或土耳其。地面上的路线是次要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莫斯科在一九七〇年说服土耳其，允许苏联依靠公路经过土耳其领土对叙利亚输送武器。一九七三年十月的中东危机着重说明，苏联事先得到保证，在它认为必要时，可以把供应的物资或军队运入该地区是多么的重要。幸运的是，对俄国人来说，铁托长期遵循亲阿拉伯政策，并且在允许他们越过他的国家建立空中桥梁上是合作的，但是俄国人通过长期的经验了解到，他们决不能使铁托或南斯拉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诚然，苏联在中东的政策有点自相矛盾，并且，当地的事态发展，以及例如美苏关系发展这类较大的因素，可能使苏联的政策向着这一方向或那一方向转变。如果说这对过去和现在具有什么指导意义的话，那末，我们可以预料苏联将继续竭力利用阿以冲突、阿拉伯的激进主义、西方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塞浦路斯纠纷和中东舞台上的其他一些固定的特征，以便在该地区建立不亚于别人的地位。这种努力是在同美国激烈的角逐中，还是在某些一般被同意的界限结构内进行，是一个公开的问题。但对莫斯科来说，有关巴尔干地区所得到的结论，至少在最近一段时间里大概是无损于它的。不管在哪一种情况下，莫斯科都希望在那里的地位，比它现在享有的地位更加强大。

把所有这些因素放在心上，我们便可以继续观察苏联对希腊和土耳其、对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以及在巴尔干地区主义的

总问题上，所采取新政策的动向。

莫斯科和希腊

从现状看，没有什么再比苏联和希腊军官右翼集团之间存在亲密关系更为不可能了。这些希腊军官，自从一九六七年直到最近的塞浦路斯危机，都控制着希腊。而且他们在贸易中的投资正在向共产党的威胁挑战。但是，苏联领导人，在不同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国家间应用和平共处原则时，表明了他们通常的灵活性。他们对陆军上校们一直是和蔼的。当他们在全世界的宣传中谴责雅典政权残暴的同时，苏联政府在它和这个政权的官方关系中处理得还是合适的甚至是亲切的。至于雅典政权方面，其议会由于受到西方的藐视而感到愤慨，因此，放宽了它和共产党国家的联系。不仅同它直接的邻国是这样，而且同莫斯科也是这样。

一九七三年一月，苏联驻雅典大使欢呼希苏之间日益增长的联系，并表明他的政府关心希腊独立政策的发展。这个声明在希腊看来，象是一个要他们脱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邀请，也象是要他们航行于独立的不结盟的海洋的邀请。不用说这会得到南斯拉夫人、阿拉伯人和许多其他国家人的支持，大概还会得到苏联人的支持。虽然希腊接受这种邀请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但克里姆林宫明显地认为，在希腊人头脑中培植这种思想是有用的。

在一九七三年十月中东战争期间，希腊允许苏联运输机在去叙利亚和埃及途中飞越基克拉迪群岛，而在同时它却禁止美机使用希腊的基地，执行它对以色列的军事补给任务。同年十一月，替代乔治·帕帕多普洛斯的那些新领导人在同美国的交往中采取了一种更加强硬的民族主义的调子。他们提出了原来

一致同意的让美国第六舰队“碇泊”在希腊的安排，而且他们根据北约没有完成它对希腊的义务为理由，对北约的意义提出了疑问。对于一个依靠五角大楼的政权来说，它似乎对它的假定保护人的愿望是异常敌对的。

苏联领导人希望利用希腊议会同西欧摩擦的同时，也在为希腊事务中的突变事件做好准备，或者使它转向对土耳其的战争，或者使它转向国内革命。希土冲突必定削弱北约，并因而给苏联提供新的机会，在地区的均衡中攫取自己的权利，这对莫斯科来说，似乎肯定是相当明显的。此外，如果雅典政权垮台了，那末，事件将对扬弃过去（包括和美国的关系在内）的一切政治势力敞开大门，并可能指望莫斯科给予支持。

当希腊军官在一九七四年七月推翻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的时候，所出现的一系列戏剧性事态发展打破了旧的状态，并且给西方外交，以及目前那些在雅典、安卡拉和尼科西亚的执政者的政治才能，带来了沉重的包袱。有些事件发展得如此迅速，以致苏联这个局外人要赶上它们并且调整它的宣传路线已经有些困难。但是，三个目的是明确的：主张莫斯科有权磋商并参加有关这次危机的国际决议；使塞浦路斯保持为北约防御安排以外的一个中立国家；在这三个国家中增加影响。在希腊重新出现的各民主党派好象是强大的，而希腊共产党分裂为三个派别，似乎前景不妙。但是希腊国内问题的重大，加之塞浦路斯事务中的虚弱和耻辱的影响，也许会迫使民主方法受到最大限制，会复活历史上的左右派斗争，并会落入苏联的圈套。

土耳其：一次不肯定的求婚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苏联开始在地中海建立一支海

军的时候，莫斯科就着手进行改善和土耳其关系的活动。这个活动，是跟苏联和西方和平共处的总路线相联系着的，并且土耳其人象他们在西欧的盟国那样也响应了这条路线。于是，便产生了莫斯科和安卡拉之间高级别的互访、联合声明、贸易协定、苏联对土的信贷、文化交流和旅游事业。

但是，苏联政策的这种改变，是比单纯为了培养两国之间的美好关系，有着更广泛的含意。莫斯科策略的改变，实际上已经不再把土耳其列为完全投靠美国、并在冷战中随时受到核毁灭威胁的美国基地，而是支持土耳其有权选择自己道路，以改变那种单方面依赖西方的办法了。因此，在一九六四年塞浦路斯危机中，当土耳其舆论责备美国政策的时候，苏联转变了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的立场。也因此，当许多土耳其人开始责问，他们究竟从军事联盟中得到了什么，军事联盟是不是愈来愈不适应于土耳其的国防需要，并且在援助数量上和关于美军在土耳其驻防的地位和性质问题上争论越来越激烈的时候，莫斯科对土耳其的主权和民族权利倒是尊重起来了。

苏联对土耳其发生兴趣的原因是不难理解的。土耳其只是由于它的一小块领土延伸到欧洲才成为一个巴尔干国家的，但它却构成了把苏联同地中海和中东分开的部分陆地障碍，土耳其控制的狭窄海峡成为这个陆地障碍的通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苏联曾企图使土耳其成为它的卫星国。如果成功的话，几乎毫无疑问，整个障碍将变成为一座桥梁。人们经常说，苏联的统治者们无论怎样都要越过这个障碍并在中东登陆，但由于北约的支持，土耳其仍保持着独立和对这些海峡的控制。而这些海峡仍然具有战略上的重要性，因为它支撑着希腊和南斯拉夫。这并不是说，苏联不可能撇开土耳其、希腊和南斯拉夫的保卫者们，如果它无视前两个国家和北约的结盟，无视南斯拉夫

竭力宣扬的不结盟，而要一意孤行的话，那将意味着一场大的冲突。

因此，苏联的统治者，似乎将机敏地决定利用土耳其，而不是坚持一项和它敌对的政策。然而，土耳其内部的事件并非完全有利于莫斯科。反对北约的国内骚动，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左翼领导的，接着又挑起了极右派反扑，结果是土耳其军事头目们在一九七一年执政。在军队保护下执政的保守政府对于当地的左派分子是强硬的，并怀疑他们是得到外国的支持，主要是苏联支持的人。然而，在一九七三年选举以后，重新回到政党执政的局面。由共和人民党领导人布兰特·埃塞维特领导的联合政府，宣布了一项政策，根据这项政策，土耳其将不再完全依赖北约了。例如，他表示，土耳其不希望卷入北约范围以外的其他成员国可能卷入的冲突（指阿以纠纷），并指出，在土耳其的利害冲突（指塞浦路斯）中，北约不应指望土耳其会作出什么帮助。新外交部长特朗·冈尼斯就曾说过，土耳其将保持灵活性，并且将决定它自己的安全政策，以补充北约提供的安全。他指出，在土耳其土地上使用美土联合防卫装置必须共同决定。总之，就美国在北约范围之外的中东作战活动而论，土耳其似乎已经成为一个实际的中立国。对于苏联的政策来说，那将是一个相当肯定的收获。

只要塞浦路斯和希土关系的情况保持现状，克里姆林宫便可能利用这个或那个政党而不太考虑前后的一致性，并且可能污蔑北约和美国会给每一个人带来麻烦。但是，一九七四年塞浦路斯危机，以及土耳其决定诉诸于军事行动，使莫斯科面临着一种强硬选择，以至于较远地背离了它的亲土路线。由于每一件事情都在变化，以及当地的一些政权都指望西方，苏联领导人一直在小心翼翼地回避采取一些肯定的态度。然而，在较远的将

来,对于莫斯科来说,在这一地区最紧急的问题,即最大的战略竞争目标,便是土耳其,这几乎是没有疑问的。在西方外交也许不可能容纳的活跃局面中,莫斯科将在塞浦路斯、希腊,特别是在土耳其寻找每一个变化,这种变化可能帮助它取得通往中东的道路。

莫斯科和贝尔格莱德: 显眼的时代

当苏联在西方联盟的后院探索新机会的时候,它还必须以日益增长的程度涉及到它和巴尔干地区共产主义国家的关系,特别是涉及到业已最敏感的那些关系。首先涉及到的是苏联和共产主义的南斯拉夫的关系,这个国家依然顽强地独立于莫斯科控制之外。要非常简单地而又不至于不准确地叙述一下这种关系,那末,自从一九四八年斯大林和铁托破裂以来的关系,好象是一个钟摆,摇摆充分协作和完全对抗之间,但是还没有达到这个弧形的极限。一九六八年以苏联为首的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开始了这个钟摆的新的摆动。

苏联领导人对苏南关系上新的紧张局势负有责任。他们对这种紧张局势并无兴趣,除非他们看到了这将会导致改变南斯拉夫政权或其政策。但是,当着和平共处已成为苏联对欧洲政策的中心,而和波恩缔结的条约在德国议会上悬而未决的时候,情况几乎不适合于莫斯科对南斯拉夫进行一次冒险的行径。因此,勃列日涅夫选择了一种调和的态度,并在一九七一年九月对南斯拉夫进行了一次非正式的访问,有点类似于一九五五年赫鲁晓夫那次比较隆重的访问。虽然他不象以往那样去向南斯拉夫道歉,但明显的用心仍是给南斯拉夫作出某些保证,并提供一个新的印象。铁托及其伙伴们虽顽固地带有猜疑心,但却抱有

调和的愿望。真正的问题是，勃列日涅夫主义及其对南斯拉夫可能存在的适用性。当然，这个主义没有在公开的场合提到过，除了苏联领导人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否认有这件事外，他断定说这是西方报纸的一项发明。

勃列日涅夫访问后发生的那些事件，证明了这次访问确实是一个转折点。争论在双方公开的评论中渐渐消失了。双边经济谈判达成了一系列增加贸易和合作的协定，一九七二年十一月终于得到苏联总计四亿五千万美元贷款的保证（并在几年以后，跟着又一次给予四亿五千万美元的贷款）。南斯拉夫扩大了它和苏联集团的经互会的合作，并改善了它同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与党的关系。这种趋势仍然在继续。在一九七三年的中东战争中，莫斯科和贝尔格莱德支持了阿拉伯方面的斗争，又一次强调了两国在共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这个问题上是团结一致的。十一月铁托和勃列日涅夫在基辅的会见，是一个象征性的姿态，它表明南斯拉夫在这个特定问题上并不是不结盟的。

基辅会议明显地提供了两党策略的一瞥。勃列日涅夫利用铁托强烈支持阿拉伯国家的信念及其对不结盟国家所负的义务，强调在争取和平和安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所有兄弟般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南斯拉夫在内）的“协调政策”和“联合行动”。铁托仿佛以阿拉伯各国的当然代表在说话，表示非常感激苏联对这些国家的广泛援助，但强调指出，一切国家有权在平等的基础上，参预紧张局势的缓和以及国际问题的解决。他还谈到了南斯拉夫和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共同目标，然而他又小心地补充说，这个目标应该根据各国的特点而通过不同的道路去达到。

这样，铁托一如既往地阿拉伯各国、对和平以及对他在世

界舞台上的地位表示了他的关心。另一方面，由于南斯拉夫的国内情况特别虚弱，为了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条件下去处理国内事务，如果苏联对南斯拉夫保持一种亲切的和并不干涉的态度，铁托就特别感到兴趣。

过去四年间的情况，具有超过通常混乱的特点，南斯拉夫经历着一场经济困难和宪法的危机，还得为应付铁托死后的那些不得而知的危险作好准备。在一九七一年克罗地亚共产党领导的“民族主义倾向”中，铁托看到了对党的权威和国家团结的一次挑战，他撤换敢于冒犯他的那些领导人，并威胁说，如有必要，要动用军队来对付这场挑战。次年，在别的共和国，特别是在塞尔维亚发生了危机，铁托再次驱逐了当地党的领导人，理由是他们犯了自由主义、小资产阶级情绪、无政府主义、技术挂帅和经济剥削等罪名。

南斯拉夫人也很清楚，克里姆林宫一直对这个地区的情景，保持锐利的观察。一九七一年，南斯拉夫官方集团的报道说，苏联的一些机构勾结了在德国克罗地亚的一些法西斯移民组织，这些机构被认为是企图在克罗地亚制造麻烦的。还有这样一种暗示，但从来没有被证明过，就是说苏联煽动克罗地亚的领导人米科·特里帕洛、萨夫卡·达普切维奇-库查尔、佩罗·皮尔克尔等（这些人都是在一九七一年十二月被免职的）。然而，当事情过去以后，《真理报》突出地报道了铁托阐明危机的后果和粉碎反革命倾向的必要的声明。而就塞尔维亚来说，情况是不同的。由于马尔科·尼凯集奇和其他领导人从事于使塞尔维亚党自由化和现代化的任务，而随着亚历山大·兰科维奇于一九六六年倒台后，也从他的宝座上倒下来了，所以，在那里，莫斯科不能不感到高兴。

考察一下，倘若南斯拉夫继续产生危机或内部发生倾轧的

话,苏联可能做些什么?是支持克罗地亚人去粉碎这个国家,还是支持塞尔维亚人去联合它?是帮助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还是埋葬他们?是军事上干涉还是不干涉?对于这些问题,在南斯拉夫无疑地要比在莫斯科更为敏感。只要铁托还在,除非是发生了某种比一九七一年和七二年更为严重的危机,否则就不大可能发生苏联武装干涉南斯拉夫的情况。

从一九四八年以来,南斯拉夫政策的全部过程,大致警告了苏联领导人:必须从最近这次钟摆的摆动中,得出一些基本的结论。如果他们企图过分地谋求眼前利益,就可能引起钟摆向着另一方向摆动。

莫斯科-布加勒斯特:有控制的冲突

罗马尼亚作为苏联东欧集团中一个羽毛丰满的成员,抱有自治的愿望,因此,就象不结盟的南斯拉夫一样,成了莫斯科的一个头痛的问题。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以来,布加勒斯特就公然反对赫鲁晓夫要在“经互会”的幌子下把东欧经济统一起来的计划。罗马尼亚领导人争取并赢得了独立的地位。在此项努力中,罗马尼亚不得不在国内外执行一项困难的平衡行动。即在一些有争执的问题上反对莫斯科,但并不达到挑起苏联采取军事行动的程度;并作出一些为了赢得国内普遍支持的让步,但并不达到放松极权制度下严格控制的程度。

就苏联来讲,它一直非常宽容罗马尼亚的政权。在外交政策方面,这个政权做出了自己的决定:它和西德建立了外交关系;当这个集团的其他国家和以色列断绝关系时,它并没有这样干;它公开支持杜布切克并谴责他的被推翻;它在莫斯科和北京之间保持中立(或许对中国方面表示更大的热忱)。还有党的

关系方面，苏共在所谓无产阶级团结的旗帜下竭力争取支持和筹备召开一些会议时，罗马尼亚人始终是苏共方面的麻烦。在一九六九年世界共产党会议上，罗马尼亚人派出了一个代表团，该团在一个公开文件中表明了它和会议决议的分歧。

我们只能推测，为什么克里姆林宫容忍罗马尼亚越轨的理由。明显的是，对苏联的这种触怒迄今还没有达到挑起苏联发动军事行动的程度，而齐奥塞斯库一定考虑过这种程度在那里。一九六八年，苏联刚开进捷克斯洛伐克时，以及在一九七一年夏，他在中国受到亲切接待以至触犯莫斯科时，他也许已经濒于边缘了。紧跟着的一段插曲是，苏联和东欧党领导人在克里米亚举行了一次没有他参加的会议（这个步骤，使人们不祥地回溯到一九六八年举行的没有捷克人参加的那些类似的会议），但是没有发生什么问题。根据苏联对全世界关系的有害影响来看，苏联领导人清楚地知道，为了对捷克斯洛伐克事件采取补救性的行动，必须付出怎么样的代价，因此，人们似乎有理由假定，他们不愿在罗马尼亚重复这种经历。

实际上，罗马尼亚在跟莫斯科关系上的越轨行动，一直是相当成功的。虽然其他的东欧政权可能私下喜欢齐奥塞斯库的这种逗熊式的游戏，但他们没有卷进去。苏联的外交也没有受到罗马尼亚代表在国际会议上讲话的严重影响，或受到布加勒斯特超越集团界线而把东西欧各国拉在一起的倡议的严重阻碍。在中东事务中，虽然罗马尼亚主张一种独立地位，即和以色列保持正常关系，而不象它的华沙条约伙伴们和铁托那样。但它缺乏实力和威望来担任调停人，包括苏联在内，没有一个国家似乎需要罗马尼亚作为联络的通道。齐奥塞斯库访问了各大洲的几十个国家，更象一个第三世界的发言人，而不象一个苏联的盟国在讲话，他同这些国家签署了一些声明。这些声明体现了

对罗马尼亚如此重要的原则：主权独立、边界不可侵犯、不干涉内政、所有国家平等、互相合作。但是，这些访问和声明的主要目的，表面上是坚持罗马尼亚的个性，并培植更为广泛的经济关系，而他们似乎并不影响苏罗关系的基础。

如果齐奥塞斯库能够调动美国和中国有效地支持他的独立地位，他对美国特别是对中国的访问，可能产生更大的反响。他在一九七〇年对美国的首次访问实际上捞到很少的东西；但一九七三年十二月第二次访问时就共同发表了一个联合宣言和一个“关于经济合作的声明”。然而，在这段时期里，已经看到了苏美正在搞的所谓的缓和，而这种缓和减少了罗马尼亚特殊地位的重要性。

齐奥塞斯库一九七〇年到中国的旅行，从表面上来看是比较成功的。北京慷慨地答应给予总共大约二亿五千万美元的贷款，在晚些时候访问布加勒斯特的一个中国军事代表团，还保证对罗马尼亚维护国家独立的努力给予“坚决支持”。但是，正象周恩来当时会见一位南斯拉夫编辑时所指出的那样：“远水救不了近火。”当然，这些外交策略的成果不可能使罗马尼亚人抱有任何幻想，即美国或中国将（或者能）在物质上保护他们的独立。他们也正在发现，参加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的世界体系，以及努力发展同西方的贸易，既不能补救他们的硬通货亏空，也没有使他们得到反对苏联经济压力而进行讨价还价的实力。

从过去的两年中，已经看出罗马尼亚的有些态度有了一定的收敛。已不再听到布加勒斯特以前为了降低苏联在联盟中统治地位而要改变华沙条约组织结构的那种要求了。虽然罗马尼亚仍然反对在其领土上定期举行华沙条约演习，但在一九七三年二月，确实参加了一九六二年以来还是首次的、在华沙条约武

装部队总司令雅库鲍夫斯库元帅指挥下的、在罗马尼亚国土上同苏联和保加利亚官员一起举行的联合演习。在经济方面，罗马尼亚人同样放松了在同经互会伙伴们一体化问题上曾采取过的某些僵硬态度(虽然没有放弃否决联合计划的权利)。他们和莫斯科缔结了大规模的经济协定，包括让罗马尼亚在苏联投资开发原料的一些规定。在政治方面，齐奥塞斯库在一九七二年和一九七三年参加了例行的在克里米亚举行的共产党领导人会议，而在一九七一年时，他显然是被排挤在外的。

正象南斯拉夫的情况那样，克里姆林宫也非常关心齐奥塞斯库统治下的国内事务。这位罗马尼亚的领袖统治着共产党世界中控制最紧的国家之一。不象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没有经济改革，没有自由化，也没有相应的民族问题。

这种个人的制度有它的力量，正象任何强大的专政那样。但是我们可以肯定，苏联领导人正在考查它可能有的弱点和研究可以替代它的方法。

和平地带——为了谁的利益？

观察了苏联和巴尔干主要国家的关系之后，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苏联为争取巴尔干的和平地带，而对于更广泛的地区合作的问题所持的态度和估计。为巴尔干地区和平而合作的祈祷，在每个正式的讲话中可以听到，在巴尔干国家间官方互访时发表的每份公报中都有出现。有意义的是，每当勃列日涅夫或波德戈尔内突然访问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或者索非亚时，在苏联的声明中也发现有这种祈祷。题目虽然一样，但是正如人们将看到的，动机可是不同。

在这里，重要的是区别两种基本的思想。一种是，俄国“保

护”巴尔干各国人民的历史使命的概念，或者更笼统一点说，即按照俄国的利益来组织这个地区；另一种是，巴尔干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团结合作的观念，或者用十九世纪出现过的一句格言来说，“为巴尔干各国人民的巴尔干”。

一九五五年，赫鲁晓夫和他的伙伴们作出了同南斯拉夫有限和解的抉择，为他们自己关于巴尔干地区的新创见奠定了基础。在一九五七年，即波兰为了它和莫斯科的利益，为在中欧建立无核区而提出腊帕茨基计划的那一年，罗马尼亚政府倡导了为建立包括六个巴尔干国家的类似地带的斯托伊卡计划。后者可能仅在名义上是罗马尼亚的一项建议，而在晚些时候，这项建议已被赫鲁晓夫加以重复并精心研究。

斯托伊卡计划的第一个目的是，通过从希腊和土耳其排除美国的核武器，而在巴尔干-地中海地区削弱北约的地位，正如腊帕茨基计划的目的是要削弱北约在德国的实力一样。第二个目的是埋葬一九五四年已将灭亡的巴尔干联盟，并使南斯拉夫和苏联的盟国按照一项计划联合起来，而这项计划是和贝尔格莱德所宣布的不结盟政策一致的，但是，这个目的肯定地会遭受到西方的否定。北约国家，特别是美国、希腊和土耳其实际上是反对此项计划的，而巴尔干和平地带的思想只是作为苏联的宣传题目，不是作为一项认真的谈判项目而继续存在着。

然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经历了一系列的事态发展，从而使这件事有了一个完全新的面貌。首先，苏中关系破裂，使巴尔干的共产党国家发生了新的分化。罗马尼亚试图同双方保持友好关系。南斯拉夫，虽然是处在中国人对修正主义的猛烈攻击之下，但仍然对中南和解敞开大门。第二，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为了相互安慰和支持而更加紧密地结成了一个联盟，这个联盟在军事力量上是短暂的，但是，它们所致力共同思想包括巴尔

干团结的思想却是长期的。第三，包括希腊和土耳其在内的所有巴尔干国家之间的接触，有了普遍的开展。更多的贸易，联合计划，多瑙河上的大坝、桥梁和发电站，文化上的交流和运动会。甚至阿尔巴尼亚摆脱了孤立，和南斯拉夫重新建立正常关系，并在破裂三十年之后逐渐恢复同希腊的关系。

这样，一个和平合作的地带，好象正在巴尔干地区几乎是自发地形成。但在现实情况下，人们不禁要问，是谁在管理它？又是为了谁？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苏联只有一个坚定的巴尔干盟国保加利亚。索非亚的政权，特别是自从日夫科夫在一九五四年担负领导以来的长时期中，在国际事务中以及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忠诚地跟随着莫斯科路线，使保苏关系成为“新型国际关系”的一个完善典型，按照苏联理论家的说法，正在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不能说保加利亚人比其他国家人民少一点民族主义，也不能说在这时或那时，保加利亚的公众舆论或者个别领导人并不怨恨苏联的统治。但是，保加利亚的民族主义被引向反对巴尔干邻国。

由于保加利亚疏远了它的邻国，因此从历史上来看，保加利亚是巴尔干团结或分裂的关键。巴尔干联盟以及一九一二年的共同反土战争，到了一九一三年便让位给保加利亚和他的盟国间的战争。三十年代初期的一些巴尔干会议是包括保加利亚的，但一九三四年的巴尔干条约却没有包括它，这是一个致命的弱点。在六十年代中，共产主义的保加利亚仍处于不稳定的地位，虽然它在巴尔干各国合作的许多行动和趋势中是一个参加国，但在很多方面仍是孤家寡人。甚至胆怯的日夫科夫政权出于自己的原因而坚持它在巴尔干地区的权利，并和它的邻国包括希腊和土耳其在内，实现关系正常化和扩大贸易。同时，这个政权成了苏联意图的风标，因为它干什么都不会去违抗苏联政策的。

保加利亚在地理上位于这个地区的中心，占有战略上的地位。苏联领导人能在政治上利用它，还能在军事上利用它。他们已运用在索非亚的影响，作为对付其他巴尔干国家的一种政策武器。于是，当他们想要对南斯拉夫施加压力时，便鼓励保加利亚向南斯拉夫要求对马其顿的权力。当他们打算警告罗马尼亚时，便同保加利亚人举行军事会谈和军事演习。但是，苏联越是把巴尔干的政策建立在保加利亚的亲苏好战和对其他巴尔干国家的仇视上，就越是危险把自己和它唯一的巴尔干盟国分隔开，并丧失它对其他地区其他国家获取影响的机会。

一九七一年勃列日涅夫对南斯拉夫的访问，不仅表明是同这个国家缓和的一个转折，而且也是为苏联在巴尔干国家的影响开辟更广泛可能性的一种企图。他从贝尔格莱德跑到布达佩斯和索非亚，而此后，那两个国家对南斯拉夫的批评便放松了。因此，苏联领导人似乎已决定利用巴尔干合作作为一项策略的组成部分，去磨掉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政策的反苏棱角，而不是直接地抨击这些政策和领导人。

(摘译自一九七四年七、八月号美国《共产主义问题》杂志 上海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三年级工农兵学员译)

苏联和东欧——新路和老道

〔美〕R·G·凯撒等

新 貌

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的联合，靠的是苏联军队，靠的是对苏联的经济依赖以及那种日益模糊的思想。这些因素、特别是前两种因素，关系到问题的实质。但其他一些因素则起着相反的作用，无论从这些国家人民的性格和爱好、经济、政治以及文化等方面来看，东欧各国同主宰它们的苏联是不相同的。号称“苏联集团”的、坚如磐石的政治集团，出现在报纸大标题中，要比它在现实生活中有生气。

集团内的裂缝 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东德等国家的情况尽管各有不同，但都显示着苏联对它们的控制并不是铁板一块的。其中的每一个国家，都会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同苏联的想法有所分歧甚至反对苏联的路线。南斯拉夫甚至还不是苏联集团的一个成员。它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和不结盟的；它的国内政策，实行的是修正主义而不是教条主义，并以没有警察控制而感到骄傲。但是，南斯拉夫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一样，也存在着共同的实际问题和意识形态的问题。

波兰纵容天主教在国内泛滥。匈牙利公开出售外国书籍。罗马尼亚执行独立的对外政策。东德宁可进口网球鞋以满足人们的需要，也不进口重要的工业品。值得一提的是，在共产主义世

界中,在苏联和在苏联入侵之后的捷克,还有“地下”出版的刊物。

当东西方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时候,共产主义阵营内部的相互关系,对美国和西方各盟国来说,意义日益重大。东欧是苏联后院的一部分,从近代的历史发展来看,这一地区动荡不定、前途难以逆料。苏联很容易被东欧问题搞得精疲力竭:比起尼克松对法国、意大利和英国来说,勃列日涅夫不得不花更多的时间去关心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在某种意义上说来,东欧是新思想的一条传送带,这些思想就是通过后院输入共产主义祖国的。

虽然在苏联统治下,四分之一的世纪已经过去了,但东欧仍然是松散得令人吃惊的国家组合。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各自地独行其事。只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头十年(用东欧的术语来说就是斯大林时代)内,苏联才对它的卫星国拥有完全的统治权。值得注意的是,现在除保加利亚(也许还有捷克)外,东欧其余国家都在口头上和文字上公开地把“斯大林时代”说成是它们历史上的黑暗时期。而在苏联,斯大林本人仍然是受爱戴的人物(譬如说,比起赫鲁晓夫来,斯大林是更得人心的),而且人们对斯大林年代是不胜怀念的。

随着匈牙利事件和波兰政府的换马,斯大林时代于一九五六年结束了。从那时候起,东欧表现它的民族主义的余地,就越来越大了。

几年前,欧洲的那些共产主义者,对苏联的模式是不是唯一正确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问题,进行着激烈的辩论。现在,莫斯科的意识形态专家们也许偶尔还在提这个问题;但它作为一个实际问题,则早已作了定论了:东欧人可自找门路。

当然,这种自由是有限的。

东欧之所以五花八门,也是这些卫星国过去关系史上的产物。波兰人如果听说他们要同捷克人混在一起,准是为大为恼火

的。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人则彼此抱着河水不犯井水的态度。

新修正主义 近年来的事态发展加深了这种固有的差异。在东欧的大部分国家里出现的“消费至上主义”，就是新修正主义的思想基础。

匈牙利的那位讨人喜欢的左右逢源的头头卡达尔，在去年春天的一次讲话中，扼要地说明了这种修正主义。他说：“我们所需要的不只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且还得有常识和现实感。如果意识形态同常识发生冲突，那一定有什么事情大错特错了。”

从字面上来看，这一番话也许算不了什么激进的言论。但卡达尔是苏联帝国的领袖人物之一；而在苏联，意识形态同常识往往是不相一致的。例如，苏联科学家同外国科学家的接触，是受到严格限制的；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缘故，旅行、通讯和共同研究都受到控制。结果，苏联的科学在许多领域中还很落后。

现在，东欧不得不对一些难题作出回答。匈牙利和南斯拉夫正在辩论：当两国的许多家庭每家只有一间住房的时候，应该如何对待那些享有特权的新阶级？在苏联，也有享受特权的新阶级，但对他们所享有的特权是否正当，却没有公开地讨论过。

东欧人还在搞权力分散的把戏，他们的做法使莫斯科的旧脑筋糊涂起来了。波兰的盖莱克一直在试图让官僚机构在决定权方面松松手；匈牙利正在把实际权力下放给工厂经理；南斯拉夫已经公开放弃了国家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把所有权交给了“全社会”并让工人们当股东。

在克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中的许多陈词滥调方面，东欧表现得非常热心，并已经着手以实用主义去认识问题，解决问题。几乎所有的东欧国家都急于想同“现实世界”合流。在那里，人们摒弃妨碍视线的意识形态，提倡解决实际问题。苏联对德国和美国采取了新的态度，在扩大同西方的贸易方面，甚至津津乐

道于让资本家开发苏联资源,这就意味着莫斯科也在向“现实世界”靠拢了。

但是,在苏联也有许多因素是同这种倾向背道而驰的。普通的波兰人和捷克人都了解西欧人民的生活水平,要比他们的生活水平高;可是,许多俄国工人却认为,他们的生活确实要比西方工人过得好些。东欧人也了解,埃及总统萨达特要俄国顾问撤退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苏联公民所知道的(而且也颇有人信以为真),却是俄国顾问是胜利地完成了任务而回家的。

大力改良经济 在经济方面,东欧人对西欧抱有极大的兴趣。东欧衡量经济成就的标准,基本上就是西方的那一套办法。什么自动化啦,现代化管理啦,生产率提高啦和资源的有效分配啦,等等,东欧经济计划专家们的全部目标,也都是以西方经济成就的标准来制定的。在东欧各国,经济改良的理论基础是:提高生活水平。

苏联,至少在理论上也对现状不满意。“消费至上主义”已经冲破了它戒备森严的国境线。苏联共产党的现行纲领是史无前例的:在纲领中,它把消费者的利益放在发展重工业之前了。而且,苏联领导集团和东欧的领导集团可以说是“英雄所见略同”,都认为西方技术是不可少的。莫斯科不但同西方勾搭,而且干脆照抄西方的东西。

例如,苏联几乎跟每一个东欧国家一样,在几年前就决定而且兴建了一所以西方(主要是美国)为榜样的培养技术管理人员的学院。这个学院的课程表是保密的,外国人要求参观遭到了拒绝。毕业生也不谈论他们的学习经验。

匈牙利人也在布达佩斯设立了一所管理学院,它对外开放,并自以为了不起地欢迎外宾参观。这所匈牙利学院的教材并不保密,其中包括哈佛大学商学院教科书的译本。

这个小小的对比，大大地泄露了共产世界对待现代化的不同做法。在苏联搞改良，可不那么方便；有些改良虽然已经完成了，但多多少少还得保点密，以免引人注目。

“事情上马了……”

共产主义集团自己发表的统计材料表明：苏联的生活水平（以膳食中的蛋白质数量、电话和汽车数量以及公寓住房的面积等为标准），与其说已接近东欧的最高水平，还不如说它只达到了东欧的最低水平。

这种差别，部分是由于历史原因所造成的，更基本的还是政治的反映，因为在东欧绝大部分地区，是群众的压力在迫使统治者进行改良。一九七〇年十二月的波兰事件，显示出他们迫切要求实质性的改变。从波兰新政权的行事来看，它能不能维持下去，就全得看它是不是让群众生活有所改善。这种说法，据包括高级官员在内的波兰人说，是言之有理的。

苏联政权并不感到有类似的压力。它对自己在国内的力量，表现得比较自信。看来，苏联头头们已经下定决心，还是要发展他们的重工业和军事力量，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两者都是保持大国地位所必不可少的东西。而那些东欧人的胃口就没有那么大，所以，他们是把较多的资金和精力花在“消费至上主义”上面。

但房荒问题却抵销了这些政权在其他方面改善千百万人民生活的种种努力。而且在某些国家中，特别是波兰，战后添丁热潮中出生的婴孩，现在都已长大成人了，因此，房荒问题不但改善无望，反而更为恶化。

于是，房屋市场出现了，它向人们提供了出高价的机会。这

样，你就不必再为等候政府分配的廉价住房而排长队了。波兰政府正在鼓励私人建造住宅。华沙一位律师希望能搞到一幢住房，他用的手法是，把四年前搞到的合作公寓，以高于原价的三至四倍出售。“换”房在苏联全国各地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双方在莫斯科各有一间住房的新婚夫妇，想找到有一套两间公寓的即将离婚的夫妇，以便在住房上互通有无。这种交易由“黄牛”撮合，每次取费数百卢布。

诸如此类的问题，许多都是过渡性的，只要改进管理工作，改进建筑工艺，是不难解决的。但如长此以往，不加注意，它们就不再是什么经济问题，有朝一日就会成为使政府的计划专家措手不及的政治问题和意识形态问题了。例如，房荒的主要后果之一，就会在一个新产生的阶级和工农之间，造成越来越大的差距。

在这些国家里，除通常的国家建筑外，还有合作公寓。要搞到一套这样的公寓，居民得先付一大笔钱，然后在二三十年内清偿欠款。私人资本的流入，活跃了建筑业。但这也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新公寓都落到最有钱或最有门路的人的手里了。

南斯拉夫的等级社会，在贝尔格莱德的某些公寓大楼里反映得异常清楚：律师、医生和高级官僚，可以在大楼的上层宽敞地占住六间一套的公寓，而吉卜赛人全家老小只得挤在底楼地下室的一个房间里。

莫斯科也存在同样的悬殊情况：有门路的科学家住的是列宁大街上的天花板挺高、面积很宽敞的公寓房子；而莫斯科中心区的老公寓里，一家人挤在一间房子里。千百万的中年莫斯科人，就是住在这种公寓里，跟命中注定的那些邻居合用着浴室和厨房，度过了大半辈子的生活。

共产主义政权早就把车子和房子当作是表明一个人身分的

标志，党政机关的高级干部享受着特殊照顾。社会平等的高调尽管唱得很响，但金钱和其他物质报酬却长期以来就在这种社会里被当作刺激手段来使用了。这些政权究竟搞的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

工人在“工人国家”中的地位

那些头头们虔诚地不断地叨念着，共产主义国家是工人的国家，共产党是工人的党。他们都说是以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名义进行统治的，因而他们的权力一向是合法的。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成千上万的波兰工人在格但斯克和什切青两个沿海城市暴动，并亟力粉碎这些旧的口号。波兰事件所发出的信号，并没有什么玄妙之处。它表明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代表了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之类的古老神话，已经不太中用了。

现在，东欧共产党的一些头头们开始承认了：在以工人名义进行统治的社会中，工人被撇在一边，而且往往受到亏待。波兰的盖莱克和东德的昂纳克都戴上了安全帽，亲自同工人见面。南斯拉夫的铁托总统以工人阶级的名义，号召要对享有特权的新阶级和越来越大的银行权力发动反击。在这一片热闹声中，旧的那一套花言巧语又重新应运而起了。

但现实的情况是，正如一位波兰社会学家所写的：“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改变他们对机器的关系，也没有改变他们在工厂工艺技术结构中的地位。”

共产主义世界的大道理同现实生活之间的鸿沟，关于平等的主张同一小撮精神贵族享有特权的客观事实，是没有办法弥合的。

在莫斯科，当劳动妇女在食品店前排着长队，想购买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中央委员会官员们的老婆却可以用电话向特设的“内部”商店购货。

共产党的外交人员和外贸部代表，在国外出差期间享有外币津贴，这就使他们能够用这些外币立即买到西方的汽车和服装等；但使用本国货币的顾客，通常就得等上五六年，才能买到这些东西。特权阶级的子女可以学习多种外语，在教育方面他们享受着工人子弟所无法奢望的种种方便。在莫斯科还设有许多只能凭外币或特种票证购买商品的专门商店。这些商店内存放着在一概铺子里所买不到的特殊商品（诸如高档牛肉之类）。

工人是跑不进这些商店的。但外国人就行。某些俄国人也行，那便是艺术家、外交人员、技术助手和任何从国外赚钱回来的人。再就是秘密警察了，他们所领取的工资，有一部分是用票证支付的。东欧的一些省委书记简直享有封建特权：他们的职位使他们能住上别墅，享受服务性行业上门服务 and 国营商店免费送货上门等特权。有的人还贪污受贿。在苏联，区党委的头头，可以替人在汽车购买登记表上作弊，优先购买汽车。

而这些特权，正是党的干部经常谴责的那种“社会差别”。共产主义国家工人的地位，只要从这么一件事中就看得很清楚了：工人的平均工资只能聊以糊口。很少有工人，能够靠工资舒适地维持四口之家的生计。匈牙利公布的调查材料说明，普通工人的工资，大大低于知识分子和技术工人的工资。在苏联的某些工厂里，厂长、经理的工资相当于工人的十到二十倍。

农民和官僚

苏联还有一大批农民没有被社会所同化。千百万俄罗斯农

民，至今还生活在那些尽是木头房子的泥泞的小村庄里。自耕农的人口很多，也很落后。

总的说来，欧洲共产主义社会中有两种农民。一种是留在土地上务农的。在许多国家内，尽管进行了工业化，减少了农村的雇佣人口，但是，这种农民的数字还是大得惊人。还有一种，就是大量的既是农民又是工人的“农工”，他们虽在城市里劳动，却始终没有成为城市的一员。

从列宁格勒直到布加勒斯特，在这些共产主义欧洲的一些城市里，房屋建筑是油漆斑驳，门窗破落，街道泥泞，人行道断裂，显得非常突出。

反之，在这些国家里，充斥着不发达社会的许多特征：工作效率很低的官僚机构，揩油受贿的古老传统；靠讲交情、拉关系、谋取正式渠道无法提供的特殊照顾等不正之风盛行；再就是大规模的贪污和经济上的犯罪活动了。

市区条件（象布达佩斯和华沙之类的城市）既然如此，对那些想成为城市居民的人，就当然只好一律饬以闭门羹了。许多农民只好住在城市的边缘地带的棚户区内过活。他们从事修理汽车之类的劳务，或贩卖农产品等。有时候，他们也能在当地工厂里做做小工，并兼营一些副业。

这一切，就是在东欧被描绘成“城市农村化”的一个侧影。匈牙利的一些社会学者经过详细调查后，在宣扬什么“准城市化”了。实际上，就是指的这种情况：“在农村生活，在城市干活”。匈牙利有三分之二农户的户主，都不是以农业为主要职业的。

苏联也同它的盟国一样，有着严重的人口问题。千百万在工厂劳动或从事工业生产的人，基本上还保留着农民的生活方式。在去苏联东部和亚洲的莫斯科喀山车站，一到夜晚，那场面就活象是一个临时难民营。乡村打扮的农民（他们大半是去首

都出售果品,并购买家乡所匮乏的商品的),睡在车站的地面上,等人来接关系。

东欧的农民(不问是务农的农民,还是做工的农民)仍然是一大批没有被社会所同化的人群。他们的存在就是对现代化的挑战,同时,也是那些国家共产党想消除旧时代的痕迹,从而创造“共产主义新人”的障碍。农民阶级的生活方式和旧思想、旧习惯是进步的一大阻力。

实际情况是,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虽在某些作物的经营上能提供高产,但对那些财政困难的共产党政府来说,对农业投资所需的资金是非常可观的。反之,个体农民却几乎不必花费国家一文钱。即使在苏联,集体农庄庄员的自留地上生产的食物量,要占全国消费量的四分之一。小面积的、据认为是效率很低的自留地(喂两头猪,养几只鸡、鹅,种上几畦瓜果、甜菜和玉米),竟仍然是社会主义农村中单位面积产量最高的天地。

自古以来,农民一向只跟亲友,而不跟外人打交道的本性,至今仍在自找“门路”的体制下留传下去。不管南斯拉夫人或俄罗斯人把它叫做什么不同的名称,但所指的都是一回事:就是通过各种私人关系拉扯一下或许再搞点贿赂,从而可以避免按官样文章办事。实质上,“走门路”乃是用来避免种种令人哭笑不得的官僚主义以谋求生存的一种手段。

不久前,苏联《消息报》上发表过一篇报道,那是关于一列货车的过磷酸钙化肥的故事。这批化肥到达目的地时,那里的农民正等着要用这批化肥,而站上的干部却发现这批化肥看来很象咖啡豆,尝尝味道也象咖啡豆,原来的确就是咖啡豆。

有些看来是很琐碎的小事,但却一再发生,真令人火冒三丈。在整个东欧,谁要在商店里买点儿什么东西,就得排三个队,一是挑选商品的队,二是付款的队,三是取货的队。在苏

联,有些饭店工作人员在午餐时间关上店门,自己用午饭去了。

大多数苏联公民,如果知道他们购买商品时所交付的税款竟达商品价格的二分之一,肯定会吓一跳的。

间接税,特别是零售税,是共产主义国家的主要税源。但个人所得税很低,通常不到百分之十。这就给人们留下了一个印象,他们从国家得到的各种服务是“免费”的。大多数公民根本不知道国家每年要从他们身上榨取多少税款。有人认为下面这种说法是完全言之成理的,既然国家不向公民报账,公民当然也没有必要向国家汇报他们占了国家多少小便宜了。

苏联和东欧的年青一代

“约凡”是一位青年社会科学家和管理专家。如果不是出生在一个属于苏联集团的国家里,而是生在美国,他很可能为麦戈文搞竞选工作。跟美国的许多青年麦戈文派一样,约凡要改变他的社会——而他的社会恰恰是一个共产主义社会。他肯定不是个革命者或激进分子。他从未参加过任何一次东欧学生的示威。不过,他的世界观是地地道道地反体制的。

在他看来,东欧国家的现状就是,人民生活水平差、愿望受限制、工作效率低、官僚主义者管理失当、教育制度呆板以及父母一代在政治上不开朗等。他学习管理和社会科学,就是因为这两门学科,是他认为得以改变所有这一切的工具。

约凡还不满三十岁,是他那个国家统治集团的当然成员。他是作为党员父母的子女和共产主义教育的产品而采取了改良主义观点的。他代表着追求改变和现代化的那股势力。

约凡们在东欧很普遍,但在苏联,却几乎是闻所未闻的。反对苏联现状的青年当然是有的,他们不是现行体制所宠爱的子

女。在苏联留学的外国学生，一定会说他们的苏联同学是保守的、满足现状的、对自身以外的问题是漠不关心的。一位在苏联大学里学医的匈牙利青年写信给父母说，他在学院里，连一个“持有不同政见者”也尚未发现。俄国学生中没有一个人看索尔仁尼琴的书，听外国电台广播，对苏联的前途提出什么根本性的问题。

苏联社会不象东欧国家那么容易研究和理解。看来，如果说苏联青年比较老实，这大概是公正的，也不妨说他们少年老成。

但是，东欧的约凡们反映着一种不懈的质问和改良精神。这种精神，目前在匈牙利、波兰、南斯拉夫和东德很普遍，而对苏联的青年则格格不入。这些人在东欧为数虽多，但仍然是只占少数。东欧的大多数年青人，正如美国和大多数其他国家的年青人一样，基本上是保守的，而且并不倾向于搞试验。

近年来，约凡目睹了本国社会的种种巨变。他也希望（而且在乐观的时候还预期）能在今后的年代里，看到更多的变化。但他的希望又因怀疑而变得冷酷了。他被描述成是一个“建设性的机会主义者”。

比如说，看看他和其他东欧国家的那些同时代人是怎么看待共产党的吧。在俄国，他的那种态度，肯定会被当作歪门邪道的。约凡说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内心的共产主义者”。但他不是党员，而且“在准备承担义务之前”还无意入党。对许多东欧青年来说，党籍再加上露骨的追名逐利，包括迎合党的路线在内，仍然同在苏联一样，是青云直上所必不可少的。

但至少在某些国家，特别是波兰、匈牙利和南斯拉夫，这种情况也慢慢地有所改变：一个非共产主义者的青年人也能发挥

作用,也能有前途了。对新的技术尖子不再提政治要求这一点,鼓励了这种趋势的发展。一个表示关切这种情况的列宁格勒共青团头头说:“波兰青年应比现在更积极要求入党。”(对此,波兰的一位编辑回答说:“我们要吸收青年入党并不难;相反地,那些有问题的、志愿入党的野心家却是太多了。”))

东欧青年和苏联青年的态度之所以有这样的差距,是由于他们没有共同的经历。这种经历对三十岁以下的东欧人来说太多了,诸如: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华沙条约国的入侵、同年华沙和贝尔格莱德的学生游行以及一九七一年南斯拉夫萨格勒布大学生罢课等等。东欧知识青年在那多事之秋,多少都有所触动。俄国青年对这些事件就不甚了解,而且除了在捷克服役的苏联士兵之外,谁也没有亲眼目睹过这些事件。

对造反和叛逆的镇压,并没有煞住同西方思想和西方时尚日益增加的接触。从表面现象来看,蓝色斜纹布“牛仔”裤、宽表带和超短裙要算服饰中最时髦的了。对这些,当局表示宽容,也许是作为一种安抚的方式吧。同时当局还指出,这些西方社会的小玩艺,是无关宏旨的。

因为无法有效地禁止西方音乐的流行,当局只好采取宽容的办法。现在,人们可以在每周星期一晚上,在东德的“旋律”俱乐部听到西方的爵士音乐。在那里挤满了奇装异服、留着长发的人群,还得靠警官把这些人嘘走。匈牙利设立了许多“唱片俱乐部”。这是由布达佩斯文化宫主办的,青年人可以在那里用磁带录音机把西方音乐录下来。而报界对外贸机构不进口足够的西方唱片还提出了批评。波兰有一个专搞唱片经营的人说:“我们没有实际困难,因为我们对青年人的作用就跟尼古丁一样。我们也没有什么危害。恰恰相反,我们让青年人高高兴兴地积下钱来买汽车、住公寓。”

在波兰对全国青年唯一有影响的组织是天主教会。据估计,百分之七十的波兰青年都受过某种程度的正式宗教训练。

同天主教会并驾齐驱的,是在东欧非常突出的那种牢固的家庭关系。它能有效地同党的工作者对青年进行的教育工作争一个高低。每天(或至少每周)一次的“家宴”制度(一顿“家宴”可长达数小时之久),可以把信天主教的爷爷、共产党员的爹妈和爱好打扮和摇摆音乐的子女拉到一块儿。在这样三代同堂的气氛中,政治就失去了它的重要性。

另一个大问题就是,受教育的机会一直是不平等的。苏联社会学家指出这样的情况:知识阶层出身的子女,上大学的机会要比工人子女多得多。现在统治苏联和东欧的新统治阶级,望子成龙之心,决不亚于老统治阶级。

(摘译自一九七三年四月美国《新闻专辑》杂志 陈中
绳译)

跨国公司剖视

薛 路

近几年来，帝国主义国家的报刊书籍，对一种名为“跨国公司”的垄断组织十分重视。他们把这种“跨国公司”吹得神乎其神，说什么“旨在谋求福利”，促进“全球性利益”，什么有“消除国境线的潜在力量”，“将会减少人民间交往的隔阂”，“有助于建立一个稳固的世界秩序的基础”，什么“将能防止发生暴力”，因为“经济上的密切交叉”，使大家了解“作战是不符合他们的利益的”，等等。肩负这么多“光荣使命”，难怪美国的戴维·C·金会给它作出这么一个概括：跨国公司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它将是“世界希望的所在”。

那末，到底什么是跨国公司？浏览外国文章，各有各的说法，究其基本概念，无非是那么一种被称作“国际性”的公司：机构遍布全球，资本来自四方。不过，这种以资本输出为主要特征的跨国公司对我们来说也并不新鲜。当年盘踞在旧中国的美孚石油公司、颐中烟草公司（原为英美烟草公司）等等，实际上已初具跨国公司的规模了。今天的跨国公司当然已非昔日可比，它范围更广，规模更大，已成了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在世界上的主要垄断组织形式。

这种国际性的资本主义垄断大公司，是怎么在“促进全球性的利益”的呢？看一看被帝国主义说成“受益最大”的第三世界

情况,就可想而知了。

第三世界,拥有丰富的劳动力的资源,是跨国公司廉价掠夺的对象。在美国的电子元件工业中,工人每小时的工资是三点二一美元。但是,那些开设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子公司中,当地工人的工资就低得多:马来西亚是三十七美分,泰国十九美分……。血腥的奴役和残酷的剥削,是跨国公司给予第三世界广大工人的莫大“恩惠”。

第三世界,是跨国公司恣意掠夺资源、大量倾销商品的场所。中东的石油,东南亚的橡胶,拉美的铜、锌、可可等,都是跨国公司掠夺的对象。这些资源价格低廉,开采方便,如在美国国内开采一吨石油要花九点七二美元,而在科威特则是零点六四美元。跨国公司魔鬼的吸盘,拼命地吮吸着第三世界的资源和膏血。同时,设在第三世界许多国家的跨国公司,一般是就地生产,就地销售,严重阻碍着这些国家自力更生地发展自己的民族工业。

第三世界,也是跨国公司输出工业污染的场所。在新加坡,今天已经是毒雾迷漫。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秀丽河山,已经成为跨国公司输出工业污染的牺牲品。跨国公司不仅剥削和掠夺第三世界许多国家人民,而且还要摧残他们和他们后代的健康。

跨国公司,又是帝国主义控制、镇压第三世界反帝斗争的经济和政治力量。被称为“绿色魔鬼”的联合果品公司颠覆了危地马拉的反美政权。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用金钱阻挠过智利社会党领导人阿连德当选总统;一旦阻挠不成,它又积极策划了推翻阿连德政权的政变。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跨国公司的血淋淋的罪行。

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对于跨国公司的奴役,都有切身感受。阿连德生前曾经说过:跨国公司的“毒辣行为扩及全球,它的阴

险手法影响到各个国家”。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布迈丁也说：“第三世界国家正在遭到外国大国和跨国公司的压力和限制，它们把第三世界置于经济上的依赖和从属地位，从而使他们的一切发展的努力全部落空。”这些话是对跨国公司所谓“造福”于第三世界的有力的控诉。

跨国公司既然能“促进全球性的利益”，那末，也应该造福于第二世界了。事实是不是这样呢？也不是。据有关方面统计，在世界上一批最大的跨国公司中，尽管公司的资本也来自许多国家，但是，资本的多数份额为美国大垄断资本家所有。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几百个巨型跨国公司中，美国就占了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一九七一年，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为二千六百五十亿美元，其中美国占八百六十亿美元，为百分之五十二。因此，这些跨国公司的业务，实际上操纵在美国大垄断资本家手中，为美国的垄断资本利益服务。跨国公司成了美国利用外国资本进一步掠夺外国财富的工具。这就难怪加拿大人对美国跨国公司的活动感到恐惧：“使我们感到不安的……是休斯顿、匹兹堡和好莱坞”，因为这三个城市是美国石油、钢铁和电影等跨国公司的本营。加拿大是美国的紧邻，是美国跨国公司首先注意的目标。因此，他们担心加拿大的重要工业城市多伦多有朝一日将“会被得克萨斯的计算机在运算程序中所排除掉”，是不无理由的。

那末，跨国公司对第一世界的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来说，会给他们带来怎样的“福利”呢？“福利”是有的，就是失业。跨国公司在美国国内又名“逃迁公司”。为了到其他国家，特别是到第三世界去掠夺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美国垄断资本不顾本国工人的死活，大肆拆厂、迁厂，造成了国内大批工人失业，许多城市萧条。美国电子工业部门由于这个原因，在一九六七年到

一九七二年这五年中，就减少了近二十二万名工人的就业机会。

跨国公司拼命掠夺和剥削全世界人民，它所真正“造福”的只能是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以及世界各地的走狗喽罗。就以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来说，一九七〇年，它的百分之五十九的利润来自海外。一九七二年，美国从海外获得的利润高达一百二十四亿美元。“全球福利”是假，垄断资产阶级的暴利是真。

“有消除国境线的潜在力量”，是跨国公司“静悄悄的革命”的第二个论据。从某种角度来说，这话多少有点道理，因为跨国公司的魔爪已经伸展到世界各地，无孔不入，无利不撈，它当然不喜欢什么国界和民族的界线。如果那个国家稍有反抗，就施加经济压力，甚至进行军事干涉，反正是逆我者亡，顺我者也亡。

跨国公司要打破其他国家的国界，但它决不消除帝国主义超级大国自己的国界，相反，它们的“国界”却因此而大大扩大了。例如，美国利用它所控制的子公司所在国贸易关系中的海外法权，将它的禁运法令强加到其他国家头上。苏修通过“经互会”，在“国际分工”、“经济一体化”的幌子下，严格控制了各成员国的财政经济、生产计划、产品分配和材料供应，实际上已使这些国家沦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附庸。

至于跨国公司能“防止暴力和冲突”，能“消除战争”，那更是十足的奇谈怪论。跨国公司的普遍出现，只不过是帝国主义垄断进一步发展的具体表现。列宁说，垄断并不能排除竞争。同样，跨国公司并不能排除资本主义世界范围内的各种竞争，特别是美苏两霸之间的激烈竞争。“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几个大国都想争夺霸权”。美苏两霸口中的“缓和”，只不过是扩军备战的遮羞布，今天就连这么一块遮羞布也被丢在一边了，显露出来的就是穷凶极恶的强盗本色，双方都在磨刀霍霍，准备在某个地方拼杀一场。“为了削弱敌方，摧毁敌方的霸权”，帝国主

义垄断组织包括跨国公司的进一步发展，只能进一步加强帝国主义特别是美苏两霸的矛盾和冲突，使战争因素增长，“帝国主义的战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

把跨国公司说成是能给世界人民“带来福利”，能“消除竞争和战争”，能带来“全球和平和安宁”，是“世界希望的所在”的一场“静悄悄的革命”，这些都只不过是骗人的鬼话。还其庐山真面目，跨国公司是帝国主义争霸世界的工具。同鼓吹“跨国公司”的作者们的愿望相反，帝国主义，特别是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一切反革命活动，只能起到激怒全世界人民起来同它们作拼死斗争的作用。“帝国主义驱使全世界的人民大众走上消灭帝国主义的伟大斗争的历史时代”。跨国公司的魔爪必将被全世界人民砍断。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必将被全世界人民埋葬。这就是真正的“世界希望的所在”。

跨国公司：静悄悄的革命？

〔美〕戴维·C·金

世界上的一件新事物？

在过去二十年，世界经济中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虽然，一般人很少注意到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许多专家却认为，已经发生了由量变所形成的质变。其来势之凶猛，称得上是另一次工业革命。这和所有的重大经济发展一样，会深刻地影响到我们的社会和政治生活。

这次革命是跨国公司的产物。

跨国公司是什么东西？

用最简单的话来说，跨国公司就是不止在国外一个国家开厂或设立办事机构的公司。通常，一家公司所生产的商品主要是在国内市场上销售。如果可能，才把多余产品输往国外。跨国公司的情况就不一样，它在国外所进行的业务，几乎和在国内同样多。这种海外业务，我们的专门名词就是国外直接投资，就是说，跨国公司或它的一个分支机构把资本直接投到国外的工厂或办事机构等等。

今天，世界上所生产的产品和劳务，约有百分之二十五是由跨国公司所控制的。某些公司，如国际商业机器公司、通用汽车

公司、英荷壳牌石油公司、三菱公司、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等，都是属于在一百多个国家进行业务活动的大公司。随着它们的成长和在全球的分布，跨国公司也发展了许多新的业务。这些各种各样业务的领域，往往和它的母公司原有的产品或劳务没有直接联系。这种公司也称之为多种经营公司。例如，日本的三菱公司是经营汽车制造、电气设备、化工、矿业、塑料、玻璃、酿酒、造船、人寿保险以及银行等各种完全不同业务的企业。

到七十年代末，按目前的增长率，美国人所拥有的公司，将占到英国整个商品生产的百分之二十五。

在美国的缝纫机销售量中，有三分之二是在国外生产的。

一九六〇到一九七〇年，美国在国外的直接投资额增加了百分之一百四十三。

西德投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资本，要比它投在西德以外的世界其他地区更多。

在美国的两百家最大的公司中，有八十家公司的百分之二十五以上业务是在国外；而在其他国家的两百家最大的公司中，有八十家公司业务的四分之一或更多一些，也是在国外市场。

所有跨国公司的经济产量的总和，大于除美国和苏联以外的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

四百家以美国为基地的公司在日本经营业务，并和日本公司合作；日本人对这些合营企业坚持要保持百分之五十一的股票控制额。

欧洲公司所拥有的开设在美国的工厂，它的年产值为五百到七百亿美元。

在一百零六个国家拥有工厂和分支机构的国际商业机器公司，总公司设在美国；它的海外部头头是法国人，大多数雇员都不是美国人；它控制了法国计算机市场的三分之二。

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总管理处设在纽约，但它的四个研究部门中的三个设在其他国家；它在国外的产量相等于国内的产量，它的股东分散在几十个国家。

意大利菲亚特汽车公司在苏联建厂和培训工人，生产车辆。

全部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日本除外)的国家所生产的工业品，约占世界产量的百分之十弱；而欧洲、北美和日本所生产的则超过百分之九十。

五百多家以国外为基地的公司在美国开厂。

一家跨国公司的轮廓

闻名世界的那家小小的美国糖果厂(雀巢奶品公司)，实际上不是一家美国公司。它也并不很小，而是名列全球最大公司的行列。我们大多数人只知道这家生产巧克力糖的公司开设在纽约州的怀特普莱恩斯，但实际控制它的却是一家瑞士跨国公司——雀巢奶品公司，总公司设在日内瓦湖畔的韦维。

在一百年以前，雀巢奶品公司开始是经营婴儿食品的，现已成为一家现代化大公司了。它雇用了十一万人，销售额已达到世界公司的前三十名。虽然这公司向着世界范围发展，但仍为瑞士人所控制。它约有十万个股东，来自许多国家，但是在有表决权的股票中，至少有百分之五十一是掌握在瑞士公民的手中。

韦维的总公司对遍布全球的大量活动，起着中枢神经作用。雀巢奶品公司是一家巨大的持股公司，它控制了另外两家持股公司。一家是以巴拿马为基地，另一家是以拿骚^①为基地的。在持股公司之下还有许多分支公司，有的直接由雀巢公司所拥有，

^① 拉丁美洲巴哈马群岛联邦的首府。——译者

有的是大部分股票在雀巢公司控制之下。这些公司很清楚地可以认出是瑞士公司，因为它们用的都是雀巢的商标和名称。雀巢糖果、雀巢速溶咖啡以及雀巢可可，几乎销售到世界上每一个国家。但是许多附属公司，却用了另外的名称，如荷兰的巴赫曼面包公司，泰国的联合牛奶公司。

在韦维的跨国公司经理们，密切地控制着扩展在世界各地的业务网。每天从世界各个中心送来的情况报告，对社会、政治和经济情况提供了重要资料。加纳的可可收成情况如何？美国是否会有卡车罢工的威胁？智利的政治变动是怎样影响雀巢业务的？持股公司应否购进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家酿酒厂？经理们每天都必须从全球角度来考虑这些新问题和新的挑战。

对消费者的倾向、口味和爱好新奇，也都要加以注意。如从市场调查得到启示，欧洲人爱喝浓汤，而拉美各国却偏要稀汤。克罗斯·布莱克韦尔公司为适应不同的需要，在加拉加斯^①的罐头厂生产一种汤，而里斯本的厂就生产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汤。在美国，人们喜饮净水，雀巢公司认为这是进一步发展的好机会，于是就购进鹿园山矿泉水公司，从而获得了部分瓶装矿泉水的市场。

也许“发展”这个词汇，是理解跨国公司所经营的有关一切业务的关键。只要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有机会能增加销售额和利润，跨国公司就立即采取行动。大公司由于寻找新市场而变得愈来愈大。大量生产使它们能降低售价，这就使小公司越来越难于竞争了。

跨国公司的革命把这种扩张和强化转移到世界舞台，出现了我们通常所称的“全球性的超级市场”。它不是在某一个国家

^① 委内瑞拉首都。——译者

生产，然后出口；而是把整个业务活动都转移到“接受投资国”去，以免除进口税和运输费用。目前，雀巢公司有三百个工厂和六百七十七个销售机构，分散在六十个国家。有些公司甚至在国外开厂，再把产品运回本国。如胜家缝纫机公司发现利用墨西哥和台湾的低水平的工资可以降低成本，因此，现在它的大部分缝纫机就不在美国生产了。

象雀巢公司这样的跨国公司，要在全世界进行业务活动，它的经理和技术人员就要学会做全球的公民。他们既要安排经常性的旅行，也要在许多不同地区生活。这个公司的一位经理，在他或她的一生中，要在十二个不同国家生活是很平常的事情。雀巢公司断言，由于人员和设备的移动，就会变成每一个接受投资国的真正公民，就会使他关心当地社会的福利和政治活动。

批评跨国公司的人并不如此乐观。他们指出，大部分跨国公司的活动，仅限于西欧和北美的“富国”和日本，生活在“穷国”的人有三分之二，他们在跨国公司的革命中，所能取得的福利是很少的。例如，在雀巢公司的销售总额中，欧洲和美洲的业务要占百分之八十六，亚洲只有百分之十一，非洲是百分之三。

这个被称之为“雀巢”的公司，它究竟是一个“很好的小糖果公司”呢，还是一个“神秘的、在多方面有恶势力的章鱼式的公司”呢？如何答复，这就主要看你对跨国公司的革命怎样判断而定了。

过去、现在和将来

诚如你所看到的那样，跨国公司在世界舞台上的大量出现还是最近的事。一九五〇年以前，有过跨国的业务活动，但进展缓慢，并且很少有迹象可以看出，它将会在我们的社会和政治中起着这么大的变化。在五十年代，发展就象滚雪球那样，但仍旧

很少有人能预见它会有影响；只是在最近的十年或十二年期间，它的发展才具有引人注目的新特征。

在本世纪早期出现的第一个真正跨国公司，是在海外进行活动的石油和矿业公司。象美孚石油公司和英国石油公司这样的大公司，开始在具有丰富资源的不发达国家中开采石油。安纳康达铜公司和国际镍公司这样的矿业公司，不久在非洲和南美也同样如此。这些“提炼”企业似乎把不发达地区的天然财富取走了，并且还带来了白人殖民主义的压迫。这对跨国公司的业务活动抹上了污点。因为对很多人来说，就是由于海外业务的存在，才带来了经济帝国主义和剥削。

跨国的业务活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十年中继续发展。二十世纪初，有几个商业公司在外国开设分支机构，胜家缝纫机公司、伍尔沃思公司和可口可乐公司，就是在这个领域中最早的几家美国公司。在二十年代，跨国公司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象汽车这样新的工业部门。

大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终止了跨国公司的进一步发展。战后几年中，欧洲经济需要时间以便从战争破坏中得到恢复，美国公司获得了异乎寻常的好机会，在跨国公司的发展中领先前进。

一九五〇年美国的海外投资额约为七十五亿美元，它和危机前大致相等。这些资金大部分是投放在加拿大、拉美和中东的石油工业和矿业中。二十年以后，这种直接投资几乎增加了十倍，达到七百七十四亿美元。

在那二十年的时期中，不仅海外投资大大增加，而且除矿业和石油工业外，又从事于制造业和商业。增设制造业和商业的分支机构的一种理由是，大多数国家为了保护本国工业，几年前都分别建立了贸易壁垒，这就减少了在美国生产的商品出口到

这些国家去的利润。美国企业也发现其他国家(包括欧洲在内)的劳动力价格较低。此外,由于宇宙空间时代加快了运输和电讯的速度,使得跨国公司在经营管理方面要和海外机构取得密切的联系,较前更为简便。

随着欧洲工业恢复了战争创伤,它们以及还有日本、加拿大和少数拉美公司,都开始从事于跨国的冒险活动。虽然某些巨型跨国公司是以欧洲和日本为其基地,但是美国公司在整个跨国公司的活动中,还是要占到一半以上。

三千家美国公司及其四万名从业人员突然地进入欧洲各国,引起了接受投资国的错综复杂的反应。有些人欢迎它,认为能促进繁荣;许多人则开始觉得欧洲有成为美国卫星国的危险。现在特别关心的是美国渗透到象计算机之类的高精尖技术工业。虽然美国在欧洲生产的各种产品只占欧洲产量的百分之十弱,但它在欧洲生产的计算机,却要占到一九七〇年欧洲全部计算机产量的百分之八十。许多美国公司,为了取得更大的效果,采取了关闭工厂和解雇职工之类辣手的决定,因此遭到了批评。

某些人认为,美国的挑战,是一种对欧洲国家的经济大有帮助的推动力。欧洲大陆的业务活动所采取最新式的、规模较大的、有机动性的跨国公司,已逐渐代替了原有那种小的、家庭私有的企业。它们从美国的投资、技术和管理方面已获得了不少好处。由于共同市场的国家加强了相互间的团结,许多观察家认为,一个新的全欧范围的经济正在崛起,它在规模和力量方面都能与美国分庭抗礼了。

适者生存?——对国家的影响

跨国活动的扩大,再结合着运输、技术和电讯的不断革命,

就迅速地形成一种全球性的经济体系。世界各地现在都和这种全球性体系发生联系。

当然,国境仍然存在,但经济体系超越了它们。它和国家体制相重叠,往往在活动时国家似乎都不存在了。这个全球性体系在人民心目中印象深刻,于是发生了这样的问题,它对国家的未来究竟意味着什么?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个人将是忠于国家抑或公司呢?一个阿根廷人在土耳其的一家美国公司中工作,国民身分对他的意义是什么?当大的经济企业都操纵在超级巨型跨国公司手中时,一个国家将怎样来控制它的经济利益呢?跨国公司是否会冲毁国家的主权呢?

对上述这些问题的答复,只能根据当前趋势的想象来作出推论。有人在作出这些想象时同意说,跨国公司会和国家政府以及忠诚发生冲突的,业务革命所代表的是向着取得更为团结和更为和平的世界迈出了一大步。

雷蒙德·弗农指出:“主权国有正当的目标,它们试图把资源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如果跨国公司继续扩张下去,国家控制资源是否会每况愈下呢?有人感到,确实有这种危险,许多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的国家,将会失去对它们自己资源的控制。

富翁、穷人、乞丐、盗贼……

那些自己没有足够资本可以投入经济发展的国家该怎么办呢?当跨国公司在找寻直接投资机会时,它们究竟应该作出怎样的反应呢?它们应该怎样去劝导跨国公司把资本投放在它们的国家里呢?它们要冒怎样的风险以及它们如何掌握自己的未来命运呢?跨国公司又怎样呢?如果跨国公司所投资的企业突然被所在国政府收归国有,那末,它将要冒怎样的丧失投资的风

险呢？这些都是伤透脑筋的问题，也是接受投资国政府、跨国公司以及当跨国公司受到威胁时申请协助解决的投资国政府所面临的难题。

第三世界的窘境：情况的说明

假如你是拉美一个小国家统治集团的成员，而任务是对要不要鼓励跨国公司在本国国内活动作出决定。你在作出决定时，要考虑好多因素。

政治情况，首先是一位观察家称之为“十分敏感”的事情。有礼貌的说法，你的权力基础是非常不稳固的。你是靠诚实而微弱多数的选票而执政的。只要反对党认为你所做的事不符合国家最大的利益，他们就随时准备举行新选举。

你也要和政府外的极端分子集团进行斗争。在左面，激进的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在鼓动大规模的革命。他们说你在选举台上讲的“达到社会民主”只是资本家的宣传。有一位激进的左派分子说道：“我们不会袖手旁观，让这个政府出卖给资本家。如果有革命的需要，我们时刻都准备着。”

你也会在右面，碰到坚定的反动的民族主义分子。他们宁可要军事独裁，而不喜欢你标榜的“假民主”。尤其是，他们要求在你的国家中不要有外国势力。他们确信你将会从美国和欧洲取得发展援助。他们的报纸，在你选举胜利时的头栏标题将是：“美国佬帝国主义的胜利”。

如果政治情况不妙，经济情况就混乱。一小撮上层分子控制了大部分财富和土地。而大部分人是处于两种困境之一：一种是农民，是依靠为地主当佃户而维持生存的；另一种是失业的人，住在大城市周围的凄惨的小城镇上。全国按人口平均计算每人的年收入是两百美元。平均每天所吃的，折合热量只等于

正常需要的三分之二。

你是致力于寻找某些能减轻悲惨境况和提高生活水平的途径。但是这怎样能完成呢？你的国家，工业很少，没有资金可以开厂、造机器。学校、医院、住房和道路等，都是你的国家预算支出以外的一些重要项目。你能依赖什么资金来源呢？

跨国公司能提供部分答复吗？这是你必须决定的问题。

一家美国公司提出了某种很能吸引人的条件。它要在你的国家中建造四个厂。总就业人数将超过五万多，它答应雇员中至少百分之八十是当地的居民。

公司还提出其他鼓舞人心的情况：当地人民可以受训并担任技术和经理职务；每一家厂所在的地区都将建设学校和医院；公司将提供简易贷款或建造费用低的住房。

很清楚，这笔交易是有助于发展经济的。但是你能否冒这风险？你将遭到反对，可能会出现恐怖主义行动或大规模的暴动。即使你能维持你的控制，但并不有助于你的威望。

最使你为难的是，你对反对党派有某些同情心，也耽心在自己国家中“存在着美国佬”的问题。经验使许多人不信任外国企业，特别是美国企业。如果美国经济势力出现了，你能否逃避它的政治影响？

要作出决定是很难的，但这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决定。

跨国公司：是一种帮助呢还是一种危险？

第三世界的大多数国家，为了取得国家独立和现代工业化经济，在本世纪经历了长期的和艰苦的斗争。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岁月里，大多数国家才真正取得了独立。但事实证明，经济发展是更为困难的。工业化需要大量资本、熟练劳动力、建设工厂和受过训练的管理人员。虽然它们从工业化国家

中得到了一些外来的援助,但还不足以从事大规模的工业化。

结果是,第三世界最好的希望是,大的跨国公司能在它们的国内开厂。许多观察家认为,跨国公司的活动已对这些国家起了重大的帮助,并且今后将更有帮助。另一方面,第三世界的许多人,把跨国公司的活动,特别是当牵涉到一个美国公司的时候总看作是“剥削”、“掠夺”和“贪得利润”的事例。批评者指出,当公司利润继续上升时,不发达国家中的情况很少有变动。事实上,在多年的努力后,许多人在消除贫困和采取工业化措施的战役中败下阵来。按人口计算,拉丁美洲每人的平均收入每年是三百到四百美元;亚洲是五十到一百美元,中东可能更低。即使跨国公司在扩张时期,“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差距还是愈来愈大。

对跨国公司和发展中国家关系的看法

赞成者说

致力于经济合理化的跨国公司,促进了大家的全球性利益,而不局限于单独一个主权国家的狭隘利益。跨国公司是对付泛滥成灾的民族主义的有效办法,它的唯一政治武器是有能力离开一个不友好的国家。这种政治和经济的刺激有利于接受投资国家的利益。

跨国公司是训练人民掌握现代经营技术的最好的组

反对者说

跨国公司从负责的政治控制中拿去了相当一部分的国民经济控制权,不能避免来自投资国的不合适的政治影响。跨国公司侵犯了国家主权和破坏了国民经济政策。它使各个行业趋于分散,导致企业家数激增而没有集中起来的希望。

它并不训练人民掌握企业技术,而这种技术对一个发

织结构。

要普及技术没有比这更为有效的手段了。

跨国公司是转移资本到发展中国家去的最有希望的手段，它在克服仍在扩大的收入差距中将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有助于世界和平。

跨国公司的合理和完整的全球性活动，其效力是无与伦比的。

跨国公司促进竞争，打破了当地的垄断。它对消费者可提供价廉物美的产品，并能为接受投资国发展一个新的出口工业。

跨国公司的管理越来越灵活，对当地习惯和情况更为敏感，是事实上和精神上的名不虚传的国际性公司。

展中国家来说，甚至比掌握行政技术更为需要。

跨国公司把技术转移减少到最低限度，所采取的手法是：将研究和发展工作限制在母公司和技术保密，不训练接受投资国的人民担任研究和发展职位。

跨国公司所引进的资本，要比接受投资国以借款人身分向资本市场借款所花的代价高昂得多。

生产合理化有时是一种逃税方法。跨国公司对劳务和其他项目造假帐并把利润转移到低税率国家中去。

从规模来说，跨国公司和当地企业作竞争，是一种不公平的竞争。它一定抢先经营发展快、利润高的技术先进的工业，而忽视较老的、竞争较多的领域。

母公司的利益仍是主要的，因而跨国公司从来也不会真正变为国际性。它往往拒绝外国人担任高级的管理工作，

或不允许接受投资国人民购买它的股份。

跨国公司是促进变化的代理人，它改变了价值制度、社会态度和行为模式，这一切最终将会减少各国人民间交往的隔阂，它将有助于建立一个稳固的世界秩序的基础。

跨国公司远远不能消除各国人民间的隔阂，而是加剧紧张，并促使发生民族主义。有一切迹象可以看出，这种趋向在未来的若干年内将会加强。

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将来世界会更为和平吗？

跨国公司的规模及其日益增长的权力，令人想到它们对更为和平的世界的前景的影响。有的认为，它将加剧国际冲突。每一笔投资都依靠接受投资国家的稳定。一个国家国内不安定、内战或和其他国家作战，外国企业就向本国政府请求保护和干预。例如，一九五八年美国政府通过中央情报局在危地马拉内政中起了压制作用。大家认为，如果美国的联合果品公司在那里没有大量投资，那是不会发生的。

但许多人认为，跨国公司的发展是世界更为统一的主要力量。他们争论说，大的全球性的投资者将能防止发生暴力，因为暴力会瓦解或破坏它们的一切设施。经济是密切交叉的，国家了解到和它们所依赖的国家作战，是不符合它们的利益的。也有人争论说，和其他国家增加联系，加强互相访问，就能促进国际谅解。

在共产主义国家中的资本主义企业：情况的说明

一九七〇年春，亨利·福特第二到苏联，苏联政府建议福特

汽车公司在那里建造一座卡车装配厂。福特同意了这一个意见，但是美国政府进行干涉。当时的国防部长梅尔文·莱尔德提出问题，究竟这样做是不是符合我们的利益。那时美国正陷在越南无法脱身，它所作战的敌人是由俄国援助的。美机在攻击苏联供应的卡车时被击落。这些批评足以使福特改变想法，谈判即告中止。

福特的计划只是来得太快了一些。在此后的三年中，冷战气氛大大地改变了，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共产主义国家中建厂。第一批中的一个菲亚特汽车公司，建造了一座大型的陶里亚蒂汽车厂。雷诺和国际收割机公司也效法在东欧建厂。包括百事可乐公司的许多美国公司，目前都在苏联和东欧开厂了。

共产主义国家的政府所面临的一个困难是，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解释同跨国公司企业和解的问题。通常，这种问题是以所谓合作生产协定来解决的，跨国公司提供资本、管理技能和技术，共产主义国家提供劳动力、厂房和原材料，但保持财产和产品所有权。在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所拟订的协定条文就更为复杂。

实业界人士坚持说，除了寻找利润外，也有理由要和共产主义国家合作。亨利·福特第二这样说：“作为一个在世界各地有利益的大型跨国公司的董事长，我认为国家间有良好的贸易关系，是能促进国际谅解和减少紧张气氛的。”菲亚特的董事长乔瓦尼·阿涅利对这种有利于整个世界经济的相互依赖，曾给予阐述说：“工业化经济的西方和东欧的合作，可以扩大经济和政治基础，没有这基础，变得更为迫切的第三世界问题就不能得到解决。”

许多人同意，经济上的相互依赖确实缓和了紧张局势。每一方都有求于它的对方，这种相互需要减少了敌意。例如，日俄

关系不好已有很长的历史了。但是日本跨国公司和苏联打交道，协助开发丰富的西伯利亚油田。苏联从这协定取得了开发石油的技术和资本，而日本则取得了它巨大工业迫切需要的新的石油供应。人们争论说，没有一方会危及这种合作事业，日苏结成了伙伴。

交换意见：全球性经济是否意味着世界更为和平？

全球性公司的巨大威力，可以对战争或和平问题起着积极或消极的作用。人们可以看到，资本主义国家和共产主义国家的军事-工业集团，能把流血战争限制在某一个局部地区，如在中东、刚果、印度-巴基斯坦以及其他地区。乔治·塞耶在《战争生意》一书中指出：非政府的军备贸易每年达五十亿美元，它“大于三十年代初整个世界每年用于国防的总金额”。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赠送和出售的军事设备价值五百亿美元，苏联和中国又另外增加七十亿美元。正如塞耶所指出的：“虽然军火在贸易和外交上有用，但不能和它的杀人作用相分离”。

另一方面，人们辩论说，大量的国际业务活动是和军备很少或甚至没有关系的。跨国公司是在非军事业务中急剧地发展的。甚至更为重要的是，它的活动事实上扩大到了全球，和平的业务活动一旦发生任何混乱，就会损害跨国公司。结果是，如果它们对政府施加影响，就会阻止战争。

以下是关于跨国公司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影响的两种相反的意见。

亨利·福特第二说道：“国际贸易并不能使战争不发生，但是它确能使战争的可能性减少。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在三十年代末期，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那时国际贸易关系由于危机而破裂，国际货币协定瓦解和保护关税增加。自从第二次世界大

战后，西欧经济的相互交织，现在已使西方任何国家要和别国作战成为不可思议的事了。这是史无前例的情况。”

肯尼思·华尔兹在《国家相互依赖的神话》一文中写道：“三十年代的‘和平是不可分割的’口号，意思是任何地区的一场小战争就意味着处处有战争，除非小战争能设法予以制止。多米诺骨牌的理论（指一个倒下其余的也随之而倒的连锁反应的情况）是老理论。它在经济上通常的说法是，在穷国的汪洋大海包围之中，美国不能以富裕孤岛的形式生存下去。从这种提法出发，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日益密切的相互依赖将会改进和平的时机。”

“但是相互密切依赖意味着接触密切，至少会产生偶然性的冲突。最凶猛的内战和大流血的国际战争，都是在完全相同的人民居住的地区打起来的，他们之间的事务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

国家控制的问题

一九七三年初，两个美国参议员小组委员会开始审查美国跨国公司的活动。那时，联合国也组织了一批专家进行为期两年的调查研究，目的是要决定：跨国公司是不是要控制和用什么办法来控制它。

一九七一年，国会提出了一项法案要对跨国公司进行控制。这个伯克-哈特基法案，得到了工会领袖的广泛支持。商界人士攻击它是“令人窒息的”。按商业杂志《福布斯》的说法，法案的目的是“要把目前以美国为基地的跨国公司致于死命或弄成残废”。

虽然法案决没有成功的机会，但它展开了公开的辩论。辩

论还在继续进行着。

赞成控制的意见

劳联-产联主席乔治·米尼说：“世界经济在过去二十年中起了很大变化，美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自六十年代早期起迅速恶化，……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下降，大部分是在美国公司的活动方面。我坚信，甚至从美国企业的利益来看，这些活动很多都是目光短浅的。

“无疑，在国外设厂的活动，是一种容易赚钱的做法。……这种工厂有了美国的技术和专门技能，可以和美国国内相同规模厂的效率相等。从每小时工资是十二美分、二十五美分或甚至三十美分来看，劳动力费用的有利条件是很显然的。还有纳税的有利条件。……美国工人的小时平均工资约为三点八美元，是不能和使用同样机器、技能以及工资要少百分之五十到九十的外国工人相竞争的。但是，对每小时工资为十二美分、二十五美分或即使五十美分的工人，是不能供应很多的电视机或其他并不急需的大量消费品的。

“公司走向何处去呢？它的主要市场是在美国国内，这几乎是每一家美国公司，甚至大多数的巨型跨国公司也是这样活动的，并且那个市场是根据美国的生活水平、工资额、消费者的购买力而形成的。

“但是，失业的美国工人，也就是一个不能购买美国产品的消费者，他也是一个缴不出捐税的人。他不能靠失业保险金来购买许多东西。当领取失业保险金期满后，他不得不靠社会救济，这就增加了社会的负担。

“但是，我们所谈的不是一个工人或一个工厂。我们谈的是整个工业和整个社会受到打击。我们谈的是每年输出了成千成

万的职位。”

众议员亨利·S·罗伊斯(威斯康星州民主党人)说：“尽管跨国公司对更为繁荣的世界作出了贡献，但它对就业、对短期资金流动、对环境保护、对政府和它们的官员是要负某些责任的。

“跨国公司越来越担任了超级政府的角色，没有一个国际政治结构能和它们相匹敌。美国一般公民试图要跨国公司尊重自然规律。但迄今未见卓有成效的苗头。”

• 反对管制的意见

参议员查尔斯·H·珀西(伊利诺斯州的共和党人)说：“一种新趋向是攻击美国公司在海外持有大量股份，……这种投资主要是为了应付市场需求，而这种需求单靠美国的出口又无法满足。

“我们的跨国公司根本没有抢去美国人的职位，或是作为投资资金的避难所，它是产生新职位并使美国在世界市场上保持强大的竞争力的积极力量。”

参议员雅各布·K·贾维茨(纽约州的共和党人)说：“我们的亿万经济出了毛病……是不能责怪那进口的四百五十亿，也不能责怪神话式的跨国公司这个魔鬼的。它通常被指责在国外的任意活动损害了所有的美国劳动人民。

“诽谤跨国公司是当前在国内外很风行的事。跨国公司的名称，产生了一个很有效的外国魔鬼的形象，似乎是在人性中需要某些东西来使它恢复。事实上，我们所谈论的是美国的大公司，它是我们私营经济部门中最为重要的，也是支付美国劳动人民日益增加的高工资的雇主。”

商业国际公司的总经理奥维尔·L·弗里曼说：“大量事实清楚地指出，国外投资使国内产生了就业机会，并对巩固美国经

济有着各方面的影响。……一个公司投在国外的资金愈多，国内的出口和就业率的增长也就愈快。

“如果阻止美国获取国外收益，那对我们的经济影响将是毁灭性的。许多公司可能无法生存。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在国外建厂并不阻止国内投资，它也并不加重国际收支逆差。”

国际控制问题

请考虑这样的可能性：美国政府为保护环境，现在通过了越来越多的限制性的工业条例。假设一家跨国公司的领导决定，控制污染的费用要减少利润，他们就怀疑是否能遵守这些条例并仍能继续进行业务活动。公司把主要的生产设备迁移到另一个国家去。在新的地区，公司并未遇到控制污染问题，接受投资国也很开心，预期新工业可以增进繁荣。

在今后的几年中，这样的情况可能变得很普遍。政治学家哈维·D·夏皮罗写道：“由于发达国家的污染控制条例愈来愈严厉，跨国公司就可能用收入接近纽约或芝加哥这类话来引诱不发达国家，而代价将是造成象新泽西北部或芝加哥南部那样的严重污染情况。”

许多实业界人士不同意这种预言。他们坚持说，现代公司开始证明它们是对社会负责的，是同政府和公民一样关心污染控制的。《华尔街杂志》说道，钢铁业将其资本额的百分之十三用于控制污染，造纸和纸浆业则为百分之二十。尽管有这种说法，污染问题却并未改善。工业用于防止污染费用的金额实在太小，和它的广告费用相比，简直是微不足道。

如果要拯救我们的环境，工业必须严格控制。但是怎样控制具有全球性活动的跨国公司呢？美国政府能否阻止我们某一公司迁移到别国去呢？一旦这个公司决定迁移，有什么方法实

施控制呢？当这一行动可能会增加全球污染时，美国要不要阻止发展中国家进行工业化呢？

接受投资国当然有权建立自己的污染标准。但对第三世界来说，现在最关心的是经济发展，而不是污染控制。英迪拉·甘地夫人提出问题说：“当那些住在乡村和贫民窟中的人们，还生活在到处都是细菌污染的环境里时，我们怎能对他们谈论关于保持海洋、河流、空气的洁净呢？”

许多人认为需要某些形式的国际环境保护计划。参议员埃德蒙·马斯基争辩说：“当某些科学家告诉我们五百架超音速运输机，可以破坏我们大气中的臭氧以及使我们暴露于致死的辐射之中，我们不能让一国来自行决定。”

业已采取初步措施（联合国环境保护计划），但这是提出了一批新问题。联合国能不能通过足以严格执行的控制办法呢？如能通过，全世界各国能接受这些建议吗？最后，如果建立和接受了严格控制，它们又怎样实行呢？

（摘译自一九七四年春季出版的美《国际通讯》跨国公司专辑 唐雄俊译）

跨国公司和发展中国家

〔美〕彼得·F·德鲁尔

跨国公司是战后经济领域中的一个最重要、最明显的革新，但它首先是远为重大的变革的象征。跨国公司反映了一种真正世界经济的出现。十九世纪的国际贸易理论曾认为“国际经济”是民族经济的凝聚，但现在的世界经济并不是民族经济的凝聚。跨国公司基本上是自治性质的，有它自己的动力，自己的需求形式，自己的机构——根据“特别提款权”，甚至有它自己的萌芽状态的货币和信贷体系。这是四百年来的第一次（从十六世纪末人们开始使用“主权”这一词汇算起），使领土的政治单位同经济单位不再是完全一致的了。

这一切看来是对民族政府的一种威胁，这是可以理解的。这种威胁，由于目前还没有人提出一种行得通的关于世界经济的理论，而显得愈益严重。其结果是，至今还没有一种业已证明有效和有预见性的经济政策，只能眼看各国政府在世界性的通货膨胀面前无能为力。

跨国公司只是一个症状。如果我们去压制它，可以预料，只能加重疾病。许多人不去治疗，而只想去战胜这种症状，因此，跨国公司完全有可能遭到严重的损害，甚至可能在下一个十年里遭到破坏。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这将是发达国家的政府，特别是跨国公司的本国政府，即美、英、德、法、日本、瑞典、荷兰和瑞士这些国家政府所干出来的。上述国家是百分之九十五的世界跨

国公司的所在地，它们一起至少占有跨国公司四分之三的营业额和利润。发展中国家除能对决议作些感情上的流露和语言文字上的表白外，其他就很少再能做些什么了。发展中国家还没有重要到能给跨国公司（或者给世界经济）以强大的推动力。

但是同时，真正世界经济的出现，对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种真正的希望。特别对于那些由于国家太小，而不能在现代技术、现代科研需要、现代资金需求、现代运输和通讯设备等条件下作为“民族经济”生存下去的小国来说，更是如此。今后的十年将是发展中国家最需要跨国公司，并将从中得到最好获利机会的年代。因为今后的十年，将是发展中国家必须为其历史上最大数量的新劳动大军寻找职业和收入的年代。而在这同时，发达国家将经历一个新加入劳动大军的人数大大缩减的年代——这种人数缩减，目前在日本和部分西欧国家已相当严重了，到七十年代后期，并将波及美国。发展中国家在今后十年里所急需解决的就业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有跨国公司的存在，需要有跨国公司的投资、技术及其管理技能，特别需要其市场和出口能力。

发展中国家要想既能得到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民族化，又能得到所需要的就业机会和出口收入，其最大希望还是通过世界经济的统一能力。如果它们愿意使用的话，这首先是跨国公司，因为跨国公司代表了一种全球性经济，它超越了国家的界限。

跨国公司如果仍然存在，今后面貌一定将会改观。它将会有不同的结构，并将是“超国”的、而不再是“跨国”的了。但是即使是今天的跨国公司，它也是（或者至少应该是）促使发展中国家达到有积极意义的民族化的一种最有效手段。

（摘译自一九七四年冬季号美国《外交季刊》 复旦
大学国际政治系译）

追逐利润 迁厂国外

〔美〕米切尔·齐默尔曼^①

当经济危机加深和维持公司利润继续上升变得日益困难的时候,越来越多的美国公司,着眼于向海外寻找出路。

数量更多的美国工人,正成为国际逃迁工厂的受害者。

电子工业

在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国际逃迁工厂曾使电子工人遭受了严重的打击。例如,美国无线电公司原先在田纳西州和俄亥俄州设有两个大型的电视机制造厂。但是,由于田纳西厂的工人们组织了工会,并且这两个厂的工人为改善条件而进行了长达十一周激烈的罢工斗争,因此,美国无线电公司决定迁厂,于一九七一年关闭了这两个厂,并把全部黑白电视机的生产迁往台湾,从而使六千名的美国工人失业。

几乎每一个电子工业公司都竞相仿效,纷纷关闭它们原在美国的工厂,改在低工资的台湾、南朝鲜、新加坡、香港和墨西哥从事活动。在一九六七到一九七二年期间,总计约有二十一万九千个美国电子工业的职位消失了。今天,旧金山海湾地区电子

^① 作者是联合阵线出版社题为《国际逃迁工厂：美国公司为什么逃迁国外》这本小册子的主要撰稿人。本文系作者和该社编辑部合写的。其中许多材料见太平洋周围地区研究所：《帝国主义在太平洋地区侵略札记》杂志。

工厂的解雇风，使人们日益担忧又一逃迁工厂浪潮的行将到来。

廉价劳动力，是掀起逃迁工厂旋风和它将继续发展的原因。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逃迁运动对于加利福尼亚州圣克拉拉的英特尔公司，是怎样起作用的。这个公司把在美国制造集成电路的元件，空运到马来西亚装配，再空运回到加利福尼亚进行测试，最后将产品送往市场——经常是再次横渡太平洋，运往日本。虽然经过了多次的往返运输，但公司在进行这些活动中，仍然获得可观的盈利，这是因为马来西亚的劳动力价格是低廉的，每小时工资只有三十七美分，而在美国，电子元件工业的每小时工资则为三点二一美元。

哪里有电子工业的逃迁工厂，那里的情况都是一样的。南朝鲜（那里的政府宣布对外资企业罢工是非法的）制造业的每小时平均工资为二十六美分。美国的国民半导体公司，曾在泰国设立了一家制造集成电路的工厂，一九七三年，那里的每小时平均工资为十九美分。

在所有这些地区，劳动人民都面临着残酷剥削的劳动条件、物价不断上涨、恶劣的居住条件和威胁身体健康的状况。一九七二年，在新加坡（电子工业逃迁工厂早期的天堂）发生了一万件的工伤事故，平均每十五个工人中就有一人工伤。

“良好的气候”

美国电子产品制造商的心里都有数，它们的繁荣是建筑在亚洲人民的贫困之上的。休利特·派卡德公司副总经理威廉·杜利特尔说明了，他们为什么去年决定在马来西亚投资，而不扩充新加坡的现有业务，是因为“新加坡的失业已迅速下降，劳动力市场正开始枯竭。而马来西亚有着相当良好的经济和政治

气候……那里有相当数量的失业。”失业越多，工资就能压得越低。

公司一旦逃迁到亚洲，它还能再次使用逃迁的手法，还可以玩弄新花招。当新加坡的劳动力越来越感到不足时，工资也就会有所提高。尽管政府当局对有组织的工人进行镇压，可是，到一九七四年夏季，国民半导体公司新加坡工厂的起点日工资已达一点七美元。该公司就解雇了新加坡厂的一千名工人，并宣布扩大它在马来西亚（那里的日工资仍然低于一点二美元）厂的生产计划。

很多被解雇的工人，都是经过新加坡当局发给特殊许可证的马来西亚移民。这些工人一旦被开除，政府当局就立即吊销过去颁发给他们的许可证。当他们返回马来西亚后，公司当局就策划它们在马来西亚的工厂重新再雇用他们。采用这种驱逐工人出境的手法，就使得工人们从“昂贵的”新加坡劳动力变成了“低廉的”马来西亚劳动力。

资本家的困境

资本家在向海外逃迁的过程中正面临着困境。吸引国外资本的低工资和悲惨的劳动条件，目前已成为导致人民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制度，从而使整个投资发生危险。

全盛无线电公司董事长约瑟夫·赖特注意到这点，他解释为什么“我们不想在国外生产”。他的最大理由是，因为这会“受到远为不稳的政局的影响”。

美国插手印度支那的失败，加重了资本家对革命（特别是亚洲的革命）的烦恼。这种担忧，已促使某些电子制造商正筹划在五年内，把它们逃迁在国外的某些装配活动撤回美国进行。但

是,这些设想,据《商业周刊》说是靠自动化来减低工资费用的。总之,他们只有在最大限度地减少雇工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恢复国内的某些工厂。

尽管高速运转和自动化提供了各种可能性,但电子工业的总趋势是,越来越多的生产阶段仍然会集中在海外来进行。

傀儡政府

当地的傀儡政府是它们的第一道防线。在美国政府(它提供金钱、中央情报局人员和武器)的帮助下,一些独裁者对旨在改善人民的处境或者管制外国公司的任何运动,都要进行残暴的镇压。

美国工人对于国际逃迁工厂能干些什么呢?答案是要靠怎样识别“敌人”而定。美国劳联-产联的头头们,把问题的焦点集中在“国外廉价劳动力”,而不是集中在跨国公司。他们竭力主张联合那些能施加压力、不让进口的资本家各阶层,声称此举可以保护美国工人的就业。他们要求人民去“购买美国货”。

但是,“购买美国货”运动,对于拯救就业往往没有多大影响,或者甚至毫无影响,电子工业特别是这样。购买台湾制造的全盛牌电视机而不买日本制造的索尼牌电视机,这对美国工人究竟有多大的帮助呢?

即使真的能保持一些美国的就业机会,保护主义也是自拆台脚的政策。如果美国严格限制进口,那末,外国政府也会采取报复手段,拒购美国货并鼓励他们的人民“购买日本货”和“购买英国货”。这样,制造外销商品的、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和国外的工人,将发现他们的职业岌岌可危。当然,美国和日本的失业工人无力购买这么多的商品,商业就将更加衰退,而国际周期性的

衰退也将继续下去。

保护主义既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那末，什么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呢？最近发生的反对逃迁工厂的三次斗争，指出了解决问题的途径。

持续达两年之久的反对得克萨斯州法拉公司工厂罢工的胜利，标志着把西南部工人组织起来的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突破。因为墨西哥族受到超级剥削，而西南部又是美国逃迁工厂的引人注目的国内去向。

夏威夷波罗工人一九七四年春季的罢工，直接反抗把波罗生产逃迁到菲律宾和泰国去。

试图组织工会而遭开除的旧金山唐人街某电子装配厂工人，正为要求复职、支付欠发工资和停止干扰而进行着斗争。李马公司工人们自觉制止了把他们那个地区作为这一带逃迁工厂的天堂。

同逃迁工厂斗争的一条主要原则是，把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们组织起来。当“廉价”劳动力变为更加昂贵（更加有组织和更加有政治觉悟）的时候，想当逃迁工厂的老板的兴趣也就减退了。

工人阶级的团结

工人阶级团结一致，是在美国国内和国际间反对逃迁工厂的关键。一些公司从一个国家跳到另一个国家，去搜罗廉价的和没有组织起来的劳动力。为了同帝国主义这种国际性制度作斗争，工人们还必须使他们的行动和团结国际化起来。

当美国工人们奋起反对帝国主义者干预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时候，他们就是对我们最坚强的同盟军在反对逃迁工厂的斗

争中，给予了直接的支持。

但是，当工厂逃迁时，这些厂的工人们能干些什么呢？怎样罢工才能使那些正在策划关厂的雇主受到损害？如果工人们行动及时，斗争坚决，那末，在反对逃迁工厂方面就有获得某些胜利的希望。如果工人们在公司准备逃迁前发动斗争，施加压力，就能迫使资方达成关于禁止逃迁，或者迫使公司支付关厂补贴的协议。有些工会在同逃迁公司作斗争中行动迟缓，他们只有在谈判中要抛出某些东西相要挟时才“提出”这个问题。如果工人们要在战斗中获得胜利，他们自己要主动行事，不要依靠那些工人贵族。

反对逃迁工厂的斗争，能够获得暂时的胜利。除非它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联系在一起，否则这个斗争不过是防御性的行动。只要帝国主义制度原封不动，就没有任何纲领能够持久地阻止国内工厂向外逃迁。只要穷国受帝国主义势力的统治，外国资本家对它们的廉价劳动力就垂涎三尺。只要我国的生产资源掌握在少数的资产阶级手中，他们为了追求利润，就会自由自在地作出决定，使成千上万的工人失去职业，甚至使整块整块的地区遭到破坏。

但是，这些情况将不会永远存在下去。国际的资本网是很容易为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所打破的。

（摘译自一九七四年秋季出版的美国《前卫》周刊
“关于美国工人及其斗争”专辑 费文星译）

跨国公司在考验中

〔美〕戴维·W·尤因^①

由于美国跨国公司投资于国外的工厂和设备的数字继续猛增，它们就成为国外评论家和国内工会的围攻目标。这里所提供的是论述跨国公司的五大论据和问题的实际材料。一九七二年二月在华盛顿召开了一次讨论工业国家前途的白宫会议，会上专家和预测者们一再提到跨国公司的作用。如果总统于十年前召开这种声势浩大的一系列会议，跨国公司的名称是否会提及都是疑问。但是今天跨国公司对投资人、经济学家、劳工领导人、公共政策制订人以及其他一些人们变得如此重要，以致高级经济论坛的负责会议日程者是不会把它遗漏的。

大约有两百家以美国为基地的公司通常被列入跨国公司行列。虽然对于这种公司没有大家公认的定义，但一般认为它是这样一种公司，在许多国家有生产和销售设备，能在全世界取得资本，依赖于国外收益，管理则着眼于全世界。跨国公司的名册中除了以美国为基地的公司外，还有许多以欧洲和日本为基地的公司，这中间包括早先就处于领导地位的公司如尤尼莱佛公司、飞利浦斯电气公司和英荷壳牌石油公司。

今日跨国公司的活动遍布全球。以美国为基地的跨国公司，它们在国外从事制造业的分支公司的销售额从一九六〇年的

^① 作者是《哈佛商业评论》的副编辑，哈佛大学商学院企业管理教授。——译者

两百三十六亿美元，上升到一九七〇年的七百六十八亿美元。在同一时期，美国在国外投资于工厂和设备的数额从三百二十亿美元猛增到七百八十亿美元，这情况主要是跨国公司所造成的。有时称之为“超巨人公司”和“看不见的帝国”的跨国公司被描述为世界希望的所在，因为它有传播技术知识和消除国境线的潜在力量。

然而以美国为基地的跨国公司，却处于危及生存的围攻之中。在拉美、中东和非洲，它们成为民族主义者攻击的目标，被硬说是在当地经济中取出多而放进少。另一方面，在美国国内，工会似乎是下定决心要把跨国公司致于死命或是要削弱它们，理由是它们把所需要的职位送了出去。跨国公司似乎是处于“稳输”的地位。如果它们对一个抱敌视态度的接受投资国产生的财富多而取出少，这就为劳联-产联抓住可以反对它们的把柄。如果它们能向工会证明它们为美国工人产生的职位多于送出去的，于是外国批评家就以此为证据，骂跨国公司是王八蛋。

如果跨国公司设法能从围攻中得救，它们也并不是没有麻烦了。它们必须和抱着怀疑态度的民族主义者作斗争，民族主义者认为跨国公司威胁了政治主权。这些新的经济超级明星应对谁负责任呢？

幸运得很，一批又一批的学者收集了实际资料，这样可以搞搞清楚有关跨国公司的某些论据和问题。

对就业的影响

根据劳联-产联的说法，跨国公司雇用了低工资的外国工人，生产高技术的产品，因而夺去了美国工人的职位。这个组织又断言，这些国外分支公司把成品输到美国，取得高出平均水平

的利润。但是对这种新型公司抱着戒心的，不只是工会领袖。化学和一般工人工会国际联合会的秘书长查尔斯·莱文森声称，它“完全使对外贸易变了形”。他说：“以直接销售来代替出口的做法，废除了我们国际货币制度，打乱了整个贸易结构并使传统经济政策不起作用了。很有可能，它将永远损害政府在很多重要经济方面的控制能力。”

一九七一年年底，参议员万斯·哈特基（印第安纳州民主党人）和众议员詹姆斯·伯克（马萨诸塞州民主党人）联合提出一个法案，要抑制跨国公司的活动，以消除美国就业机会枯竭的现象（据称，哈特基-伯克法案将要把大多数跨国公司在活动中所得的利润减少一半）。

这个法案是要大大提高跨国公司从国外厂得来的收入在美国应缴纳的税款；它也要加紧控制国外投资；要废止当前某些有利于跨国公司的税则，以及用其他各种方法加紧美国政府对公司的管制。

一位劳工战略家解释说：“跨国公司是早先从美国北部迁到南部的逃迁公司^①在今日的翻版。我们现在的公司是在向全世界逃迁。”

过去，工会一般是赞成进行国际贸易、资本和技术输出的。按照一位劳工专家盖伊·纳恩的意见，他们在六十年代时，就担心跨国公司将会在某一地区破坏各国之间的工人团结，并威胁到国际工资标准和劳动条件。

纳恩描述了一个工会（国际五金工人联合会）为保护全国工会权利和协调各不同国家的工资标准所采取的行动纲领。

新的估计：通常跨国公司的发言人和工会在论点上有争

^① 某些公司为了追求利润把工厂设到劳动力价格较低的地区和国家，这些公司称之为逃迁公司。——译者

论。然而，往往是争得面红耳赤而不能弄清问题。现在我们有一份具有事实和分析的报告^①，它是认真地研究各种情况和数字的。

在哈佛大学商学院副教授罗伯特·B·斯托鲍领导下，由十二位学者组成的调研组对占美国海外制造业直接投资额百分之九十的九个大行业进行了调查。

跨国公司在海外建厂，对美国就业有什么影响？斯托鲍的报告认为：投资于国外生产，为美国工人所产生的职位要比所破坏的来得多。

如果以美国为基地的公司不在国外投资，对美国雇员的代价是很高的。估计要失去二十五万个生产职位，跨国公司总公司的二十五万个职位，十万个其他有关工作的职位。

然而，投资确要改变美国的贸易结构，这反过来是会扰乱美国某些部门中的就业情况。

调研组的结论是，为了帮助那些被排挤出来的美国工人，需要政府提供巨额补助金。

对国家经济的影响

国外投资对美国国际收支和贸易地位的影响究竟怎样？跨国公司经常被指责为，它是使美国在国际贸易中遭到某些困难的罪魁祸首。一九七一年在整个国际收支中，美国“基本项目”的逆差估计是八十四亿美元。

斯托鲍的调研组所进行的研究，并不证明跨国公司对这个问题有关。事实上，资料所反映的情况是，美国在国外的直接

^① 是指一九七二年出版的、哈佛大学副教授罗伯特·B·斯托鲍及其助手所写的《美国跨国公司和美国经济》一书。——译者

投资很明显对我们的国际收支是有利的。不仅如此，总统的国际经济事务助理彼得·G·彼得森在他的报告中指出，美国在其他国家进行直接投资，出去的投资额和进来的资金相比，很明显是收入多。这情况从一九六〇年起从未中断。在那一年，进出相比，收入大约多七十万美元；一九七〇年大约多十六亿美元。

跨国公司在其他国家的影响又是怎样呢？根据《雷德韦报告》，以英国为基地的企业在国外的直接投资为英国所取得的利润率，要比如果把资金投放在国内所取得的高出一倍。

西德尼·E·罗尔夫在《在世界经济中的跨国公司》一书中指出，英美两国的官员似乎都认为对外投资将来是对投资国有利的。然而，他们又争辩说，削减任何一年的资金外流数，都有助于短期内的国际收支。罗尔夫推翻这种论调。他说，如果英美的经验不能证明其他什么，至少可以证明将来和现在的两种矛盾是不能同时并存的。“将来有利是从现在开始的，如果一开始就跨错了一只脚，要调换步伐就越来越困难。”

研究美国国外投资对接受投资国的影响问题，英国的约翰·H·邓宁是主要的作者之一。在他的《美国投资在英国经济中的作用》一书分析中论证说，在生产、发展、效率和其他各项措施中，美国分支公司都胜过英国当地公司。他的资料也表明，以美国为基地的跨国公司改进了英国的国际收支，使经济得到好处。

企业界人士要想了解各个不同国家对国外投资的态度，《国外投资，接受投资国的经验》是一本有用的书。艾赛亚·A·利特瓦克和克里斯托弗·莫尔两位编者，汇编了比利时、法国、挪威、突尼斯、南非、日本、阿根廷、印度和其他国家人士的讨论情况。这本书的长处并不是事实的分析，而是在于它所发表的见解。

管理政策和实践

跨国公司的决策人是怎样做的呢？他们又是怎样创设和保持这一新型的公司呢？

对这个问题最好的评论，是来自一家最发达的跨国公司（尤尼莱佛公司）的董事长 E·G·伍德罗夫。他在哈佛大学约翰·迪博尔德讲座上，描述了尤尼莱佛公司的国际化管理：例如，加纳的经理是锡兰人，所罗门群岛的经理是加纳人，伦敦和鹿特丹总公司的管理人员既有澳大利亚、加纳、非洲和印度等国的人，也还有欧洲十个国家的人。

欧洲埃索公司伦敦办事处的三百个职工，除了美国人外，还有来自十六个国家的人员。

组织和管理 跨国公司管理中最困难的考验之一是，总公司和国外分支公司的领导关系。迈克尔·Z·布鲁克和 H·李·雷默斯所著《跨国公司的策略》一书，对这问题进行了讨论。

作者根据他们访问八十多个公司的领导人所得材料作出分析。技术方面的权威人士是赞成总公司和分支公司的关系要密切，而销售方面则赞成要有更多的自由和开放。尽管思想意识上有分散的想法，但趋势是走向总公司要更紧密的控制。

通用汽车公司前董事长弗雷德里克·G·唐纳在他的《世界范围的企业：它的挑战和前途》一书中，描述了通用汽车公司发展成为跨国公司的情况。他着重说，采取分散经营的政策，再配合上级的控制政策，是通用汽车公司长期来国内管理上的一个重要特点，这种做法证明在管理公司的环球业务时同样有效。

分歧和相似 雷蒙德·弗农所著的那本有名的、大家谈论得很多的书《主权陷于绝境》的贡献之一，就是收集了不少关

于跨国公司的目标、政策和策略方面的材料。除了有相同的动机和基本的业务性质,使它们被称为跨国公司外,这些公司并不相同。例如石油公司的历史和矿业公司的历史根本不同;在发达国家的分支公司根据经验所产生的组织和同一跨国公司在不发达国家所产生的完全不同。

和接受投资国的关系

跨国公司的经济含义及其管理的质量,并不是决定它未来的唯一因素。一个国家对跨国公司的了解非常重要,这种理解可能和跨国公司对经济发展及国际收支并没有多大关系。权威人士在这个问题上是怎样讲的呢?让我们先看经济发达国家。

金德尔伯格在他所编的《国际公司》论文集中提出了重要见解。海默而和罗索恩在该书题为《国际寡头》一文中,根据资料分析,表明以美国为基地的跨国公司在欧洲是多么可怕的竞争者,而且批评者很容易将资料按某种方式安排而夸大这种“巨大症”。因此足以理解,甚至在欧洲对于跨国公司威胁国家主权的情况,也存在着经久不变的恐惧。

但作者认为,欧洲跨国公司也在国外扩充,迟早它们能和以美国为基地的跨国公司相匹敌,分享世界市场。所以,欧洲人在世界经济事务中不必怕被压倒。

欧洲政府究竟怎样呢?作者也认为没有惊慌失措的理由。

难以处理的紧张关系 几乎在每一个跨国公司和接受投资国的关系上,都会发生经济需要和民族主义之间的矛盾。弗农在《主权陷于绝境》一书中提出几个经常出现的矛盾。他说,美国所控制的分支公司在许多情况下,要比接受投资国本国的公司和机构更能满足当地需要。

然而，以美国为基地的跨国公司有能力就造成祸根，因为效率高引起了怨恨和恐惧。弗农提到，欧洲曾屡次提议要对以外国为基地的跨国公司予以特别区别对待和限制。很有讽刺意味的是，限制并不解决问题。他写道：“没有理由可以盼望……对美国人所持有的分支公司采取正式限制措施，真会有助于减少紧张气氛。接受投资国的政府所非常需要的，不仅是对外国人持有的分支公司要加以控制，而是要想取得资金，它们认为这些分支公司中某些是可以提供资金的。”

在不发达国家中的情况预测 跨国公司在不发达经济中的处境怎样呢？根据弗农的讲法，南美安第斯集团国家的做法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先例”，也就是约定外国投资者在送交新投资初步建议的同时，要送一份转让计划，讲清楚要把所有权在十二年到十五年时期中逐步移转。

然而象M·A·阿德尔曼那样有经验的经济学家，则认为在不发达国家中，跨国公司的前途决不是暗淡的，甚至象以美国为基地的石油公司也是如此。它们由于企业规模巨大，又是外国人所持有并且是经营提炼工业，因此加剧了当地的仇恨。阿德尔曼在上述《国际公司》论文集的《世界石油中的跨国公司》一文中断言，“公司的重要生财不是它们过去的大量投资，而是它们在石油工业各方面的继续不断、日益改进的技能。不管它们是特许权所有人，还是承包人，它们在大多数生产国是活跃的……随着大油船和输油管的发展，公司在后勤方面的专门知识是更为重要而不是较不重要。”

由于跨国公司的消息时常牵涉到不发达国家，例如，非洲或拉美国家政府提出要征用或要求新的让步，所以当人们了解到美国公司在不发达国家的总投资额，远远不到投在发达国家经济中的金额的一半时，会使美国人大吃一惊。根据《彼得森报

告》，美国公司在不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累积数于一九七〇年达到二百十四亿美元。对比起来，投在欧洲、加拿大、日本和其他发达地区的直接投资累积数超过了五百三十亿美元。

国际管制的可能性

一位在布鲁塞尔的埃索化学公司工作的英国化学家这样说：“我认为象新泽西这样的公司所做的伟大事业之一，是为国际合作树立了榜样。我们向这种分散的世界证明，各个不同国籍的人和企业是可以友好地在一起工作，国际分歧不是不能克服的。”

当然，这种理想对跨国公司的经理们来说是重要的。可是，他们有时会对这种美好榜样的威力感到失望，人们是可以表示同情的。因为跨国公司所走过的道路是崎岖不平的，充满着政治危机和经济障碍。是否有希望让各国坐在一起商谈商谈，使工作进行能稍稍容易些呢？

企业界领袖如大陆制罐公司的董事长埃利森·L·哈泽德要求联合国来领导，消除某些由于国家提出要求而引起的经济困难。其他有些人则认为，象关税贸易总协定这种安排是必须并可以取得进展的，而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以在改进国际金融活动中起着关键作用。

在《国外的美国企业》一书中，金德尔伯格写道：“我希望美国能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一次国际公司的会议。”

弗农认为，要签订国际协定和树立国际权威的压力，不是来自跨国公司而是来自政府。投资人是怕他们的灵活行动会受到这种安排的限制，而政府可能认为，从它们的利益考虑需要合作。

结 束 语

在一本名为《跨国公司》的新书中，克里斯托弗·塔格恩哈特把跨国公司所处地位比作中世纪的天主教会。帝王们是不喜欢被教会的国际组织、力量和势力所笼罩的。某些帝王和教皇签订契约，规定各自的活动范围，特别指明和平共处的基本原则。其他一些政治统治者则和罗马破裂，建立它们自己的独立教会。

可以想象得到，今天也会发生类似的情况，某些国家打算和跨国公司共同生存下去；其他一些国家就决定自己单独干下去。但是从本文的研究材料中可以判断，第二种做法是否现实很令人怀疑。因此很可能是，国家是越来越会聚在一起工作，根据塔格恩哈特的说法，是“在它们和公司之间签订某种新的工业契约”。

尽管跨国公司的灵活性有可能丧失，但这种趋势最后几乎一定会对它们有利的。因为跨国公司今天尚在考验中的理由之一，看来是由于缺乏可以使它们行动合理化的一种合法结构。这种结构开始成形得越快，那末，跨国公司盼望能在更稳固的世界环境中经营的时刻到来也越快。

(摘译自一九七二年五、六月号美国《哈佛商业评论》
杂志 熊旌译)

杜鲁门主义和希腊

编者按：二十八年，美国总统杜鲁门借口希腊和土耳其受到了共产主义的威胁，向美国国会提出对希土两国进行“援助”的咨文。在这篇咨文里，杜鲁门恬不知耻地说什么，任何国家的人民革命都会“危害美国的安全”，因此，美国“有权”支持各国反动派，镇压各国的人民革命运动。杜鲁门的这个强盗逻辑被人称之为“杜鲁门主义”，也就是霸权主义的别名。

以后，美帝根据杜鲁门主义的这个强盗逻辑，在中国帮助蒋介石发动内战，在朝鲜支持李承晚点燃战火，在越南指挥吴庭艳挑起战争，在世界各地扮演了极不光彩的“世界宪兵”角色。

二十八年过去了，滚滚的革命洪流，猛烈地冲垮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堤坝。中华人民共和国巍然屹立在亚洲的东方。印度支那人民赶走了美帝侵略军，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巨大胜利。“杜鲁门主义”已彻底破产了。重读这一段历史，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今天霸权主义的别名“勃列日涅夫主义”，也必然彻底破产。

希 腊

〔美〕M·D·唐兰 M·J·格里夫

从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三五年，希腊是一个共和国。一九三六年，希腊君主政体复辟，独裁者是约安尼斯·梅塔克萨斯将军。一九四〇年十月，意大利入侵希腊，被希腊人所击退。一九四一年一月，梅塔克萨斯去世。到了四月，德军进攻希腊。一支英军前往援助，但德军很快地蹂躏了这个国家，使英军不得不撤退。国王乔治二世和希腊政府流亡国外。

梅塔克萨斯在希腊镇压共产党，但却有一些共产党人逃出了罗网，并在一九四二年初同其他几个左翼团体一起组织了民族解放阵线。民族解放阵线拥有一支游击队，并取得相当大的成功。到一九四三年中，它控制了希腊本土约三分之一的地区。

对英国政府来说，希腊左翼的成功并不使它愉快。它不支持民族解放阵线和民族人民解放军，相反地却支持拿破仑·泽尔瓦斯将军及其同民族人民解放军对抗的游击队，即希腊共和国国民军。民族解放阵线和民族人民解放军除了同德军作战以外，还同希腊共和国国民军作战，并使后者被迫退回埃皮鲁斯地区，人数减少到约六千人。

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九日，在盟国军事代表团的调停下，双方在普拉卡签订了停战协定。到了夏天，德军显然准备撤出希腊。九月二日，民族解放阵线同意在以民主社会党人帕潘德里欧为首的民族团结政府中担任六个部长职位。同一个月的晚些时候，民族人民解放军和希腊共和国国民军两支部队一致同意，共

同服从盟军司令英国罗纳德·斯科比将军的命令。

十月十八日,大约有五千名英军护送民族团结政府到雅典。事实上政府和国家都是不团结的。在一片混乱中,个人宿怨引起了许多谋杀和暴行。政治上,存在着激烈的猜疑和对抗。左派要求严惩战时通敌分子,而右派则害怕这将使他们大受损害。左派还担心英国正计划恢复君主政体。在希腊,更多的人反对乔治二世本人是由于他同梅塔克萨斯有牵连。

在民族人民解放军的前途问题上,使紧张形势达到了顶点。在希腊国内,民族人民解放军现在是一支强大的、得胜的军队,又因获得了德国遗弃的装备而更为强大。帕潘德里欧提出民族人民解放军和希腊共和国民军都应该解散,组织一支新的国家军队,其中双方各成立一个旅,另一个旅则由希腊海外部队组成。九月二十七日,民族解放阵线的部长们和希腊内阁的其他部长达成了这项协议,但是不久就破裂了。九月三十日,民族人民解放军接到命令向雅典集中。十二月一日深夜,民族解放阵线的六名部长向帕潘德里欧政府辞职,同时,民族解放阵线决定于三日在雅典举行总罢工和群众性示威游行。

这次示威游行发展成暴力行为,恶化到反对政府的武装叛乱。斯科比将军通知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最迟不得超过六日午夜,民族人民解放军的部队必须撤出雅典。帕潘德里欧提出辞职,但英国人加以劝阻。民族解放阵线宣布说,它准备建立另一个民族团结政府,同时,民族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指挥官拒绝撤退。

十二月四日,英国和民族人民解放军双方巡逻队之间在雅典发生了武装冲突。十二月五日一早,丘吉尔命令斯科比采取包括使用武力在内的一切措施去制止叛乱。民族人民解放军试图在十二月五日夜間占领主要的政府大厦。斯科比的军队加以

阻止,但他们的力量有限,地位不稳,于是从意大利和埃及运来增援部队。

丘吉尔对希腊局势深为关切,这不仅是因为他下决心要阻止共产党的政变,而且还因为在美国公众舆论中有一种敌视英国政策的情绪。当时,一般看法认为,英国是在镇压希腊人民和支持反动的君主政体。十二月二十五日,丘吉尔到雅典参加了一次讨论希腊前途的会议。在十二月二十六到二十八日的会议上,民族解放阵线和民族人民解放军代表不愿接受英国和其他希腊人所一致同意的条件,停火的努力宣告失败。其他人的一致意见是,由雅典的达马斯基诺斯大主教担任摄政,并任命一个排除共产党人的看守政府。大主教在希腊很得人心,他以参加反纳粹抵抗运动出名。这一政府将维持到紧张局势完全平息和可以对君主政体进行公民投票为止。一九四五年一月一日政府就职,由尼古拉斯·普拉斯提腊斯将军任首相。

民族解放阵线和民族人民解放军的呼吁,被这些安排从根本上否定了,又由于他们每天杀害右翼人质的报道而更加降低了影响。英军逐渐增加到大约七万五千人,对民族人民解放军逼得更紧了。民族解放阵线也因社会党成员的退出而削弱。结果,达成了停战协议,规定从一月十五日午夜起停止敌对行动。军事接触逐渐停止,民族人民解放军撤出雅典、萨洛尼卡以及希腊中部。二月十二日,双方签订瓦尔基扎协定。政府保证对政治犯实行大赦,保证公民权利,答应就君主政体进行公民投票和举行议会选举,并草拟一个新的宪法。民族人民解放军部队则要交出武器并解散。

实际的情况却是,一些旧的武器交出来了,而新的、特别是德国人丢下的装备却被保留起来。一些民族人民解放军部队重新集结在希腊北部、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六月,

尼科斯·扎卡里阿迪斯从达卡集中营回来，担任了党的总书记，看来他决定要发动一个新的攻势。邻近各国正在被共产党接管。希腊的情况继续有利于共产党。除了宪法问题外，大家对政府处理经济形势的措施也存在不满。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内战的破坏，为了防止发生饥荒，需要由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提供大量救济品。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希腊共产党同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总参谋部的成员在保加利亚的佩特里奇会晤。第二年中，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因希腊政府大肆叫嚷，对它们提出领土要求而增加了敌意。在佩特里奇，他们达成共同建立一支新的希腊共产党军队的协议，这就是“希腊民主军”。

苏联表面上赞成计划中新的进攻，但没有给予什么实际支持。前几年，在民族解放阵线和民族人民解放军对德国人的斗争中，苏联的援助也是不多的，直到一九四四年，苏联的联络军官才空投到他们的司令部。一九四四年九月，民族解放阵线同意参加帕潘德里欧政府，而没有在那时夺取权力，也许是根据莫斯科的命令行事的。在一九四四年十月莫斯科会议上，斯大林和丘吉尔在解放巴尔干半岛、划分各方所负的责任时，把希腊分给了英国。一九四六年一月，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第一次会议上，指责英国军队继续留在希腊，但这看来是对伊朗问题的报复。一九四六年，斯大林显然只要求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援助希腊民主军，并答应由苏联供应补给品，但援助看来从未实现。

一九四六年三月，希腊举行政府选举。民族解放阵线呼吁抵制，但是大约百分之六十选民参加了投票，康斯坦丁·特萨耳达里斯领导的人民党政府上台。政府和共产党军队之间的第一次武装冲突开始了。九月，对君主政体举行了公民投票，百分之八十九的人投票赞成恢复君主制，于是，国王乔治二世回国了。

同月，内战的第二个回合也全面展开。

一九四六年十月，马尔科斯·瓦菲阿迪斯将军担任希腊民主军的司令。到一九四七年春，民主军约有一万三千人，后逐渐增加到约两万三千人。他们的游击战术屡获重大胜利，希腊政府的控制区域日益缩小，到一九四七年，政府只控制着雅典和萨洛尼卡周围的地方。在这种严重情况下，已经脆弱的希腊经济几乎崩溃了。大量难民涌入政府控制区域。国际上的救济援助必须增加。

英国已无力担负军事上和经济上的义务。随着东西方关系的发展，也改变了美国对希腊事务的态度。因此，英国把问题基本上交给了美国，虽然直到一九五〇年英国仍然在希腊驻有军队。一九四七年三月三日，希腊政府要求美国给予援助，几天以后，在三月十二日，杜鲁门总统宣布了“杜鲁门主义”：“美国的政策必须是支持自由人民去抵御来自武装少数派或外部压力的征服企图。”美国给了希腊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

联合国几次讨论了希腊危机。一九四六年八月，乌克兰指责希腊政府在边境事件中的侵略行为，但未采取行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三日，希腊政府提出申诉说，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对希腊共产党的援助是对和平的威胁。十二月十九日，安理会为此事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但在当时的混乱环境下，这个委员会没有取得什么进展。

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五日，由于苏联使用否决权，希腊问题从安理会的议事日程上转移到联合国大会。十月二十一日，在联合国大会上，成立了联合国巴尔干问题特别委员会，试图在各党派之间进行调解，并视察边境事件。联合国巴尔干问题特别委员会在萨洛尼卡设立总部，它的一份临时报告证实，从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确有运送补给品给希腊共产党军队的情况。

在希腊民主军和希腊国民军之间不断发生冲突的过程中，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重要决定。扎卡里阿迪斯和瓦菲阿迪斯两人在他们的共产主义作风上常常有分歧，前者是莫斯科训练出来的，而后者是土生土长的。另外，扎卡里阿迪斯始终坚持打正规战，而瓦菲阿迪斯则主张继续打游击战。瓦菲阿迪斯被撤职了，以后又被杀害了。他们采取了正规战术，接着在武器精良、训练有素的国民军手里打了败仗。

同样严重的是，尽管事实上苏联没有给过什么实际帮助，又尽管事实上苏联没有承认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成立的共产党政府，而使民主军的士气受到严重打击，但是当一九四八年六月十八日南斯拉夫的铁托同共产党及工人党情报局闹翻时，扎卡里阿迪斯却带领希共站在苏联一边，而不站在南斯拉夫一边。这意味着希腊民主军最重要的供应线被切断了。一九四九年三月一日，扎卡里阿迪斯发表广播演说，赞成马其顿独立，更加激怒了铁托，也使希腊共产党内许多党员表示不满。

在希腊民主军内部，不满的迹象开始增长，连招募兵员都不得不采取强制性手段了。希腊国民军已有办法破坏民主军所依赖的交通线。对民主军的巨大压力一直没有放松，到一九四九年四月，雅典政府就牢牢控制了伯罗奔尼撒。希腊西北部格拉莫斯山区的军事行动在继续进行，到一九四九年八月，共产党显然已被打败了。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五日，叛乱政府向联合国秘书长发出信件，表示他们希望和解。十月六日自由希腊电台宣布，希腊民主军将为希腊的利益而停止战斗。叛军最后于十一月四日承认失败，越过边境逃到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

(摘译自一九七三年英国伦敦出版的《国际争端》一书
袁缉辉译)

十五个星期

〔美〕J·约瑟

决定性的一个星期

当英国大使和国务卿马歇尔在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四日星期一上午十时会晤时，十五个星期中将近三天过去了。他的会晤有点“马后炮”的味道，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大使馆的一等秘书西奇尔先生在上星期五下午，已经将英国照会的副本交给了亨德森。这位大使来到时，国务卿马歇尔已经看过照会以及亨德森和他的工作班子在周末为他准备好的备忘录。此外，他同艾奇逊开过一个长会，自从他上星期五中午过后不久离开办公室以来发生的最新情况，艾奇逊都告诉了他。

迪安·艾奇逊对希腊的形势非常了解。就在这天之前，麦克维大使、马克·埃思里奇和保罗·波特三个人一起，从雅典发来一封比一封紧急的电报，传来了一个只能称之为慌乱的消息：希腊正处在惊惶之中，大概在几个星期内，它就有在经济上、精神和军事上全面崩溃的危险，假如它崩溃了，武装的共产党队伍就会进行接管。就在二月二十一日这天早晨，在动身去普林斯顿之前，马歇尔曾向艾奇逊送去了一个备忘录，建议起草一个直接贷款给希腊的法案，让国会批准并通过行政部门贯彻这个决定，以便向希腊移交军事装备。但是，来自雅典的报告和国务卿的决定都没有考虑到艾奇逊刚才了解到的那个新的重大的事实：英国即将停止它对希腊的支持，希腊可能即日丢失，

现在已经成为确实无疑的事实了；除非美国采取行动才能加以阻止。要挽救这种局势，那我们现在所肩负的责任，就不仅仅是一部分，而应是全部的了。此外，将不得不在一种全新的情况下来对紧迫性加以估计，对于必须提供的援助的种类和数量，情况也是如此。堵塞漏洞的办法再也不够了，必须全面地正视这个问题，因为受到危险的不仅仅是希腊的命运。对于打开一个广阔得多的局面，即大部分世界的自由和安全来说，希腊是一把钥匙。

当天晚上，乔治·F·凯南在国务院主持了工作人员会议。亨德森、希克森、他们主管机构的高级人员，以及其他几个人都出席了。当时正在华盛顿军事学院讲课的凯南，由于他在莫斯科所写的许多报告中的那种现实主义和犀利明快，在国务院和政府上层人士中获得了广泛而崇高的威信。一年之前，他的那封在莫斯科大使馆任职时发出的八千字著名电报，深刻地分析了苏联的动机和企图，从而明显地促使美国对苏联的扩张主义采取强硬政策。凯南建议，关于俄国情况的真相应该全部如实地告诉美国公众，在和苏联打交道时，西方世界应该增强团结、坚定性和力量，我们应该勇敢自信地前进，并且把“我们愿意看到的比我们在过去提出的更为积极的和更有建设性的那种世界图景”^①，放在全世界自由国家的面前。亨德森和希克森认识到，美国对希腊和土耳其的大规模援助，从根本上涉及我们和苏联的关系，同时也知道，马歇尔曾要求凯南在五月份结束了军事学院的职务后，到国务院建立和主持政策设计办公室的工作。因此，他们认为，邀请凯南参加并主持关于希腊危机的第一次工作

^① 凯南的报告在《福雷斯特尔日记》中，以引文形式全部加以叙述。在一九四七年七月号《外交季刊》的文章中，凯南以“X先生”的署名发表了他的观点，这个匿名很快就被揭穿，而凯南就成为公认的“遏制政策”的首创人。

人员会议是适宜的。

关于这次会议，除了所有出席会议的人一致同意美国将必须给希腊以特别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之外，其他显然没有什么东西被记录下来，也很少有什么情况还被人记住。关于援助土耳其的问题，由于其迫切性是居第二位的，所以几乎没有讨论。每个人都知道，所涉及的问题是美国力量在希腊和中东所承担的责任。近东和非洲司的官员们十分公开地表示洋洋得意，因为他们觉得，美国现在也许能够采取大规模行动以阻止苏联冲破希腊-土耳其-伊朗壁垒而进入中东、南亚和北非。长久以来，他们一直感到他们在试图处理这个问题时实际上是赤手空拳的，而这个问题对他们来说就象他们四周的墙壁一样现实，而对美国安全和世界前途来说，也可能产生各种可怕的后果。

讨论结束后，亨德森分派了任务。临近午夜，关于希腊形势的现实性文件的第一稿完成了。这样，在英国大使馆发射出第一个火星之后八小时，十五个星期的第一天就结束了。凯南回忆说，当时他带着大事即将临头的感觉坐车回家。

马歇尔于星期一上午介入希腊-土耳其危机的情况，前面已经叙述过了。中午前不久，他穿过白宫的林荫大道，以便象往常一样，在内阁每周例行聚餐会之前和总统进行磋商。马歇尔告诉总统关于英国大使的访问以及这次访问对美国提出的问题。他还告诉总统正在采取步骤来提出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的协同建议，供总统早日决定。

马歇尔由于正忙着还有几天就要到来的莫斯科会议的准备工作，就有意识地把希腊-土耳其这只球传给艾奇逊。艾奇逊先要接住这只球，然后在马歇尔离开时跟着球跑。因此，马歇尔只出席那些绝对需要他出席的会议。当然艾奇逊让他得知全部情况，并在重要的决定上取得他的同意。

二月二十四日星期一下午，艾奇逊在亨德森和希克森的协助下，主持了同福雷斯特尔和帕特森的一次会议，福雷斯特尔由海军上将谢尔曼陪同，帕特森由陆军上将诺斯塔德陪同。这是一个重要的会议，因为援助希腊和土耳其问题是从更广阔的世界背景的高度上来加以考虑的，一个明确的政府态度也开始形成了。福雷斯特尔和帕特森表示出他们自己对于希腊和土耳其问题的细节是非常了解的。这次讨论时间很长，许多问题都提了出来又一加以回答。最后，艾奇逊概括出结论，他们一致同意：加强希腊和土耳其对于美国的安全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只有美国能够这样做。因此总统应该向国会请求必需的基金和权力。艾奇逊告诉福雷斯特尔和帕特森说，一个关于立场和建议的正式声明，将在星期三草拟出来并提请他们认可。稍后，艾奇逊把得出的结论告诉了马歇尔，马歇尔表示同意。

要不是因为国务院的下级人员对这个时期外交政策的发展有着如此显著的贡献，那么在这里记述艾奇逊二月二十五日星期二下午召开的有政治、经济、法律和新闻各方面重要官员参加的会议，就是无关紧要的了。艾奇逊以一种评判的方式提出了由于英国从希腊和土耳其撤退而产生的问题，并扼要叙述了美国可能采取的交替使用的行动方针。直到会议快要结束，他都没有提出任何结论，而是以前面说过的那种特有的方式鼓励所有与会者发表观点，提出问题。有些人表示担心：在我们的军事力量处于低落状态之时向苏联挑战，谁也不知道苏联将会作出什么反应，将会引起怎么样的责任。有些人洋洋得意：认为美国也许终于能够大胆地站出来反对苏联的扩张了。至于应该怎样将事实介绍给公众或者指出必须加以克服的障碍，其他一些人也提供了自己的想法。在美国历史上的这个转折关头，所有的人都是有些不寒而栗的。

当所有的人都发言后，艾奇逊在消除疑虑、解决矛盾、归纳向他提出的各种主意和指出这次讨论的逻辑的过程中，作出了他的总结。这样，艾奇逊就扩大了他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设想，并使他的班子在对未来计划进行创造性劳动时有所凭借。头头和工作人员就象一个人一样。只有一种观点，而这种观点正在思想的自由交流中形成和发展。在这次会议后，艾奇逊、亨德森和近东司的官员们工作到很晚，起草了《国务院关于立即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立场和建议》的最后文本。

福雷斯特尔和帕特森在二月二十六日星期三上午同马歇尔和艾奇逊会晤，研究国务院的《立场和建议》。如同两天前艾奇逊同福雷斯特尔和帕特森的会议一样，这次会议讨论了其他国家可能需要类似拟议中的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的那种援助的问题。这时，对南朝鲜大规模援助的必要性正在朦胧出现。已经很清楚，苏联不准备同意南部和北部统一，而美国保有的南部假如要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而存在的话，需要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发展。中国也可能需要进一步的援助。因此，当希腊-土耳其危机产生时，陆军参谋长艾森豪威尔将军向陆军部长送去了一个备忘录。在备忘录中，他提醒注意对外援助中正在产生的各种问题，并建议，为了要求满足各方面需要的拨款，对于所有外国要求美援的未来需要都要加以研究。

这个观点在二月二十六日的会议上被考虑了，但据认为，所建议的这种研究需要很长的时间来准备，而要得到一个国会同意的普遍援助法案将是极其困难的，无论如何也需要很长的时间，而希腊危机却要求采取尽可能迅速的行动。因此，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都赞成《国务院关于立即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立场和建议》，但是对于可能需要我们援助的其他情况也应加以广泛研究，这是不言而喻的。

当天下午，马歇尔和艾奇逊会见杜鲁门总统，并充分解释了三个部(院)的建议。杜鲁门用不着别人来说服。他事先已和马歇尔讨论过这件事，并和艾奇逊在电话中讨论过几次，而且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他对中东问题非常熟悉。他接受并批准了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的联合建议。问题不是应该做什么，而是如何通过国会制订授权的法律。时不可失，因为马歇尔很快就要去莫斯科。总统决定邀请国会领袖们在第二天到白宫听取马歇尔和艾奇逊关于情况的说明，并听听国会领袖们对于拟议中的计划的反应。白宫通过电话发出了邀请。

在这次会议上，根据总统的要求，马歇尔首先提出了这个问题。他用枯燥简单的语言告诉国会领袖，英国即将撤销对希腊和土耳其的援助，这两个国家正处于容易受到苏联统治的地位，以及行政部门已经同意有关援助的建议。

毫无疑问，国务卿是非常了解希腊和土耳其在战略上的重要性的，但是他的简略的和隐晦的介绍却无论如何没有能抓住他的听众。事实上，他给人的总的印象是，基于忠诚和人道主义应该给希腊以援助，而为了加强英国在中东的地位应该援助土耳其。这并没有很好地说服某些国会领袖，因为他们当时的主要考虑是，对外减少援助，对内减少捐税。他们的初步反应，在后来被人描写为“微不足道的”和“不幸的”。有人当下就提出问题：“这不是为英国火中取栗吗？”“我们卷进去到底为的是什么呢？”“这要花多少钱？”回答这些问题，只能使讨论更远地离开主题。

事情进行得确实很糟糕，艾奇逊非常不安。他把身弯向坐在他旁边的马歇尔，低声问道：“这是一场个人的斗争，还是任何人都可参加？”于是，马歇尔请示了总统，然后又提出艾奇逊有话要讲。艾奇逊得到了发言的机会。他的话有许多我们都已知道

了,但是鉴于他的发言对他的听众所产生的影响,因此他的论点值得一叙。

艾奇逊开始说,在过去十八个月中,全世界民主形势已经严重恶化了。当贝尔纳斯国务卿、范登堡参议员和康纳利参议员参加一个又一个会议,以试图谈判出将某些中欧国家从苏联控制下拯救出来的和平解决办法时,苏联却一直在别处忙于活动,并且获得了比通常所认识到的更大的成功。显然,他们正在作出最顽强和最野心勃勃的努力,以便包围土耳其和德国,从而将三大洲置于苏联的统治之下。

艾奇逊描述了过去一年半的情况,苏联为了取得扩张领土和在土耳其海峡建立破坏土耳其独立的军事和海军基地,对土耳其不断施加压力。他说,在施加压力的同时还进行了一个恶毒的长时间的宣传运动,而更为重要的是,还对伊朗和希腊采取包围行动。土耳其人在英国和美国的外交支持下,坚决地顶住了苏联的压力。针对伊朗的行动也已暂时失败了。现在,共产党人的压力正集中在希腊,如果希腊不能从外部获得迅速的大量的援助,那么很有可能共产党将成功地取得控制。来自希腊的报告表明,全面的崩溃可能是几个星期内的事情。

艾奇逊继续说,俄国人有许多赌注,只要他们赢得其中的任何一个,就会赢得全部。假如他们能够控制土耳其,他们将几乎不可避免地把他们的控制扩展到希腊和伊朗。假如他们控制了希腊,那么不管是否经过战争,土耳其或早或迟要被征服,然后轮到伊朗。假如他们统治了共产党压力正在增强的意大利,他们就可能取得希腊、土耳其和中东。艾奇逊强调指出,他们的目的是控制东地中海和中东。从这些地方向南亚和非洲入侵的可能性是无限的。

艾奇逊继续说,至于欧洲,苏联显然正在利用共产党渗透和

颠覆的手段，试图完成对德国的包围。在法国，内阁中有四个共产党人，其中之一还是国防部长；共产党人控制着最大的工会并渗透到政府机构、工厂和军队中去；有将近三分之一的选民投了共产党的票；经济状况也正在恶化。由于这种种情况，俄国人可以在他们喜欢的任何时候动手。在意大利，如果说存在着较少的直接危险，但情况也差不多，而且正在恶化。在匈牙利和奥地利，共产党人正在对民主政府拉紧套索。假如希腊和东地中海落入苏联的统治之中，那么，对于那些正在很不稳定地维持着自己的自由和民主制度的国家所产生的物质和精神影响，将是破坏性的，可能还是决定性的。

艾奇逊说，有人讲我们援助希腊和土耳其不过是“为英国火中取栗”。他说，英国的世界权力已经粉碎，除了美国，其他每一个民主国家的情况都是这样。大不列颠正处在严重的财政困难之中。他提到了最近的两个白皮书以及它们对于国家生存的悲观的看法，并且解释了由于财政的原因，英国现在被迫从成为其世界权力基础的另外一些地方撤走军队和撤销经济援助。

艾奇逊继续说，世界上只存在着两大强国：美国和苏联。我们已经面临着自古以来所未曾有过的局面。自从罗马和迦太基以来，世界上还不曾有过这样的权力极化。此外，这两大强国为一条不可逾越的意识形态的鸿沟分隔了开来。对于我们来说，民主和个人自由是基本的；而对于他们，则是专制和绝对服从。很清楚，苏联是侵略的和扩张的。因此，美国采取步骤以加强那些受到苏联侵略或共产党颠覆威胁的国家，就不是什么为英国火中取栗。这是保卫美国的安全，这是保卫自由本身。假如苏联把它的控制成功地扩大到包括世界三分之二的土地和世界四分之三的人口，那末，美国就没有安全可言，而世界上任何地方的自由也将只有渺茫的生存机会。因此，拟议中对希腊和土耳

其的援助就不是什么替英国摆脱困境的问题，甚至也不仅是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而对忠实的同盟者的需要作出响应的问题。这是一个通过加强自由国家反对共产主义侵略和颠覆来建立我们自己的安全和保卫自由的问题。他最后说，我们要么采取有力的行动来对付这种形势，要么就什么也不干而听任失败。

艾奇逊抛开了评判者的态度，而在十分或十五分钟时间里就象一个热情的辩护士在讲话。他讲完后，会场里大概有十秒钟时间鸦雀无声。这种寂静被参议员范登堡的声音打破了。范登堡缓慢而庄严地说，他为刚才所听到的话深深打动了，他甚至感到震动。显然，这个国家正面临着一种极为严重的形势，而援助希腊和土耳其虽然极为重要，还只是这种形势的一部分。他觉得，十分必要的是，在向国会要求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基金和授权的同时，应向国会提出咨文，和向美国人民作出说明，将严酷的事实象今天会议上那样公开揭示出来。

总统绕场一周，请每个与会者发表意见。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没有人提出琐碎的问题或挑起次要的争论。所有的人显然都被深深打动了。范登堡在稍后写道，在这次会议上没有作出什么承诺。这是确实的。没有人要求这样做。但是，十分明确的印象已经产生，并在第二天作为一种背景材料传到国务院的官员那里。这印象就是：国会领袖们将会支持拯救希腊和土耳其的任何措施，但要以范登堡提出的并得到其他与会者支持的要求为条件，即总统在致国会的咨文中和对美国人民的广播演说中，要用同样坦率的语言和根据已经向他们提出的那种广泛的背景来说明问题。范登堡所说的广泛的背景，可以从六天之后他写给他的一个国会同事的信中得到解释：

我坦率地说，我不知道怎样回答希腊问题上的最新挑战，因为我不了解全部事实。在我发表意见之前，

我在等待全部事实……但是当我已了解到了足够的事实，这就使我认识到不能孤立地来看待希腊问题。相反，它可能是象征着东方共产主义和西方民主之间的世界范围的意识形态冲突；它可能很容易成为需要我们作出某些十分重要和有深远影响的决定。”^①

人们常常问：为什么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问题要交给国会处理，而对美国人民则挑选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挑战的全球政策声明来对付？二月二十七日在白宫举行的会议，部分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从总统起，与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决定有关的所有政府人员的明确反应是：历史的转折关头已经到来，美国现在必须挺身而出，取代没落中的英国成为自由世界的领袖，并运用其力量直接地和有力地加强自由国家。但是，在考虑或决定这一点并把它作为美国的政策，向动摇的国会和冷淡的选民宣布，这两者之间是有很区别的。由于过去二十八年来无情的政治教训，在参与世界事务时那种小心谨慎的、有限度的、秘密交涉的作法，几乎已成了历届政府的一贯表现，尽管它们支持联合国和积极参加各种和平条约的谈判。在同国会领袖的商谈中，艾奇逊发现，他必须抛掉所有顾虑，而用最坦率、最大胆的和最无拘束的语言来讲话，以便赢得他们对问题的支持，而这种问题本来是会在没有孤立主义传统的议会民主政治中悄悄地、不露声色地来着手解决的。这一次，这种大胆而勇敢的作法，并没有把国会领袖们吓住，因而收到了效果。他们给深深地打动了，他们感到在这基础上，可以走在他们的选民的前面。正是范登堡的“条件”，使得有可能、甚至有必要提出冲破美国孤立主义残余壁垒的全球政策。

^① 阿瑟·H·小范登堡编：《范登堡参议员的私人信件》，波士顿，豪顿·米弗林公司，一九五二年。

杜鲁门总统答应国会领袖们为和他们第二次会晤准备一个详细的计划，这个会他将于三月七日星期五召开(事实上到三月十日星期一才召开)。他同意把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问题，由他以最广泛的背景和最坦率的语言提交国会，并且答应根据这个方针准备一个咨文。有人问到能否说服英国，在希腊保留他们余下来的军队的问题，马歇尔回答说，这个问题正在和英国讨论。总统和国务卿马歇尔都不能够提出任何保证说，希腊和土耳其的局势可以通过美国的援助而得到解救，而只能说，没有美国的援助，它就不能得到解救。会谈宣告结束。

二月二十七日晚上，艾奇逊和大约二十名经常采访国务院消息的报社记者开了一个非正式的背景会议。报社已听到将要发生重大事件的风声，已经开始对这些事件加以猜测，并且知道了白宫上午会议的情况。艾奇逊认为，在一开始就给记者们定下正确的调子是重要的，虽然在这个早期阶段还不可能发布消息、谈论细节或允许引用。他告诉他们英国关于希腊(在这阶段，土耳其还没有提到)的照会、希腊的形势及其对东地中海安全的关系、要求国会授权援助希腊的决定，以及上午在白宫和国会领袖们开的会议。更为重要的是，他把援助希腊的问题放在它的广泛背景上来谈论。其后接连数天，艾奇逊和另外几小批的电台评论员、专栏作家和记者在类似的非正式会议上会晤。

在这第一批会议之后，詹姆斯·赖斯顿在三月一日的《纽约时报》上，就援助希腊问题提出了三个问题：

美国是否准备在希腊采取特别行动以反对苏联在东地中海扩大影响？

美国是否准备象英国在十九世纪那样，为维持世界稳定而承担风险和费用？

两大政党，一个控制着行政部门，另一个控制着国会，在援助一个得到英国支持而受到苏联强烈反对的政府的政策上，能够一致吗？

三月初，电台、编辑部和专栏的大量评论的调子都是一致的。这使那些从事解释和执行政策的人们感到鼓舞，并且为总统向国会和公众推销三月十二日的咨文立下了不可估量的功劳。

二月二十八日上午是国务院的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十时三十分，在国务卿的会议室里，艾奇逊和那些在详细制订计划的各个方面的工作中将要负主要责任的国务院官员们会晤。过去七天中举行的一系列会议，是专门为了对问题进行探索、讨论和估计。这一次会议情况就不同了。问题的范围确定了，决定也已作出和批准了。在这次会议上，没有请别人提建议，也没有人提出问题。问题、解决办法和调子，已经全面而简明地定好，这出戏要巡回演出了。

艾奇逊仅以一种不平常的严肃态度，使人看到他是了解他所说的事情是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性的，他简单地回顾了一下过去一个星期中所发生的事情，谈了国务卿和总统所作出的决定，接着又进而详细描述了前一天和国会领袖会谈的情况。当艾奇逊开始全面叙述那些较大的争论和再次提到深深打动了立法者们的那些说明的时候，在这大房间里，产生了紧张和抑制着的兴奋的气氛。当他描写了他们的普遍良好的反应和他们表示给予支持的时候，当他说到那受到总统欢迎的范登堡的“条件”的时候，那些出席者似乎感到世界历史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篇章，而他们也成了一些最有特权的人，成了甚至在一个伟大民族长期生活中也极难产生的剧中人。

艾奇逊说，有很多工作要做，并且要以最快的速度去做。在

几天之内，须要制订好对希腊和土耳其进行经济、军事和技术援助的详细计划，起草必要的授权立法、总统致国会的咨文和咨文送交国会那天要在电台发表的“炉边闲话”，以及扩大和执行一个新闻宣传计划。艾奇逊传达了马歇尔的命令，即要用最全面和最坦率的语言把这个问题提交国会和公众。他还传达了马歇尔的指示，工作班子应该全力进行工作，而不要考虑希-土计划或关于这个计划的任何公开声明可能会对莫斯科会议或他个人在这会议上的立场产生什么影响。这时，他回想到国务卿以及处在这种环境下他们几乎肯定会提出来的优先考虑的其他一些事情。假如马歇尔不曾看到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相对次要的。那么，近几年的历史就会完全不同了。在果敢的行动面前，一切障碍确实都土崩瓦解了。

艾奇逊只提出一个注意之点。虽然我们应该精神抖擞，勇往直前，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好战喜斗，寻事生非。我们的政策不是针对任何国家甚至任何运动的，而是一种旨在帮助自由国家以加强它们的民主独立，从而保护每个公民自由的积极政策。

公开辩论

在杜鲁门总统致国会的咨文发表后，就美国外交政策所展开的公开讨论，是这个国家历史上迄今为止的一次最成熟和最有成效的讨论。

事实上，所有的报纸、电台和国会观察家都立刻认识到，杜鲁门总统的咨文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全国各地报纸都纷纷表示了强有力的支持。大多数的专栏作家和电台评论员都支持总统。三月十四日，美联社、斯克利浦斯-霍华德报系和许多电台分析家都预言国会将采取赞助的行动。

意味深长的是，对杜鲁门主义的最初反应，完全打破了党派、阶级和集团以及地区的界线。许多一贯是以孤立主义者闻名的人表示支持总统，而许多公认的国际主义者却表示反对。

公众的支持大多数是基于这样一个信念，即为了美国的安全和福利，有必要抵抗苏联或者共产主义的扩张，而总统提出的纲领则是进行这种必要的抵抗的第一步。不同政治信仰的美国人团结起来了，他们从不同的角度站到了共同的立场上：坚定的反共分子一贯害怕共产主义对美国资本主义的威胁；保守分子和独立派人士越来越恐惧地注视着苏联力量的强大；自由主义者关心的是保卫人类自由；热忱的国际主义者则认为，只有美国发挥领导作用和充分运用美国的力量和资源，世界才能获得和平和繁荣。

但是，总统政策的支持者们对自己所采取的立场，并不都是充满信心和愉快的。他们的言论始终带有勉强和忧虑的强烈调子。大多数人认为这个政策是“有意冒战争的风险”；有些人担心美国将成为苏联扩张主义的直接对手。许多人则战战兢兢地反复考虑着可能涉及到的无法估计的支出、义务和风险。

公开反对的意见多数来自政治上的极左派和极右派。左派的反对意见主要是，美国对希腊和土耳其现政府的援助不会促进自由，而只会保护反民主的反动政权；总统的建议绕过了联合国，这将危及联合国将来的威信。右派的反对意见是，总统的政策可能导致战争，而美国经济不可能承担用美元制止共产主义扩张所带来的紧张。右派和左派在猛烈的攻击中，把他们的全部论点都用上了。“强权政治”、“军国主义”、“干涉”，这些就是他们的指责。“不能用美元来同共产主义作战”、“新政策意味着‘一个世界’的完蛋”、“莫斯科会议将遭到破坏”、“我们不应该为英帝国火中取栗”，这些就是他们所使用的部分论点。

在总统发表咨文后的第二天，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开始正式考虑咨文所涉及的原则问题。

三月二十四日，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开始举行公开听证会，会议继续到三月三十一日。艾奇逊、帕特森、福雷斯特尔、克莱顿和保罗·波特（总统派往希腊的特别经济代表团团长）是政府方面的主要作证人。

在国会各委员会的所有的证词中，艾奇逊在参议院委员会听证会第一天会议上的证词，对美国政策来说是最富有戏剧性和最有意义的。

艾奇逊在他的开场白演说中说：

有人问我们：这是否为将来所有希望美援的国家树立了一个样板。我们认为对任何外国关于援助的请求，我们将按照要求的具体情况来考虑。在另一种情况下，我们将不得不研究提出要求的国家是否真的需要援助；这一要求是否同美国的外交政策相一致，要求援助的请求是否真诚，以及美国的援助是否能有效地解决那个国家的问题。因此不能够这样认为，本政府必然会对任何国家都采取如同对待希腊和土耳其所采取的措施或类似的措施。

紧接着，参议员康纳利和艾奇逊作了如下的对话：

康纳利：有许多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这是否意味着彻底改变我们的外交政策，是否意味着对世界上任何一个向我们提出要求的国家，我们都必须给予贷款，或者采取同这个法案所规定的相类似的行动？当这种局势出现的时候，都必须使之延缓和加以对付，而每一种情况都必须独立于可能提出这种要求时的世界局势和我们自己的情况之外。是这样的吗？

艾奇逊：确实是这样的，参议员康纳利。情况确是这样。

康纳利：这不是适合于世界上每一个人，适合于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不变的办法，因为没有哪两个国家的情况会是相同的。是这样吗？

艾奇逊：是的，是这样的。当然，是否有些国家会有这种要求，那是将来的事。但是不管是些什么要求，都将按照每一要求的具体情况来决定。

新泽西州的参议员史密斯对这个问题也有兴趣：

史密斯：国务卿先生，我们从报纸上了解到，这就是杜鲁门主义。我从你杰出的声明（我要为那篇声明而赞扬你）推测，我们在这里所追求的目标是使希腊复兴和援助土耳其摆脱困境，而并不一定有着更广泛的政治含意。把我们的这个运动和所谓“门罗主义”相比，我感到不安。我不知道你是否想对这个问题发表一点意见，或者我们心目中是否有那种问题存在。我们将会采取这样的政策吗？根据这种政策，我们说美利坚合众国将对世界上任何一个谋求民主自由的国家都感到兴趣？

艾奇逊：我认为，总统所说的问题，比起你现在向我所提出的问题范围要有限得多，这是非常清楚的。总统建议我们给希腊和土耳其提供援助。他指出，这是两个按照民主原则而建立的立宪制度的国家，它们正在为维持这种制度而斗争。他说，我们感兴趣的是：一切有着自由政府和民主、正在向着人类自由迈进的民族，都不应该由于受到外来压力而放弃自己的制度；不管我们提供什么援助，都是符合我们的政策的。我认为，这点，总统在他的咨文中是讲得十分清楚的。

这对大家有这么一个明确的印象：艾奇逊在这里，试图回避总统声明的全球性的含意。参议员范登堡显然也是这样认为

的,因为他很快就参加了这个讨论。

范登堡:国务卿先生,关于其他国家有可能对我们提出这样或那样相似要求的问题,你谈得颇为一般化。你已经说明了其中的一种情况。我是否可以具体地问你,关于朝鲜,其前景如何?

艾奇逊:朝鲜的前景是,在今后三年内可能需要美国的经济援助。

艾奇逊解释说,苏联政府不愿意促进朝鲜的统一,这使三八线以南地区的经济情况十分糟糕。因此,“必须投入美国资金,并用美国资金使这个我们负有责任的地区活动起来。”关于援助朝鲜的确切计划、方式和程度,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正在讨论,不久将向国会提出建议。

范登堡:这么说,我们一定得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将会有……一个多少相类似的关于朝鲜的建议。是这样吗?

艾奇逊:嗯,我不知道相似的程度如何,我们必须期待一个有关在朝鲜使用美国资金的建议。是的,先生……

范登堡:今天上午我们曾多次强调应使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计划地方化,以使之成为先例。但是,总统在他的咨文中说过这样的话:“为了保证各国在没有压制的情况下和平发展,美国在建立联合国方面发挥了它的领导作用。联合国的宗旨是促使全体会员国有可能享有持久的自由和独立。然而,除非我们愿意帮助各个自由国家维持它们的自由制度和国家完整,反对那些向它们强加专制政权的侵略行为,不然,我们就将无法实现我们的目的。”

其次,我再强调总统说的下面这句话:“用直接或间接侵略的方式强加于自由国家的专制政权,破坏了国际和平的基础,从而也危害美国的安全,这不过是一个公认的事

实罢了。”

国务卿先生，总统的这些话似乎暗示着，不管这种情况发生在世界什么地方，我们都有必要为保卫美国的安全以防止可以称之为是侵略的连锁反应。这似乎提出了比这个立即地方化的情况多少更为广泛的问题。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希望你就问题的这个方面谈谈你的观点。换句话说，总统的这个声明是否大大扩大了我们今天上午所讨论的概念？

艾奇逊：……总统所谈的是一个企图用直接或间接手段颠覆一个自由国家的自由制度而代之以其他制度的例子。报纸上发表了各种各样的评论，说这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十字军运动。但这不是总统所说的话。他谈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一个自由国家正在受到压力被迫放弃它的自由制度，这是和我们有利害关系的。

总统是在明确谈论希腊和土耳其的问题。他没有说，而且我认为也没有人能够说，这意味着不管在什么地方发生了这种局势，人们一定要以完全相同的方式作出反应。在不同的情况下，局势是完全不同的。你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这样做，而在另一个问题上就不能这样做了。但是我认为原则是清楚的。我相信是清楚的。我们所关心的是，已经享有自由制度的国家正在受到压力将被迫放弃这些制度。现在，我们应该怎样办？正如我刚才所指出的，我们已经就匈牙利所发生的事件提出了抗议，我们认为匈牙利是有这种情况的，但是我们在匈牙利可以做些什么，应该做些什么呢？那里的整个情况同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情况是非常不一样的。这不就根本澄清了这个问题了吗？

范登堡：是的。换句话说，我认为你所说的就是，不管

我们在什么地方发现自由国家难以维持它们的自由制度，难以抵抗企图把专制政权强加到它们头上的侵略行为，我们不一定每次都以同样的方式作出反应，但是我们打算作出反应。

艾奇逊：我认为，这样说是正确的。

仅仅在三周以前，总统和艾奇逊还不知道范登堡对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建议会有什么样的反应。现在，范登堡这位参议员，这位在国会中最强有力的共和党人公开表示了支持，而且，事实上是坚持并且还亲自重申杜鲁门主义的世界含意。

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会议上，明尼苏达州的众议员周以德和宾夕法尼亚州的众议员富尔顿就杜鲁门主义是否适用于中国，向艾奇逊提出了尖锐的问题，这是值得注意的。周以德认为我们的外交政策有矛盾。他问道：“假如促使中国政府同那里有组织的共产党少数派进行联合是明智的政策，那么为什么援助希腊政府去同希腊的武装的共产党少数派作斗争也是明智的政策呢？”艾奇逊答复的主要论点是：希腊的情况同中国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近二十年来，中国共产党人一直控制着一大片的地区，它有一支军队，曾经击退所有企图侵犯这个地区的势力。他简明地谈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人和政府（马歇尔将军是支持这个政府的）为建立一个统一的政府和军队所举行的谈判，并承认，谈判业已失败，战斗已经打响。他强调了自从大战结束以来美国给中国政府的各种援助：七亿美元的租借法案援助，八亿三千六百万美元的剩余物资援助和一亿三千三百万美元的其他援助。他又补充说，我们还装备了中国三十六个师。他暗示，对中国的这种“巨大而广泛的援助”，不能称之为“不干涉政策”。他又说，中国政府不是在走向崩溃和面临失败，而在希腊，危机是迫在眉睫的。

周以德的谈话刚完，富尔顿又接上去谈这个问题，他试图要艾奇逊承认，假如中国政府面临着失败，美国的对华政策将会是同现在不一样的。艾奇逊回避了这个问题，他坚持说，我们对希腊的政策同对中国的政策没有什么不同，但是，情况是不同的。

这里我们还打算谈一谈这样一个问题，这就是杜鲁门主义并没有什么地理界线，它也从来没有规定过这样的界线。

几年以后，艾森豪威尔总统和国务卿杜勒斯在印度支那遇到了类似的情况。大规模的经济、军事和技术援助，从美国源源不断地流到正在同共产党战斗的法国人和越南人手里。一九五三年秋天和一九五四年春天，艾森豪威尔总统和国务卿杜勒斯以明确的语言一再重申，共产党在印度支那取得胜利，将威胁美国 and 自由世界的安全，这就有迫使美国采取援助以外的行动的危险——甚至美国会对一些未指名的国家采取大规模的报复行动。但是，他们终于发现这种行动是行不通的。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一致同意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法案，并于四月三日向参议院作了报告。参议院四月八日开始辩论，四月二十二日，参议院以六十七票对二十三票通过了这一法案。这是参议院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对任何重大的有争论的美国外交政策所给予的最大的两党多数。

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在四月二十五日向众议院呈递了一份表示支持这一法案的报告。辩论从五月六日开始，五月八日结束，众议院以二百八十七票对一百零七票通过了这一法案。五月二十二日杜鲁门总统签署了这一法案。

(摘译自一九七二年美国出版的《十五个星期》一书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译)

干 涉

〔美〕理查德·J·巴尼特

美国在杜鲁门主义的名义下对希腊提供军事和经济力量，使希腊君主政体能够在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九年打败共产党领导的一支叛军，并赢得一次美国在镇压叛乱方面已成为典型的胜利。差不多二十年以后，美国总统还在援引他的前任在希腊的成功，为他在越南的武装干涉进行辩护。美国在希腊的经验不仅为以后的武装干涉树立了样板，而且提出了评价反叛乱行动成功或失败的标准。希腊是美国在战后世界上承担第一个重大的警察任务的国家。在四十年代，美国介入希腊问题的最重要后果之一是，在美国发展了专门从事于军事援助、警察管理和经济援助的新官僚机构，其任务是对世界各国的革命进行分析，并采取一套对付革命的办法，这些办法在以后二十年内的许多不同冲突中都是被应用了的。

总统的这个新议案，不仅要求对美国实力作出一项重大的承诺，并且还象一位政府发言人所说的，这是一次准备同苏联作战的“有计划的冒险”行为，它促使美国对美洲以外国家的政治发挥监督作用，这是在和平时期的一件新鲜事情。

美国对希腊的援助，在军事上所起的作用很快地超过了经济上的作用。一九四七年底，一个美国军事顾问和计划联合小组被派到希腊，为希腊军队拟定作战计划，并且坚持“它的所有建议要立即全面加以实施”。一九四八年初，有二百五十个以上的美国军官在范·弗利特将军指挥下，在希腊师一级的部队里

“指导”希腊军队的战术活动。

美国人还试图左右希腊的政治形势。一九四七年夏末，在第一批美国军事装备运到后不久，美国代表团要求希腊政府封闭共产党报纸《解放报》，废止罢工的权利，并清洗所有被怀疑对共产党表示同情或传递共产党宣传品的政府雇员。与此同时，洛伊·亨德森在日益严重的危机中到达雅典，他迫使越来越坏的马克西摩斯-特萨耳达里斯政府辞职，而代之以一个由八十多岁的自由党人泰米托克利斯·索福利斯为首的保皇党人和自由党人的联合政府。亨德森回到美国后，发表了好几次演说，不是把希腊问题说成是内战，而说成是民主希腊英勇抵抗“共产党侵略的红色浪潮”。索福利斯在担任政府首脑之前，曾批评过杜鲁门主义的军事方针，认为“同共产主义作斗争，要用经济改革和建设的方法，不能用军事行动去杀害希腊人”。但是，他现在感到不得不采取“同上届政府采取过的一样激烈的镇压措施”。他要求游击队投降，答应给予大赦，但拒绝对未来政府的组成讨价还价。可是，却没有任何游击队自动投降。他们不信任政府，因为警察和军队仍操纵在右派手中，正是这些右派违反了使第一次内战结束的瓦尔基扎停战协定中的大赦诺言。他们现在加强了他们的恐怖活动。

美国的干涉首先加强了右派分子的恐怖活动，因为美国不是把这一危机说成是国内政治上的对立，而说成是外来的侵略，这正好适应了右派恐怖分子们的思想。当希腊政府在伯罗奔尼撒指挥右派恐怖分子作战时，有些军队司令官把美国装备交给各地右派恐怖分子的小组，而且让他们去随意决定谁是共产党人和怎样对待他们。

当杜鲁门主义提出后，国务院某些成员认为，在希腊大量投入美国的力量和金钱，就能够建立一个稳定的、温和的、比较民

主的政府，并且认为军事行动是为实现政治和社会改革创造先决条件的手段。但到一九四八年时，情况已十分明显，军事上和政治上的目标是互不相容的。由于供应武器和把这场斗争主要看成是对付希特勒式第五纵队的活动，而不是把这场斗争看成是希腊人之间争夺政治和经济权力的一场冲突；由于强调了问题的外在因素而不是内部因素，美国不断地加强它在希腊的力量，而对改革却很少兴趣。

当民主化和改革同军事安全之间的矛盾变得明显时，在华盛顿的那些关心改革的人却降低了他们的目标。港口和铁路修复了，科林斯运河也修复了，粮食的分配使数千人免于饥饿，善后救济总署发起的消灭疟疾运动取得了成功，一千英里的优质公路也建成了；然而，造成这个国家四分五裂的基本经济和政治问题没有取得进展。杜鲁门在他的回忆录里，感到后悔地写道：“正当我们着手支持希腊经济，帮助它打击共产党骚乱的时候，我们发现希腊政府想利用我们的援助去达到党派的政治目的，而不是考虑国家的利益。”一九四七年末，美国把指定用于经济建设的大量资金转用于军事活动上，留下来的“建设”项目也大都是同直接支持反叛乱军事活动有关的道路和港口等修建项目。在美国经济代表团到达后的一年中，生活费猛涨了百分之五十三。一九四八年三月，希腊政府宣称全国有百分之三十二的人口是依靠救济过活的。

一九四七年的最后五个月中，运到的美国军事装备有七万四千吨，其中包括大炮、俯冲轰炸机和凝固汽油弹。在大量的援助下，希腊国民军的兵力增加到十三万二千人，国民警卫队增加到约五千人。他们所面对的游击队虽然伤亡很大，但仍约有二万三千人。游击队没有装甲车、没有飞机，也很少有大炮。当美国援助最初涌入希腊时，铁托也加快了他的援助，其中包

括援助最需要的大炮，但却要求把希腊相当大的几个地区划入南斯拉夫联邦为条件。其他卫星国家鼓励叛军领袖马尔科斯将军成立一个自由民主政府，但当他在一九四七年圣诞节前夕成立了这样一个政府时，却没有一个共产党国家包括苏联在内承认它。

尽管政府军队占压倒的优势，在整个一九四七年和一九四八年上半年，游击队发动了一系列的袭击，获得相当大的成功。一九四八年，在越来越猛烈的空袭下，他们差不多损失了三万二千人，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能够补充他们的军队，把它维持在同以前一样的水平上。

一九四八年六月共产党情报局开除铁托后，南斯拉夫并不立即停止对希腊的援助，也不封锁希南之间的边界。但这件事在希腊共产党内部却引起了分裂，象马尔科斯将军那样的人认为，铁托的大炮比斯大林暧昧的善意更为有用；而老的政治家扎卡里阿迪斯却认为，效忠于斯大林所得到的帮助总比偶而受到苏联官员的监督更为有利。斯大林派得胜了，游击运动的失败也开始了。

一九四九年七月，铁托宣布他要封锁边界。但在过去的六个月中，他早已大量地削减了对游击队的援助。更为重要的是，扎卡里阿迪斯不顾共产党邻国的背叛和游击队越来越大的伤亡，亲自负责指挥军事行动。他认为把袭击性的进攻转变为全面的常规战争，就能够挫损美国援助的效果。其结果对共产党人来说，是灾难性的。游击队在第一次大规模战争中遭受了重大挫折，于是在一九四九年五月三日他们要求停火。虽然自一九四六年以来，他们曾提出过二十次这样的建议，但这一次却包含有更温和的条件。然而希腊政府和美国仍置之不理。

在战争的最后六个月中，范·弗利特将军发动了一次“有计

划地把整个地区的人民撤离”的运动，以便把游击队同支持他们的人民隔离开来。埃德加·奥巴兰斯少校在他最近对战争的分析中对这一战术极为重视。他说：“这一战术具有比一般理解更为深远的影响。它撤走了人民；划定了一条‘前线’，阻止了‘反渗透’，并造成了一片死寂……。要一个民主政府采取使数千人民流离失所的这种严酷的政策，甚至在战时，也是一个困难的决定，因而希腊政府犹豫了一段很长时间。然而，一旦这一政策付诸实行，它的收获是极为可观的。”

一九四九年十月十六日，当游击队抵抗差不多已停止时，它的电台宣布：“希腊民主军”已决定“停火”，“以免整个希腊被毁灭”。于是内战停止了。

在以后的二十年内，希腊人努力解决曾经引起血腥内战的那些经济和社会问题。尽管有大量的美国经济和军事援助，但希腊政府仍不能养活它自己的人民。琼·梅纳德教授在他详细地研究当代希腊经济和政治的《希腊的政治力量》一书中，根据大量资料证明，希腊经济停滞和政治混乱还在继续下去。尽管经济上有所改善，但四十年代的基本情况（普遍贫困、文盲、外汇短缺、政府的镇压和无能），在六十年代依然存在，这一切导致了一系列的宪政危机，而在最近又出现了一个特别残暴、落后的军人独裁。

美国还在继续地、深深地卷入希腊政治。希腊政治受大国控制的传统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在过去，希腊是受英国的控制，现在美国扮演了英国的角色。正如在十九世纪时，那里有过一个“英国党”，现在那里也有一个“美国党”。美国大使，尤其是在内战结束后不久担任这一职务的约翰·普里福伊，对于干涉希腊内政更习以为常了。例如，他公开地支持帕帕戈斯元帅当首相而反对另外一派。美国军事参赞同希腊军官团的某些部分有密

切联系。希腊的政治家在议会里指责说，用美国装备配备起来和接受美国资助的希腊中央情报局，听美国人的指挥，执行美国人交给的任务，在实际上已成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个工具。从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六四年，美国给了希腊差不多四十亿美元，其中二十多亿用于军事援助，其余的绝大部分则用于弥补各年预算赤字和支援农业。在六十年代，希腊对美国的出口下降了。虽然埃索石油公司、雷诺金属公司、道化学公司和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等私人资本不断地输入希腊，并且希腊经济的大部分被美国资本有效地控制着，但这个国家的财政状况依然岌岌可危。二十年的美援和美国主宰希腊的政治和经济，使革命和内战避免了，或者说是推迟了，但它们没有能使这个国家在经济上更为公平、更为有能力，在政治上更为稳定。

(摘译自一九七二年英国伦敦出版的《干涉和革命》一书 陈声雅译)

希腊人民的控诉

希腊各民主组织一九五〇年九月十五日致 联合国大会备忘录

希腊各民主组织，以希腊人民的名义，向你们提出紧急呼吁，实现希腊问题的民主解决，只有这样，才会给希腊带来和平和自由。

希腊问题被提到联合国大会的议事日程上，这是第四次了。当你们正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希腊人民将在被折磨、被灭绝、被处死、被饿死，但也永远在为他们国家的权利、自由、独立与和平而奋斗。

到此刻为止，那些对造成希腊的不幸负有罪责的人用尽一切诽谤和阴谋，把他们对希腊和希腊人民的真实侵略，说成是作为邻邦的各人民民主国家对希腊领土完整和独立的所谓威胁。臭名昭著的巴尔干问题委员会集中它的全部力量来达到这一目的。然而，明显而具体的干涉、大量的军事援助和对希腊人民的实际侵略，是所有的人包括巴尔干问题委员会在内都看得到的。这就是以数十万吨计的战争物资的军事援助，被美国人供应给腐朽的、为人民所痛恨的保皇法西斯政权。这就是美国的官员们不仅指挥军事活动，而且亲自参加战斗并从飞机上轰炸平民。这就是许许多多美国和英国的代表团，在美国大使的指挥下真正统治着这个国家。这就是集体屠杀的命令，范·弗利特将军那有名的“抓了就杀”的命令。还有，这就是铁托政权对为自由和独立而战斗的希腊人民的公开攻击。这就是那种援助、干涉

和侵略。所有这些事实每年都被搁在一边，而美国干涉者在希腊内战中每年使大会作出决议，允许他们在希腊继续他们的破坏活动、血腥恐怖、灭绝人性的集中营和集体屠杀。但是，我们一直认为事实是，希腊内战不是外国干涉和它所造成的恐怖、流血、饥饿和奴役的原因，而恰恰是它们的结果。在内战结束时，这一事实对每个人来说就更清楚了。外国干涉者所利用的借口已不再存在。由于一系列的事实，其中最重要的事实之一是，在斗争的关键时刻，铁托对保皇法西斯的支持（这是保皇法西斯他们自己也承认的），而民主军为了希望促进和平解决，决定停止武装斗争。然而，外国干涉者向我们援用的借口的消失，不仅没有阻止他们继续干涉，反而加强了他们的干涉。在希腊，按照美国大使的命令，政府成立了，又垮掉了。按照美国人的愿望宣布死刑和执行处决。美国人命令他们什么时候和怎样举行选举。尽管恐怖和舞弊，在血腥的四年中，当人民有力量在选举结果上压倒刽子手们，从而使外国人大吃一惊时，美国人就对人民所表达的意志实行压制。不是内战招来干涉，而是外国干涉给国家带来混乱，并使它在流血、恐怖、贫困和悲惨的统治下继续受苦，这还需要什么更多的证明呢？外国干涉者不得不把这个陈旧的、早已不存在的借口抓住不放，这个结论是如此自然而明显。而那个所谓巴尔干问题委员会，忠实于它的任务，正在拚命地力图证明，虽然武装斗争已经停止了，而一种所谓新的侵略危险却依然存在，因而外国干涉还得继续下去。于是，通过保皇法西斯和巴尔干问题委员会的共同炮制，发明了种种神话来证明这种站不住脚的论点是合理的。

使他们感到烦恼的是，尽管有去年军事上的胜利，尽管有集体屠杀和史无前例的恐怖，他们还是不能奴役希腊人民。他们没有能够象他们设想的那样把坟场般的死寂强加于希腊。尽管

使用了一切残暴和血腥的方法，他们没有能够建立一个甚至比较稳定的政权。他们在恐怖和欺诈的气氛中组织了选举，在选举中他们排斥一些民主党派，搞了数不清的舞弊行为，但尽管如此，只要人民真正有一点最小的机会，在大城市里，大多数人还是投民主集团的票，因为这些纲领最接近于人民的民主愿望。他们知道得很清楚，不靠流血和灭绝人民，不靠新的达卡集中营，不靠军事法庭的假装公道，他们连一天也不能保持他们在希腊的地位。因为他们为了战争冒险需要把希腊掌握在他们的统治之下，他们甚至没有内战的借口也无耻地赖在希腊不走。但迄今希腊问题的历史表明，只要他们不改变他们的政策，这个问题就依然存在，因为希腊人民将在一定的时候用适当的手段，为他们的自由和祖国的独立与和平而继续战斗。

新的抵抗运动和杜鲁门恐怖

尽管逮捕、酷刑和处决甚至比纳粹还要厉害，按照他们的计划，这一切原是为了想压倒甚至最小的一点抵抗意志，然而两年以后，英帝国主义者终于悲惨地失败了，结果是希腊民主军的诞生和一次新的武装抵抗。

英国人不得不承认他们的失败。他们把希腊问题交给他们最强大的盟邦美帝国主义者，但仍在希腊保持一支派遣军。

在帮助希腊“保卫它的自由制度和国家主权，反对旨在强制实行压制性的极权主义政体运动”的花招下，美国总统于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宣布了杜鲁门主义，五月二十三日，获得了美国国会的批准，这件事是希腊反动派把残暴的、肆无忌惮的法西斯恐怖强加给人民的一个讯号。它实际上宣布了，在英帝国主义者镇压希腊人民遭到彻底失败以后，美帝国主义者要亲自出马，

尽一切力量把无限的现代化武器供应给雅典的法西斯凶手，发动一场血腥的内战，扩大贫困、破坏和灾难，完成英国人所没有完成的事情。

在宣布杜鲁门主义后几天，也是在一九四七年三月，希腊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员、前部长扬尼斯·泽夫戈斯在萨洛尼卡被暗杀。

在宣布杜鲁门主义后九十九天，即一九四七年六月十九日，签订美希协定的前夕，一个行刑队以三十九支机枪和步枪向被拘留在埃吉纳岛上的十七名民族抵抗英雄发射了两千三百发子弹。被处死的人中有闻名国外的抵抗英雄莫内达斯、阿夫盖里斯和布尔迪斯。他们因把卖国贼和同德国勾结的人处死而在大约两年半以前被判处了死刑。杜鲁门主义是把他们带出死囚监禁室不加警告就予以枪决的讯号。

单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至一九四九年七月七日，被处死的有四千七百十一人，其中包括妇女、儿童和牧师，差不多比官方承认的数字大一倍。根据官方报道，在三年半中，雅典当局杀害希腊男女公民的速度是每天两至三人，而一九四九年这一速度加快到每天四人以上。被判处死刑的每月有一百三十人，被军事法庭审讯的每月有一千人。

在实行杜鲁门主义的三年中，还在各处设立了集中营，其中包括马克罗尼索斯集中营，那里的酷刑比纳粹集中营的酷刑还要野蛮。被关进集中营和监狱的有七千人。与此同时，对主要通敌分子，包括德国占领时期傀儡政府的大臣在内，却给予广泛的大赦。

美国的直接军事干涉

去年秋天，在维特西和格拉莫斯山区发生大规模战斗以后，希腊的人民解放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民主军命令它的主力部队停火，仅有小规模游击队还在作战。这样，大规模的军事活动停止了，在美国人方面进行大规模军事干涉的需要也不存在了。有大量的证据表明，这种军事干涉，从任何一点看，都和其他领域中的干涉同样彻底。从一九四八年初起，美国人接管了军事方面的全部控制权。一九四八年八月，保皇法西斯军队事实上的总司令范·弗利特中将作出了一项决定，通知他的希腊部下，今后希腊最高国防会议非经范·弗利特召集不得开会。这些会议的议事日程也要由美国人来草拟。

同月，美联社和合众社都报道，美国军士塞缪尔·纽曼、哈里·德里卡特和弗兰克·凯尔尼特参加了第六十一和七十三旅在格拉莫斯的阿莱维特萨的战斗，他们驾驶了美国坦克进攻希腊民主军的部队。去年在维特西和格拉莫斯发动的大规模进攻中，范·弗利特中将亲自指挥作战。美国谢尔曼少校在这些激烈的战斗中被击毙。

两个记者，一个是美国人，另一个是英国人，描述了外国干涉者从希腊内战中究竟捞得了什么的情况。北美几家报纸的记者约翰·莱奥特萨科斯在一九五〇年五月写道：“这是所有有资格的观察家都同意的事实，美国对它直接花在希腊战争中的五亿美元，已经得到了补偿。……在希腊，范·弗利特什么都干，从组织军队的供应线直到硬要将军们跪在烂泥浆里向士兵们示范，教他们应当如何使用美国式 M1 型枪。美国人还在希腊试用一切新式武器。他们训练了百分之六十六的希腊陆军，为二

十万名士兵、五万名宪兵、一万一千名水兵和八千名航空驾驶员供应食物、武器和军火。俯冲轰炸机在破坏游击队的格拉莫斯和维特西的防御工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此外，半军事组织‘五月’的三个突击旅的十万名成员也全部由美国人负责供应。”

基思·巴特勒在一九四九年九月四日的《星期日纪事报》上写道：“这是一场狂轰滥炸的战争，因为这是一场用豚鼠作试验的战争。凡是杀死人和引起燃烧的一切东西，都被英国和美国所供应的希腊陆军和空军倾倒在游击队的头上。英国的凝固汽油弹是由英国赠送的五十架飞机投下的。英国专家在旁观看，以便得出改进这种新式炸弹的设计和使用的意见。美国军事专家也观看了他们的一种正被试用的武器。他们的最新发明‘无后座力步枪’被用上了，这在任何战争中还是第一次。它象一个畸形的火箭筒，非常轻便，从一个三脚架上发射，由三个人操纵，它射出的三英寸子弹在半英里内准确无比。……仅在特萨尔诺的一个制高点上，集中了九十一门大炮。这九十一门大炮造成了一百二十八人死亡。”

在这场内战中，美国人指挥保皇法西斯军队的程度可以从一九四八年三月十日保皇法西斯军队第八师师长安佐诺普洛斯给第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和七十六旅旅长的一道紧急绝密命令（命令号码为 AP559/A1 STG）中看出来。这道命令被民主军缴获了，内容如下：

“我通知你们下列各点：

1. 在佩尔加莫斯战役停止以后，美国联络组组长弗莱明中校要求知道，经过核实的敌军伤亡人数和所使用的炮弹数。

2. 他在现场计算了每杀死一个人要用多少发炮弹。他不愉快地摇摇头，并以一种非常意义深长的态度指出，美国在希腊浪费了钱，而在别处它可以花得更为有利。

3. 美国联络组的这句话表明了外国人的思想情况和意图。对我们来说，这是对我们今后作战行动的一次明白的警告。

4. 需要保存我们的弹药，特别是炮兵的弹药，这件事已不止一次地强调过了，但没有被各部队的司令官认真注意。然而，如果我们继续浪费我们的弹药，我们总有一天会发现弹药库都被掏空了。

5. 客观地判断起来，佩尔加莫斯战役本来可以使本师获得一次辉煌的胜利。然而事实上，它却变成了一场败仗，由于某些部队不了解他们的任务，因而没有作出必要的行动和发挥机动性。如果不发生这种情况，战果就会是辉煌的，也就不会提到所用去的炮弹了。

6. 此命令阅后必须予以销毁，其内容由各旅旅长在一见到各团团长时就作口头传达。”

内战是过去了，但把希腊建成一个战争基地的计划还在继续下去。希腊是美国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一个巨大海军基地。舰队的来来往往都是由美国和英国大使馆的海军参赞宣布的。

这就是美帝国主义宗主国对希腊人民的恶毒嘲弄。

(摘译自一九五〇年九月希腊各民主组织的《第三号蓝皮书》 桂世祚译)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宪法改革

〔美〕J·M·吉尔森

苏联改革宪法的过程，本质上就是改革工作不了了之的过程。一九五九年，赫鲁晓夫提出重写一九三六年斯大林宪法。但这一企图，也正如他的其他许多企图一样，被以他的领导权为中心的重重矛盾牵制住了。结果，直到一九六四年他被黜废时，还是没有完成。两年之后，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旧事重提，但接着又突然把它埋葬在一片缄默之中，这一缄默至今尚未打破。这样，在这个怪事丛生的制度下的一大怪事就是：苏维埃国家的“最高法”（一九三六年宪法），早已被包括勃列日涅夫在内的国家领导人宣布为过了时的、同现时的苏联社会毫不相干的了；可是，另一方面，现领导集团却又让这个旧文献原封不动，而表现出不想触动它的样子。

改革的起因

赫鲁晓夫打算修正或重写一九三六年宪法的过程，跟斯大林逝世后克里姆林宫政治变化有密切联系。很清楚，他对待宪法改革问题的整个态度，是以他的非斯大林化运动为转移的，而非斯大林化运动又是他同主席团（后改称政治局）内的政敌进行争夺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对克里姆林宫的内圈人物来说，宪法修改问题具有特殊意义，非斯大林化的鼓吹者要比保守分子

更倾向于修改宪法。

在一九五六年苏共第二十次党代会上，赫鲁晓夫向宪法修改迈出了第一步。他在向大会所作的中央委员会报告（在他谴责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十天之后）中，特别强调了“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其表面理由是，在斯大林逝世后，在抢做接班人的斗争中，需要订出领导集团内部相互之间如何行事的规范。

在一九五九年的第二十一一次党代会上，赫鲁晓夫才公开主张修改宪法。这一回，他对党和国家的控制空前加强了。尽管这样，他在一九五九年显然仍感到，而且看来比其他领导人更强烈地感到：宪法中还存在有一部分反斯大林运动的对象和成分。在二十一大上，其他人谁也没有发言说必须修改宪法。但大会关于赫鲁晓夫所作的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中，有这样一段：“苏联宪法应作某些修正和补充。该宪法通过以来，苏联的政治和经济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形势也有了变化。这些变化应通过立法，在苏联宪法中有所反映和记载。”

这一时期，赫鲁晓夫的个人权力在克里姆林权力结构中达到了顶峰。但他当时还不愿（或没有能力）要求彻底重订一部新的宪法，所以还是提议“修正和补充”比较合适。

赫鲁晓夫提出建议后的几年中，并没有出现实质性的修改或补充。人们对他的建议一开始就反映得不怎么热情。此后不久，该建议的主要策动者赫鲁晓夫又去抓新党纲的起草工作了。也许，他认为党纲是实现他那套政策的更好的工具吧。从一九五九年起到一九六一年通过新党纲的这段时间之内，他没有公开坚持重新制宪的主张。然而，新党纲却有空前强烈地提出宪法已过时问题的趋势。宪法把苏联规定为“工农社会主义国家”并提到“无产阶级专政”；而新党纲则把国家规定为“全民国家”，并宣布无产阶级专政早已让位给全面建设共产主义的新时

期了。

赫鲁晓夫既然先后利用在二十大上关于非斯大林化的发言和新党纲，去支持他那创新思想的主张，他也就会企图重新制订这部在大多数人看来仍然是和斯大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宪法^①。这是理所当然的。摧毁斯大林宪法，足以进一步降低那位前领袖的威信，从而迎头痛击党内的保守派新斯大林主义者。此外，他大概也有这样的想法：得趁自己的权力虽在削减但尚未受到公开挑战的时候，制订出一部新宪法来。这将会记在他作为斯大林继承人的功劳簿上，从而也会大大地增加自己的权力和威信。列宁宪法——斯大林宪法——赫鲁晓夫宪法，在这样一个序列中，赫鲁晓夫不仅得以挤入伟人的行列，而且还清楚地意味着他处于同他们平起平坐的地位。这就会大大加强他领导地位的合法性，并更加有利于使自己的权威上升到不致遭受其对手的有效攻击的水平。最后，任何新宪法，当然也要体现他的思想，并进而成为保护他的主要政策和防止今后受到攻击的一种手段。

一九六一年十月苏共召开二十二大，主要是讨论并通过新党纲、新党章，以及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又一次公开的进攻。在这种情况下，关于修改一九三六年宪法的问题，就很少有人过问了。但是，赫鲁晓夫却令人难以捉摸地在他的开场白，即中央委员会报告中提到了这个问题。他说：“苏联现行宪法颁布后的四分之一世纪以来，我国生活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苏联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民主也达到

^①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一九四九年斯大林七十寿辰时，在斯大林追随者中，唯一强调这一联系的正是赫鲁晓夫自己。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他在《真理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苏联人民正确地称之为斯大林宪法的新宪法，反映了社会主义的胜利。”

了更高的水平。我们正在起草的苏联新宪法，必须反映全面建设共产主义时期苏联社会生活中的新特点。”

在这以前，从未公开宣布过有什么彻底制订一部新宪法的意图，更不必说已经在实际进行起草了。看来，二十二大时，苏联宪法的起草工作实际上并没有在进行。很可能只是赫鲁晓夫在进行试探，向他同僚中不好对付的那些人暗示，新宪法草案即将颁布，并用来对他们施加压力。

在一九六二年四月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赫鲁晓夫又把宪法起草问题提了出来，并指出：现在，实际进行新宪法起草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他接着说，一九三六年以来所发生的变革，是如此深刻，因此，如果对宪法“只作个别修改，是无法充分体现”这些变革的。

由修改到重新制订

看来，赫鲁晓夫大概把制订新宪法当作是在一系列政策问题上同他的国内外敌人进行斗争的一种手段，所以宪法改革问题，同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四年十月赫鲁晓夫被迫下台期间领导集团内部冲突日益激烈的关系密切。当时，连一个宪法草案也没有出现，这就表明领导集团内部反对赫鲁晓夫势力的日益强大。

但在一九六二年四月，赫鲁晓夫却仍然稳坐江山。他关于起草新宪法的建议，在最高苏维埃得到了及时通过。次日，就成立了以赫鲁晓夫为首的制宪委员会。该委员会是由主席团和中央书记处的全体成员以及少数几个劳动模范、低级官员和法律专家所凑合起来的大杂烩。

不久，就出现了一些证据，表明领导集团内部在宪法问题上

存在着分歧。它表现为《消息报》(由赫鲁晓夫女婿主编,是赫鲁晓夫的忠实喉舌)同《真理报》各自对赫鲁晓夫的建议作出不同的解释。

在同年六月以前,关于宪法起草工作,再也没有什么报道了。到了六月份,才出现了一个关于制宪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的简单通报。它和一九三六年宪法起草时的做法不同,这次并没有把小组委员会的规模、组成和主席名单公布出来。一九六二年之所以没有报道,几乎可以肯定是,领导集团内部对此大有争议。

一九六三年七月,一篇纪念苏联第一部宪法(一九一八年宪法)的文章提到,根据赫鲁晓夫的建议,“目前正在准备制定一部新的苏联宪法。”至于实际上有何进展,仍然只字不提。最后,一九六四年七月十七日的《消息报》和《真理报》,发表了内容完全相同的关于制宪委员会会议的报道。会上,赫鲁晓夫作了两个发言:一个是“委员会最近工作”的报告;另一个则提出了“关于苏联新宪法草案应该依据的原则的几点初步意见”。但有关“初步意见”的公开报道,措词的含糊是非常突出的,看来是有意要把赫鲁晓夫所提出的任何具体建议都掩饰过去。

从七月到赫鲁晓夫被黜废的十月期间,就再也没有听到过制宪委员会的消息了。

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

赫鲁晓夫下台之后,包括制宪委员会主席在内的上层机构,当然就得换马。一九六四年十二月,最高苏维埃召开的一次会议,完成了这一更换。会议根据波德戈尔内的提议,解除了赫鲁晓夫的制宪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并任命勃列日涅夫来接替。但

当时并未宣布该委员会的组成有什么改变。

一九六五年六月，早先曾撰文主张宪法民主化的《苏维埃国家与法律》杂志编委雷彪西金，又进一步发挥了他的见解。他的最革命的建议是关于选举制度的修改：“我们应该考虑现行选举办法的某种改进，以便选民在苏维埃代表选举中，能更好、更充分地行使他们的意志……本杂志许多读者的来信、来稿，都提出了下列办法是不是更好的问题：对各该选区内每一个苏维埃代表的名额，选举人可在选票上提名不是一个而是几个候选人。”

宪法改革复活了吗？

此后，改革宪法的事，又一直杳无音讯了。到了一九六六年，勃列日涅夫在六月最高苏维埃代表竞选演说中，又提到了将来的新宪法。但他却是当时唯一提到宪法改革的苏联头目，而苏斯洛夫的演说，却赞许“（现行）宪法提供给苏维埃人的权利和自由”。特别令人费解的是，波德戈尔内没有吭声，因为一般说来，他的思想比总书记要更不受拘束。

如果宪法起草工作，确实象勃列日涅夫所透露的那样，在六月份就已开始进行，那末，柯西金总理在八月份给最高苏维埃的正式政府报告中只字不提此事，就更令人纳闷了。从这种避而不谈的做法中，人们不妨得出这样的结论：勃列日涅夫同他的前任赫鲁晓夫一样，他所发表关于宪法的意见，只是旨在放出气球，试探一下罢了。《真理报》的宪法节社论（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五日），又再次提到了勃列日涅夫关于革命五十周年时完成新宪法制订工作的时间表，并说“目前”宪法文件正在起草中。

在两星期后接着召开的一次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宣布了改

组后制宪委员会的名单，新提名的委员有三十三人，使委员总数达到了九十七名。看来，这意味着将作出很大努力，去实现勃列日涅夫的诺言——用一部新宪法给庆贺苏联建国五十周年的大典“增添光辉”。

宪法改革扔进了垃圾堆

人们的期待是注定要失望的。从那时起，修改宪法问题一次也没有再提起过。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勃列日涅夫在纪念苏联建国五十周年的主要讲话中，却回避了这个问题。事情是明摆着的，他早先预告新宪法即将问世，就是要人们迅速地把它忘记掉（而作为一项使人们忘怀的措施，在他以后出版的两卷言论集中，就干脆删掉了他于一九六六年六月的那一次讲话）。

勃列日涅夫最初要主持这项制宪计划的动机，大概也同早年赫鲁晓夫的动机差不多，因为这位新上任的总书记也想为自己的个人威信捞到同样的资本。他之所以需要某种戏剧性的个人创举，是为了提高自己在尚未稳定下来的政治局领导集团中的威信，这一点也不亚于赫鲁晓夫。但是，新宪法一旦制定，勃列日涅夫捞到的资本，肯定比谁都要多。这一事实，引起了那些政治局委员的猜忌。他们宁愿让勃列日涅夫只是在集团中同自己“脚碰脚的第一把手”。在这一方面，也正象在其他方面一样，勃列日涅夫地位的任何增强，势必使他政治局同事们的地位相对削弱。

对于一个离共产主义已经不远的社会，新宪法当然得从原则上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但是，宪法改革所花费的这个代价，即使最终换得的是勃列日涅夫个人的盈余，也未免太高了。除了这一考虑外，大概勃列日涅夫内心里，也唯恐坚持宪法改革会

削弱他在领导集团内部取得支持的保守基地，并从而打乱他那份权力所依靠的、微妙的力量平衡。看来，大概上述这些因素互相纠结，终于使他打消了在一九六七年初的意图，再也不公开谈论这件事了。

苏联报刊显然是迫于捷克事件的压力，压根儿不提什么公民的宪法权利，而日益强调其反命题——公民的义务和职责了。

苏联侵犯捷克一事，也同时给宪法改革工作贴上了一道封条。现领导集团不再指望修改宪法了，因为这将会扩大和增加公民个人的权利。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五日苏联宪法节时，《真理报》上有下列这段文字，其弦外之音也就在这里：“苏联人民都知道，（宪法）既宣布了也在实际上保障了劳动人民的政治自由和社会权利。”

现在，对政治局来说，起草一部新宪法是半点油水也捞不到了。当前苏联宪法（在纸面上）早就是“世界上最民主的”，从而也已经符合这个政权的全部宣传机器的需要了。而制订一部新宪法，姑且不谈苏联领导集团在起草过程中会碰到多大困难，却只会徒然增添出许多无法解决的纠纷。

要是事实上并没有更多的民主，那末，宪法本身又怎样可以“更民主”呢？

在一九七〇年，最高苏维埃甚至根本不想去调整一九六六年制宪委员会的成员了。而在这个委员会里，有些委员早已不在人世间了。

看来，从莫斯科传来的是这样的信息：新宪法制定已短命夭亡，但愿现行宪法能延年益寿！

（摘译自一九七二年九、十月号美国《共产主义问题》
杂志 万航译）

修正主义和帝国主义 之间的文化勾结

〔新西兰〕《共产主义评论》杂志

阿尔巴尼亚《团结报》最近有一篇文章，涉及苏美两国之间在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里的勾结。

搭起东西方之间的桥梁？

华盛顿已使用了这种方法对东欧进行渗透，以引起那里的社会主义制度蜕化变质。主要的策略是散布“自由”思想。

这就是为什么约翰逊总统说要搭起东西方之间的桥梁。他指出，一旦苏联向美国的意识形态、文艺大开渗透之门，就可以掀起旅游者、思想意识、书报等大量涌进的浪潮，削弱社会主义，侵蚀它的思想意识基础。

与此同时，赫鲁晓夫之流的头头们也站出来，支持这种文化上的勾结。勃列日涅夫宣称：“我们也赞成这样做。”

美国文化对苏联生活的渗透

文化交流正在与日俱增。这已成了苏美反革命“神圣同盟”的一个组成部分。尼克松总统已进一步发展了这个政策。

一九五八年第一个苏美文化合作协定签订时，美国情报局

的头头就说：“我们已使铁幕打开了一个缺口。”从那时起的十五年中，到苏联去的美国管弦乐队、芭蕾舞剧团、小型爵士乐队等已超过二十六起。它们在苏联各城市中举行的无数次演出散布了颓废音乐，把苏联青年引向歧途，引诱他们去模仿美国的嗜好和生活方式。

从百老汇进口的戏剧和电影

苏联剧院已在上演浸透了精神分析学和“现代派”倾向的种种美国作品，而苏联电影院则放映着兜售暴行和色情狂的美国电影。

统计数字表明，苏联电影院放映的影片，每四部中就有一部是进口的，其中绝大部分来自美国。双方频繁地举办联合电影节，甚至联合拍了些片子。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还订立了交流电视和电台节目的长期协议，这就进一步打通了美国宣传品在苏联广泛渗入之路。

苏联修正主义者进口的美国宣传品包括颓废小说、色情杂志、黄色唱片等等。另外还有成千上万的美国家旅游者，双方举办的艺术展览等等。这种同美帝国主义分子在意识形态上的同流合污，已为莫斯科的修正主义分子带来了必然的后果。

修正主义者丢掉了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

苏联美学家已变成“世界主义者”，他们接受了从美国进口的颓废倾向。他们大谈特谈什么艺术是“纯洁的”、“非常现实主义的”、“有人情味的”。抽象派和形式主义派也已经出现了。他们已丢掉了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革命精神和对未来抱乐观主

义等种种优秀的传统。

修正主义者现在已在公开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社会主义的经济学说、历史科学、马克思主义美学等等发动进攻。他们正在努力要把唯物主义演变为唯心主义，把辩证法演变为形而上学。

他们要用演变来代替革命，用“和平经济竞赛”来代替阶级斗争，用资产阶级的颓废倾向来代替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

这种同帝国主义的同流合污，正在对苏联生活的性质产生严重的影响。犯罪、道德败坏、盗窃、抢劫、酗酒、流氓阿飞行为已变得到处泛滥。

事实证明，凡是修正主义篡夺政权的地方，这种同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之间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勾结，就是针对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反革命全球战略的一个环节。

（摘译自一九七四年四月号新西兰《共产主义评论》杂志 张仲礼译）

一只普通的手

〔苏〕Y·马拉巴根

对人的仁爱，折磨着莫斯科州的巴拉施哈城市住房管理局局长罗卡金。在他看来，人类大部分都是一群乌七八糟的房客，满怀希望和感激注视着他的手。而这双手也使罗卡金惊讶不已，有时甚至使他自己也感到害怕了：好象是普普通通的手却隐藏着这样的力量。

“你瞧”，经常是在开完局委会之后，罗卡金同志会陷入这样的沉思：“看来一只普通的手握着一枝普通的钢笔，在一张普通的纸头的一角写上普通的字。然后在普通的字下面出现了签名：‘A·罗卡金’，立刻在轮到的申请者的眼睛里仿佛整个世界都迸发出了美丽异常的光彩！这当然是在手写上‘同意’的时候才发生的。如果写上‘不同意’呢？那么就好象诗人说的，让那倒霉的家伙哭泣去吧，让他等待命运女神的车轮转弯吧。”

和罗卡金同志一起观察他手的动作的，还有巴拉施哈市苏维埃执委会主席沃尔科夫同志和莫斯科州执委会的房管局局长安德烈耶夫同志。那从容不迫的动作，渐渐地麻痹了他俩的警觉，于是罗卡金同志对人的仁爱开始具有我认为是实用的和滥用的倾向。在等待改善住房条件的无个性的群众中开始显示出具体的个性。个别人从群众中分离出来，不按任何次序，获得了自己的“同意”。就这样，市房管局的会计主任什毕塔诺芙斯卡娅，第二房管所的教导员高尔捷耶娃，公民证登记员雷先科，担

任技师的体育教练阿列克谢耶夫,都非法地得到了补充面积。

罗卡金同志对本局技术人员的仁爱,渐渐地热烈到破坏莫斯科州苏维埃执委会和莫斯科州工会理事会主席团批准的“分配住房和登记需要住房的公民的规章”的程度,获得住房好象成了这位或那位同志在这个局工作的结果。

最近五年,在市房管局和房管所的工作人员中,有三十三户的住房条件改善了,其中二十四户的面积超过了定额。对其中许多人,例如技术巡视员腊津金娜、舍米亚金娜、彼特楚诺娃、第四房管所的总工程师裘日夫和房管员察德连柯等人,罗卡金的仁爱就迸发过两次,对她们已经改善过的住宅条件加以再改善。

当然,甚至象罗卡金这样大慈大悲的人,也不能平等地关怀所有的巴拉施哈人。所以迄今市执委会还没有改善市里许多伟大卫国战争中的残废军人、烈士和其他排队者家庭的住房条件,这就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了。

当你真正爱人的时候,你就有许多东西看不见,甚至还会加以原谅。在第二房管所的人民监督组组长捷连斯基发现三十二个工程技术人员中有半数以上的人不具备建筑工程的专业知识以前,谁也没有看到这一点。当然这并不是指所有的人,那些住在融化的雪水从房顶、墙壁和窗子里漏进来的房子里的房客们,就早已发现了这种情况。房子修理过了,但是水照漏不误。再修理一遍,水还是漏个不停。在第二房管所,十八幢房子中有十六幢房子长期漏水……但是这和罗卡金同志的偏心已经没有直接的关系了,而主要是由于莫斯科州修建局第一托拉斯的修建处出了废品(顺便提一下,为了这项“工作”他们拿了九万卢布),也由于市房管局的技术检查水平太低。

生活就是这样,十全十美的幸福是没有的。总是有这样的第三者企图硬挤在相爱的人中间,恶作剧一番。

也有妨碍罗卡金同志仁爱的人。一个是房管所的工会主席博加切夫，他认为(这是有根据的)工会负有参加分配住房的使命。另一个是房管所的人民监督组组长捷连斯基的坚决要求，他直率地宣称，花费在房屋修理上的九万卢布是白白浪费的，因为漏的房顶仍然在漏水。

对热烈的仁爱竟报以原则的批评，真使市房管局局长大伤其心。不久，博加切夫同志和捷连斯基同志明白，罗卡金同志不仅会爱，还会恨。

“工会？”他在和巴拉施哈区人民监督委员会主席谈话时宣称：“我可不需要什么工会。它妨碍我爱人。”

“请您说明白一些，该怎么理解您的见解——九万卢布从烟囱里飞走了？”罗卡金同志对捷连斯基同志说：“您要看看清楚，在批评我们的同时，您使巴拉施哈最好的一个房管所名誉扫地。而巴拉施哈的事情，也就是省里的事情……”

过了好久，当罗卡金同志毫无根据地签署了一纸处分博加切夫同志的命令，并且起草了一张控告人民监督组组长犯有诽谤罪的提纲后，他才平静了下来。

他的手从容不迫地在纸上移动，情绪好了。他一边打上句号，一边沉思起来：“瞧，多么荒唐可笑：真可以说，自己的这只普普通通的手就是统治者！”

(译自一九七五年四月二日苏联《消息报》 上海市
房屋材料储运站青年工人张祖谦译)

此地无银三百两

——评甘恩的《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
和“新阶级”》一文

上海五七农场青年工人 晓 阳

正当殖民主义在世界各地犹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时候，美国斯坦福大学有个名叫刘易斯·甘恩的人，居然抛出了一篇题为《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新阶级”》的文章（译文见本刊第四期——编者）。作者挖空心思地拼凑了一些“数字”和“事实”，竭力鼓吹帝国主义的“繁荣”不是来自对殖民地的侵略和掠夺等谬论，并以此恶毒攻击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在这里，甘恩玩弄的是卑劣而又愚蠢的“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把戏。在今日世界上，如此厚颜无耻地公开为殖民主义大唱赞美诗的人，大概已是为数不多了。

提起殖民主义，由来已久。甘恩先生的老祖宗们，早在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就残酷地剥夺本国的农民和无产阶级，开始了对殖民地进行血腥掠夺。炮舰开路、枪弹说理、鸦片贸易、奴隶贩卖，使亚洲大陆尸骨遍野，非洲许多地区的居民被杀尽卖绝。就这样，“直接靠掠夺、奴役和杀人越货而夺得的财宝，源源流入宗主国”，流到甘恩的老祖宗手里，转化为进一步吮吸人血的资本。在用血与火的文字写下的资本主义发家史上，“殖民制度在当时起着决定的作用”。帝国主义的忠实辩护士甘恩先生，难道

把自己的“家谱”都给忘了吗？

帝国主义大厦的基础，是无产阶级和殖民地人民的累累白骨。可是，这座大厦早已摇摇欲坠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兴起，使旧的殖民体系迅速瓦解，帝国主义的地盘急剧缩小。甘恩所列举的有些数字，在某种程度上确也反映了垄断资产阶级对自己的没落命运的悲哀。但是，如果把这些数字当作殖民利益对帝国主义“无足轻重”的论据，那未免是打肿了脸充胖子，太有点阿Q气了。

在今天，殖民地对帝国主义来说，真的已经是“无足轻重”了吗？不是。帝国主义迫于世界人民反帝革命斗争的压力，不得不收起老殖民主义的青面獠牙，装出一副伪善的面孔，口头上也承认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但是实际上玩的却是一套阴险毒辣的新殖民主义的卑鄙手法。殖民地是帝国主义的生命线，帝国主义越是趋于腐朽没落的时候，它对殖民地的依赖性就越大。新殖民主义辩护士甘恩的满嘴“仁义”，掩盖不了帝国主义侵略掠夺第三世界人民的罪恶行径。如若不信，请看事实：

今日的亚非拉地区，仍然是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最有利的场所。当然，今日的资本输出，往往被冠以“援助”的美名。这是一种怎么样的“援助”呢？一九七〇年，帝国主义国家贷款“援助”第三世界国家一百四十七亿美元，但当年就逼人家归还五十九亿美元的本息，并且还附有侵犯主权、干涉内政的苛刻条件。美国《哈波斯》杂志主编费希尔在写给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汉密顿的信中露骨地表示：“我相信你会在（‘援’外的）每一角银币上都系上一根链条，如果这个银币不是为清楚地规定好的美国利益花用，你就会死劲勒紧这根链条。”事实就是这样，“美援”就是束缚亚非拉地区人民的锁链，它服务于美国垄断资本的利益，服从于追逐最大限度的利润。美国在有些地方，一年内获得的

利润往往要超过投资或“援助”总额。就连美国贸易委员会主席肯达尔也不得不招认：“我们唯一真正有盈余的地方，是我们国外直接投资的回流。”这不能不是对甘恩之流为新殖民主义涂抹的脂粉的冲刷吧？

一九七三年底，中东国家团结起来，拿起石油武器，打得帝国主义焦头烂额，狼狈不堪。这个事实再一次证明，无论是老殖民主义，还是新殖民主义，它们不掠夺亚非拉地区的资源，就无法过活。洛克菲勒供认：“美国全部天然橡胶、锰、铬、锡，很大部分锌、铜、石油以及三分之一或者更多一些的铅或铝，主要是从亚洲和非洲来的。”如果说，第三世界对帝国主义已“无关紧要”，那末，为什么第三世界人民起来造反，帝国主义者就心惊肉跳、哇哇乱叫呢？

亚非拉地区又是帝国主义重要的商品销售市场。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基本矛盾加剧，经济危机接连不断的情况下，控制海外市场，倾销过剩商品，转嫁危机损失，更成了当务之急。如果说，亚非拉地区对帝国主义“无关紧要”，那末，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发生的汽车战、纺织品战、小麦战等等一幕又一幕贸易争夺丑剧又是为什么呢？

东南亚、中东的每一朵战云，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发生的每一次反动政变，几乎都有帝国主义的魔爪在活动。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干，无非是为了镇压第三世界人民的反抗，维护它们在当地的新殖民主义利益。甘恩关于美国支持东南亚战争“决不是为了美国经济利益”的说教，完全是不值一驳的。唯利是图的垄断资本家，决不会无缘无故地打“一场花费巨大、旷日持久、而不得人心的战争”。

列宁说：“在市场上常常可以看到一种情况：那个叫喊得最凶的和发誓发得最厉害的人，正是希望把最坏的货物推销出去

的人。”甘恩正是这么一个蹩脚的新殖民主义的推销员。不过，他也从反面教育我们，尽管帝国主义的地盘越来越小，但是，它们决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也决不会放弃它们的“生命线”。它们会采取新的手段，玩弄新的花招，以维护殖民利益。对于这种种阴谋，世界革命人民必须要有所警惕！

当前，革命风雷在世界各地激荡，柬埔寨军民解放全国，越南南方红旗插遍，第三世界国家反帝反殖反霸斗争的浪潮不断高涨。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这一切，都宣告了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灭亡是必然的，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一九七五年美国老年人的生活

〔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

对于美国二千一百八十万年龄在六十五岁以上的人来说，当前这场犹如脱缰之马的通货膨胀，使得依靠固定收入的生活，变成了一场深长的噩梦。

在大城市的贫民区里，再也付不起其他地方房租的年老男女，正在聚居到“灰窟”里来。他们害怕外面街头游荡的窃贼和强盗，常常寸步不离他们那实在很低劣的房间。

在许多美国人视为“梦想之城”的旧金山，一位八十二岁的退休警官，眼睁睁地看着他平素的积蓄逐渐用罄，而他还在等待菲薄的养老金有所增加。

在一个工人居住区，有位靠一笔他原来认为足以够用的养老金生活的退休老汉，已经弄到了非得每天徘徊街头，询问人们是否需要雇他去修剪草坪的地步。

旧金山有成千个老年人生活在苦难深渊的边缘。他们紧缩伙食，并且为食品代价券、房租和医疗费用的上涨而苦痛万分。

一个惊惶不安的妇女，在提供政府补贴食品的免费医疗所对记者说：

“买食物的钱，我连一分都没有了。明天我可以在这里吃，可是到下星期二以前叫我怎么办呢？”

对于大多数老年人说来，飞腾的通货膨胀正在成为他们余年的严峻而左右一切的事实。在旧金山是这样，在全国各地也

都是这样。

密执安州老人服务处代理主任说，年在六十岁或更大一点的人们中，现有三分之一的人每天吃不到三餐，而且境况也许会更加恶化。

纽约市老人服务处主任艾丽斯·M·布罗菲报告说，绝大多数老年人正“走投无路”，因为穷人的主食的价格在飞涨。

在迈阿密州，有地位的市民在敦促搞一项州办彩票，为所有老人提供免费医疗，以帮助他们得以了此残生，而免受通货膨胀的危害。

一位发言人说：“通货膨胀正使得老年公民受饥挨饿，事情就是这样。有许多回，他们付完房租以后，就没有钱买食品代金券了，虽然他们有资格得到它。”

在亚特兰大，东南部老年人委员会一名官员认为：“这些人经历过经济萧条，两次世界大战，后来又送他们的儿孙去越南打仗。

“他们经受了所有这一切，真是坚强的人啊。要是经济再糟糕下去，他们也许得再经受一次呢。”

当前，扶摇直上的通货膨胀，对全国老年人的全面影响，是难以掌握的。

在旧金山，每五个市民中有一个是六十岁以上的。在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日子里，约有五千个贫苦老人至少得到一顿政府补贴的热餐。

为了对这种现状有相当广泛的了解，为了把美国千百万上了年纪的人的目前处境描绘出一个缩影，《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一名记者，花了许多白天和夜晚同几十个靠固定收入为生的老年男女谈了话。琼·梅勒太太，七十四岁，已同在罗得岛州的丈夫分居，一年前迁入旧金山。有一段时期，她每月靠从社会

保障机构领来的八十一美元生活，每天靠一顿受补贴的饭餐凑合着过活。

梅勒太太和其他老人一样，为犯罪率高、娼妓和贩卖麻醉品的情况发愁。特别是社会保障机构的支票发到手，老人出去把它们兑成现金的时候，经常发生抢钱包的事情。梅勒太太说：“你没有能力自卫。大多数老人在下午三点钟以后就不上街了。”

物价上涨使她很恼火。她说：“你知道有人饿死在街上。有人在捡垃圾桶里的东西吃。你信不信？真是在啃垃圾桶里的东西吃啦！你知道，为了一只面包得付那么多的钱，日子多么艰苦啊！”

梅勒太太说，最近几个月里，她已同个老年公民的团体“市场街北房客组织”站在一起，要求市、州和联邦各级政府改善对老年人的津贴和服务。

她解释道：“这儿附近的许多老头儿和老太婆，都能为了他们自己的生存而进行斗争。但是极大多数却不行。他们已活得不耐烦了。”

“我要使那种态度转变过来。我们这里尽管全都是穷人，可是我们要反击。”

总的说来，美国老年人的现实情况是：六十五岁以上的人数在增加。由于通货膨胀严重影响了固定收入，为恐惧所苦的美国老年人的比例也在扩大。

目前，这些老年人看不到将来会得到多大帮助，倒看见了不
少迹象表明更多的困难还在前头。

然而，恐惧也在许多老年人中间产生一种积极奋斗的精神。

最近，在迈阿密州出现的一个突出例子是，达德县老年公民委员会组织了一次抗议集会，有声有色地宣传通货膨胀对老年人的影响。预期有四百五十人参加，结果是八百人出席。

迈阿密州这次集会的一个领导人，七十四岁的珠宝行业退休人员马克斯·塞查克说，如果不采取措施帮助老年公民去对付通货膨胀，“就会发生更多的抗议”。

在内华达州，老年人已经在征集几千人签名，以支持州立法提案利用六百多万美元联邦基金（到目前为止，内华达还未动用）向那些够不上享受免费医疗的老年公民提供医疗补助。

休斯顿住房管理委员会常务理事汤姆·布克说：

“现在一般上了年纪的人，都比较有政治觉悟，对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也比较了解。老年人将会更多地发表他们的意见，并且必将不再缄默下去，使别人不能再不加理睬了。”

（摘译自一九七五年二月十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杨宇光译）

伊朗国王巴列维的雄心

〔日〕笹川正博^①

拥有巨额石油收入和强大军事力量、一心向往古波斯帝国的国王说：“我们在一代内将成为世界五大国之一。”

“朕即国家”

那是一九七一年十月伊朗纪念居鲁士大帝即位二千五百周年庆祝大典时的事情。在庆祝仪式结束后的一个夜晚，国王招待全体记者团举行了游园会，王妃也一起出席了。我们一涌而上，围着国王，自由地提出了各种问题。某个外国记者问：“国王，有人责难您纪念二千五百周年花钱花得太多了，是吗？”国王说：“是我的国家。纪念国家的大典，不会是浪费的。”说着就轻轻地转身避开了。

那是一个轻松的漫谈会。他本来是军人的儿子，没有波斯王朝的血统。父亲是以政变取得天下的。因此了解平民的心理。他之所以能大胆地推进社会改革，正因为他不是什么“高贵的出身”。不过在那个夜晚，我一方面感到国王是“平民”，一方面又感到他是“路易十四”。正是所谓“朕即国家”。这就是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其人。

^① 作者是日本《朝日新闻》东京总社编委。——译者

现在，世界已不能藐视他了。他是提高石油价格的鹰派，著名的反共者，有时对美国也是从容自若的。但是美国总统和国务卿也不能轻看他。他已是伟大的人物了。

夹于英苏之间

“作为年青的王储，在瑞士读书的时候，有一天，一个送牛奶的人问我：‘您是哪个国家的人？’我说：‘是波斯。’我回答了这句话以后，对方就这样说：‘啊，听说过的。那是美国的一部分哎。’”这是伊朗国王在他的自传《对祖国的使命》一书中的开场白。

他是一九一九年生的，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六年在瑞士读书。同送牛奶的人会见的时候，他是一个感情充沛的第十代王储。在三十年代，波斯是怎样一个国家呢？

一九二一年发动政变，他的父亲礼萨·汗，掌握了卡查尔王朝政治实权，开始在国内推进近代化，对外采取民族主义的政策。从十九世纪后期，开始受到英国和帝俄干涉的卡查尔王朝，听任波斯成了英、俄两个强国角逐的场所。一九〇七年，英国和帝俄为了使其它列强承认其各自的利益，缔结了《英俄协定》，划分了在波斯的势力范围。

一九二一年着手政变时，礼萨·汗力图提高这个国家的政治地位。政变以后，缔结《波苏友好条约》，结束了过去帝俄强加于波斯的不平等关系，并废除了一九一九年与英国签订的条约，使英军撤出波斯。一九三五年改国号为伊朗（伊朗一语，源出于意为“高贵”的古代波斯语“雅利安”，即“雅利安民族之国”的意思），发扬民族主义的精神。但无论怎样，那时它在国际上地位很低，几乎没有人知道。

我们再回过头来谈谈他的自传吧。国王在该书第六章“我的

积极的民族主义”中写道：“英国和苏联这两个帝国主义，在过去五十年到六十年中，给了我们国家很大的苦难。但因此也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育，懂得什么是真民族主义，什么是假民族主义。……也使我们从帝国主义者所用的手段那里，学会了对付它们的手段。……关于对付帝国主义的方法，我们得出了两个结论。……第一个结论就是：世界后进国最应该警惕的是新帝国主义，也就是新型的全体主义的帝国主义。……第二个结论就是：对于新老帝国主义者，都要对付它们！绝对不能懦弱胆怯和低头哈腰。对于帝国主义，我的信条是：一要坚决维持对等的精神；二要经常依靠团结（包括国民的团结和真正友邦间的国际团结）所产生的力量，同它们针锋相对。”

这段话，用来观察伊朗国王这个人和他的战略，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钥匙。

一九三九年九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伊朗宣布了中立。这对于积极参加战争并无利害关系的伊朗来讲，确是避免了一次“火中取栗”的蠢举。但是，王太子穆罕默德·礼萨，却认为这是小国的悲哀。

父亲礼萨·汗，当时有意识地采取了同德国友好的政策。这样做，不仅使一向苦于英俄勾结的伊朗祖国，可以成为缓冲地带，而且还具有其它的积极意义：首先，对于当时想提高技术，改良产品、追求近代化的伊朗来说，德国是一个合适的对手。其次，德国对于伊朗，从未有过作为帝国主义者的史实，两国间只有经济、文化关系，也没有过干涉内政的事。此外，德国和东方的日本，当时正表现出好象是反对英帝国主义的亚洲解放者；而纳粹德国的“雅利安人种主义”，也正好满足了伊朗的民族自豪感。

尽管这样，伊朗也不是信服纳粹德国的意识形态的，也没有

同德国缔结防卫条约，而只是宣布了中立。但这个对德友好的态度，却被英苏利用来作为破坏伊朗中立的借口。一九四一年六月，德国进攻苏联后，同盟国必须采取某种形式来对苏进行军事援助，当时就决定经由伊朗运输军需物资。同年六、七、八月，对伊朗致送了备忘录，要求驱逐在伊朗居住的约五百名的德国人及其家属，伊朗迟迟未作答复。八月二十五日拂晓，英俄两国军队就分别从南北两路侵入了伊朗。

伊朗军队的抵抗，支持了两天就崩溃了。自此以后直到战争结束，伊朗即处于英苏占领之下。九月，名誉扫地的父亲礼萨·汗，愤然退位。在自传中，现任国王认为，“父亲不是为退位而退位的”。他的说明如下：“父亲不是一个能够坐视外国军队占领国土、干涉内政而继续在位的人。父亲同我说过：‘国民叫我代表国家的利益，一直认为我是一个坚强的、值得尊敬的独立的君主。要我留下来作为一个被占领国的傀儡君主，作为人来讲，那是不可能的。身为国王的我，你想我能接受一个默默无闻的英军大尉、苏军大尉或其他军官的命令，听任他们摆布吗？’继承父亲而即位的我，除了跟同盟国的首脑和大使有接触外，同任何其他代表都不曾有过交涉。”

加冕式延期举行

这一年，王太子穆罕默德·礼萨是二十一岁，做了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国王。他说那天的感慨是“我已投身于苦难之海”。在瑞士学习过欧洲的民主主义、正义和自由，同时又亲眼看见过希特勒登台而回国的青年国王的心目中，对于迫使父亲退位的英苏，究竟又是怎样的看法呢？

“同盟国送给父亲的备忘录，不能不认为是一个欺诈。与其

说它们要和父亲解决问题，毋宁说它们的兴趣在于找到一个入侵的借口。”

总之，国王所最不能容许的，就是大国对小国的旁若无人。当时以大国俘虏似的身分即位的礼萨·巴列维，决定延期到“成为一个值得自豪的国家元首之日”（当时国王的话）再举行加冕式。这个吉日良辰，终于在二十六年以后的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六日来到了。

“投身于苦难之海”的国王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解放被占领下的祖国。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九日签署三国同盟条约，以伊朗和占领国英苏的关系正常化为目标，表明了伊朗要求解放的可悲愿望。由九条条文组成的条约，中心内容是“占领军在战争終了后六个月内撤退”，“对苏的物资运输，伊朗应提供一切的便利，同盟国同意减轻伊朗因战争而产生的经济困难”。但实际上并没有那样做到。他描写当时的心情说：“同盟国的不断干涉内政，真使人不快之极。……我在悲痛之余，熬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

在这个帝国主义的教室中，国王学到了一件事。那就是：对抗强力的政治，必须要用强力。

当时，国王并未具有足以对抗同盟国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但他却有另外一种力量，那就是：国民对他的支持在不断增强；在“苦难之海”中也没有失去的他本身的勇气。

举出一个例子来表示他的勇气吧。那是一九四三年的事。在不断升级的通货膨胀中，同盟军为了对官兵发薪，要求当时的卡巴姆首相大量增发通货。首相拒绝说，掌握通货增发决定权的是议会，议会怕不会同意吧。同盟军就要求：“重新制定法律！”在这个要求被拒绝以后，就要求国王“解散议会！”。国王的答复是：“议会解散不解散，以及什么时候解散，这只有我和国民

能决定。任何第三者都不能对此发布指令。断然拒绝。”这样就中止了同盟军的干涉。

成功的“白色革命”

一九六七年，国王发表了《伊朗的白色革命》这本著作。所谓“白色革命”，是一九六三年国王提出的用非暴力手段进行的经济、社会改革计划。以下是该书要旨。

关于外交政策：

增进和平、共存和相互理解。

努力埋葬世界上富国和穷国的差距。

支持任何国际合作计划，支持消灭文盲、贫困、疾病和其他社会恶害的行动。

一切国家都是独立的，同时应该承认相互依存的原则，并应自觉地担负起为实现相互依存的义务和责任。

关于自己的心境：

一九四一年九月我即位时，由于外国侵略的结果，政治机构已完全崩溃，到一九六三年一月，我终于站到能开始自主行动的立场上来了。

在这段时间中，苦于形形色色为外国势力所操纵的分子。第一是显然为外国势力所操纵的政治家；第二是戴着民族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假面具的、叛卖祖国的政治家；第三是封建的地方势力，为了守住自己的利益，争先恐后为外国的意图服务的人；第四是听命于特定的外国，自称为宗教指导者的那些人。他们都是伊朗进步的阻碍者。

关于白色革命：

伴随着人类社会中教育、科学、社会和经济思想的进

步，曾经几世纪来都认为当然的社会秩序，已经不能接受了。

我国也必须适应这种现实情况，推进同伊朗地理、历史、民族精神和性格相适应的新社会的建设。

在这里，我提倡合乎伊朗民族传统的、完全伊朗式的革命，通过国民投票，得到了压倒多数的支持。这个革命的宗旨如下：(1)土地改革；(2)利润归还劳动者；(3)解放妇女；(4)扫除文盲；(5)改善医疗制度；(6)去除农村的后进性；(7)防止石油、矿物、鱼类、森林等天然资源的私有化；(8)防止重工业的卡特尔化、托拉斯化；(9)铁道、邮政、电报、航空公司等由国民管理；(10)堤坝、河川等水利资源实行国有化；(11)奖励个人的创造发明。

一切基于敌意、反感、阶级斗争、特定阶级对其他阶级进行榨取等的意识形态，本质上都是和伊朗民族的精神、文化和思考方法不相容的。

从一九四一年伊朗为英苏占领以后，到一九六三年国王“能够开始独立自主行动”时为止，已经过了二十二年的岁月。在这里，把这二十二年中的动态，重点地回顾一下吧。

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国王就根据三国同盟条约，要求英苏两国军队撤退。由于战后的东西方关系，以及苏联对伊朗北部反政府分子的亲苏政权别有企图，问题是很棘手的，但撤兵总算大体按条约规定实现了。这样，自国王即位以来，才开始做了独立的伊朗元首。但他作为元首，在国内还远远没有树立起自己的权威。

他不得不同《白色革命》中指出的形形色色的反国王分子进行斗争。最大的事件，就是石油国有化问题。

当时，国王一方面不满意英伊石油公司不顾伊朗国家利益

的经营方式；另一方面；由于经济的理由，也反对石油国有化，但摩萨台首相却感情用事地利用民族主义的浪潮，在一九五一年四月，断然实行了国有化，结果导致了伊朗经济的崩溃。国王曾试图进行一次反摩萨台政变，但终因失败而暂时出走意大利。在扎希迪将军再度政变取得成功数日，国王又重新回国。从此以后，才开始逐渐确立起他的权威。一九五四年设立了国际石油财团，解决了石油纠纷；成功地取缔了左右过激派；国王又依靠美国的援助，努力重建了伊朗经济；着手实行土地改革等自己设想的国家近代化计划。

但是，国王在国内权威的确立，却是“白色革命”（正式应称“国王和国民的革命”）的成功。一九六七年伊朗国民收入的增长率是百分之十二，这在后进国中，已达到了惊异的数字。“白色革命”所指望的完成目标，几乎已超过了；在世界通货膨胀的滚滚巨浪中，伊朗一九六六年的物价上涨率，仅仅只有百分之零点八七。

一九五四年国际石油财团的设立，避免了国家的破产；现在，伊朗国力已恢复到能够对过去同意的石油业经营方法，对国际石油财团表示不满了。一九六五年，国王对国际石油财团提出，为了增加伊朗的收入，要求到一九七〇年把生产翻一番。但国际石油财团认为，即使生产扩大，也没有市场，因而拒绝了国王的要求。可是到一九六七年，国际石油财团还是同意了国王的要求，承认国王对生产目标的决定有发言权。在外交方面，也从西欧的一边倒，进入到和苏联、东欧也发生了经济关系。伊朗已开始是独往独来了。

现在谁也看到，礼萨·巴列维所说的“成为一个值得自豪的国家元首之日”似乎已到来了。对“白色革命”带有怀疑看法的西方评论家们，也开始承认了它的成功，其中甚至有把国王称为

“拥有王位的波斯革命家”的(《每日电讯报》)。在“白色革命”的压力下,代表极右势力的“民族阵线”崩溃了,伊朗共产党也分裂为两派,一派支持了“白色革命”。知识分子、无党派人士、大部分城市居民也支持“白色革命”。此外,支持“白色革命”的胡韦达首相的新伊朗党,在一九六七年八月的总选举中,赢得了压倒的胜利。议会决定十月二十六日为举行加冕式的日子。国王同意了。

那一天,举国祝贺。从“投身于苦难之海”的日子算来,已经经过二十六年了。加冕式是在德黑兰的高垒斯坦宫的“镜室”举行的。戴着镶嵌一千一百四十四克拉、三千三百八十颗金刚钻的王冠的国王,在具有历史意义的演讲中,发表了打破二千五百年波斯王制传统的消息:“现在,在世界最古的我国王制的历史中,第一次给王妃举行加冕。”据此,今后如果国王发生万一,王储礼萨·居鲁士还没有达到成年时,给予法拉王妃以第一个女性摄政的权限。这件事,正表现出是“白色革命”中实施妇女参政,提高妇女地位的国王新创意。在加冕式中显示出来的国王的自信和喜悦,在一九七一年十月庆祝居鲁士大帝即位二千五百周年时,可以显著地看出来。

波斯帝国和法国菜

二千五百周年庆祝,是纪念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始祖居鲁士大帝即位的大典。居鲁士大帝是建立从地中海东部到印度、中国边境、历史上最早的大帝国——波斯帝国的创建人。计划举行这个庆祝二千五百周年纪念大典、并亲自进行指挥的就是礼萨·巴列维国王。这件事,可以看出他向往于不同寻常的波斯帝国。实际上,这一点也正是研究他这个人及其战略的关

键所在。他的自传的第一章，题目就叫做“我们的祖国。古代和现代”，完全反映了他对波斯帝国的自豪感，以及他自己想把居鲁士大帝的伟业在现代也继续下去的抱负。下面，就引用其内容的一部分吧。

“我想大部分读者都知道罗马史的。我们帝国在公元前的几个世纪中就比罗马帝国兴隆，最初表示出能够领导广大地域的，就是我们波斯人。……诚然，曾经存在过埃及、苏美尔、巴比伦、中国，以及其他一切王国，但它们都不曾发明过统治帝国所必要的、迅速的交通和通讯手段。

“居鲁士大帝所建设的帝国，并不把它的基础放在领土的获得，而放在国际的宽容和理解。……我发现在我们最早的帝国中，已经有类似于二千五百年后的国际联合的精神。

“纪元前三三一年，波斯被亚历山大所征服，在他死后，武将塞琉哥支配了波斯。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希腊的占领，但实质上并不如此。因为征服者们吸收了波斯的风俗习惯；依靠波斯人的行政官；同波斯女人结婚；最后被波斯文化所同化了。

“纪元后六四一年，波斯军同阿拉伯一战而败北。但是，阿拉伯人同过去的征服者一样，同样不能挫伤波斯人的精神。虽然琐罗亚斯德教（即祆教，也译拜火教或波斯教——译注）衰微了，但在其他方面，波斯文化却征服了阿拉伯人。由于波斯文化的优秀，波斯人的行政官、学者、工匠们依然继续受雇于阿拉伯人。就是在宗教方面，波斯人也没有完全被征服。波斯人所采用的是十叶派，同伊斯兰教主流的逊尼派是不同的。十叶派最早的哈里发（伊斯兰教中称穆罕默德的继承者为哈里发——译注），是穆罕默德的女婿阿里；阿里的儿子，是同被阿拉伯人赶出去的波斯王的女儿结婚的。……阿拉伯人支配了波斯六百年，实际不过二百年，像迦嗣那王朝，事实上是一个独立帝国。

“十八世纪末出现的卡查尔王朝，由于允许英俄帝国主义的干涉内政，不能抓住科学和产业革命的时代精神，终致于失败。父亲礼萨·汗抓住这个精神，在伊朗实行了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革命。

“……我想把我国的古代和现代用新的调和形式混合起来。不，我的希望还要大一点。我国的文化，不论是人种方面，语言学方面，都同西洋文化保有密切的关系，而且是一直继续到现在的世界上最古的文化。西洋文化很多是从我国过去的，现在，我们是要把这些文化向我国倒进口，因而，我们打算能够像过去一样地为东西方世界的溶合再贡献一点力量，那不会是无理的吧。我们国家，不单单是在地理上位于世界的接触点上。”

庆祝二千五百周年的大典，仿佛战前日本在举行“神武天皇二千六百年祭”时那样的气氛中进行的。我作为一个记者，也被邀请参加了庆祝大典，得到了一个观察的机会。印象最深的就是在南部的遗迹柏夕波里斯（古波斯帝国之都，纪元前三百三十年为亚历山大军队所破坏，其废墟已为考古学家所发掘，地在今伊朗设拉子附近——译注）所举行的阅兵式。那次阅兵行列，活象展示了一卷光彩夺目的、从古代波斯帝国到现代的连环画幅，展出了波斯军备的变迁，古代战车的模型，身穿甲冑等古代军装的军团，按时代排下来，最后的现代部分是以飒爽的、步伐整齐的女兵行列结束。这使人感到，在国王要显示出强国伊朗的那种傲慢态度以前，首先要人注意的就是，伊朗那种勇往直前的、漂亮的雄心。但是，招待世界元首级的晚宴，却出人意外地是以巴黎请来的高级厨师所做的法国菜为中心。这也就是自传中所说的和西洋文化的联系吧，对于国王来说，这并没有什么矛盾。

以石油为武器

在举行加冕式的一九六七年到举行二千五百周年庆祝大典之间，也发生了显示伊朗国力的大事件。那就是一九七一年二月的德黑兰协定。德黑兰协定是石油输出国组织和国际石油资本交涉的结果，把每桶原油公定价格一次提高了三十五美分，取得划时代的成果。这个协定，也明白地反映出七十年代的国际石油输出国组织在石油问题上的重要地位，而其推动力则为伊朗国王。在国内，石油生产由一九六八年的一亿四千一百五十万吨增加到一九七一年的二亿二千七百三十万吨，石油收入也相应地由八亿一千七百万美元增加为十八亿七千万美元。从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〇年，经济平均增长率接近百分之十。伊朗的国力也日益充实了。

但是，在举行二千五百周年庆祝大典时，伊朗似乎还只是处于自鸣得意的地位。尽管那时伊朗确实已成为强国，但向全世界元首发出生请柬后，大国首脑都没有参加，日本也只是由三笠宫出席参加。但是，现在不同了。一九七三年十月，因中东战争运用了石油战略，以此为转折点，在石油价格上涨四倍的基础上，今后将获得天文数字收入的这个国家的动向，下列两点不能不引起国际的关心。

一、这个巨额石油收入的获得，会怎样反作用于伊朗国王的雄心呢？

二、隔着世界重大石油供应路线的波斯湾，面对阿拉伯世界的伊朗，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特别是同沙特阿拉伯、伊拉克的关系，将会怎样呢？

以下，就以这两点为中心，考察一下伊朗和世界的问题吧。

曾经依靠国民的支持和他自己的好胜心，统治着伊朗的国王，现在已经拥有由石油收入保证的强大经济力和军备了。伊朗的石油收入，一九七四年度（一九七五年三月止）估计约有一百五十亿美元。在一九七四年中，从美国买进了将近四十亿美元的武器，成了美国最大的武器购买国。当前，这是适合美国对波斯湾的策略的。“在一代（三十年）之内，伊朗将成为世界五大国之一”，这是国王经常的口头禅。他指望依靠“白色革命”来提高人民的经济力量、文化程度和强化军备，那是明白无疑的，只是还不怎么具体化而已。

尽管伊朗被别人军事征服过，可是，他对绵延二千五百年的民族文化却感到自豪；过去，他对英俄两大国的任意摆布感到恼火；现在，他也好像不顺从美国似的，做了提高四倍石油价格的急先锋；此外，他统制着新闻，规定最少要隔日登载一版王室记事；他公然承认萨瓦克这个监视人民的机构的存在，并使之合法化等等。这些充满着自尊心和自负的言行，与其说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毋宁说是一种帝王的姿态。他欢喜座谈，但爱独断独行。对人民虽施善政，但集中国家最高权限于他一人。凡是不听话的大臣、军人、反政府的活动分子，就无情地加以罢免或镇压。凡是同前王朝有密切关系的既成势力，就断然加以剪除。他把国家的命运引为自身的命运，熬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把一个无名的沙漠之国，建成到现在这个地步。就是这一些，也是他所保有的孤高姿态吧。

他热爱居鲁士大帝。在伊朗人所持有的护照上，用法文写着伊朗帝国。伊朗不是“王国”，而是“帝国”。居鲁士大帝建立了大帝国，但尊重其统治下各种民族的风俗习惯，允许他们自治。伊朗同一切国家，不问意识形态如何，都保持友好关系，展开着全面的外交，但它也并不隐瞒，一旦必要时，伊朗在它认为

是自己的势力范围以内，也准备采取警察行动。譬如，国王就这样说过：“我们国家已再三声明，要推进波斯湾地区的合作。但是，不仅我们国家，无论哪个国家，如果不拥有确保地区安定的手段时，我们国家就采取措施。”

去年，国王访问印度、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新西兰，讨论了经济合作问题。在印度时，关于印度洋问题，他说：“印度洋沿岸国家应该结成军事同盟，巡视印度洋水域，把美苏的舰队赶出去。”从这段话，就可以看出他的抱负了。他一面推进全面外交，如果可能的话，还力图把伊朗推上成为其中的盟主或领导国家——做着向往居鲁士大帝帝国的现代梦。说实在的，是想做包括波斯湾在内的印度洋盟主。这就是指望成为大国的现在伊朗国王的雄心。

国王啊，何处去

现在，伊朗同沙特阿拉伯保持着友好关系。但是，一旦两国发生争夺波斯湾霸权时，恐怕胜利是属于伊朗的。不问从国力全面发展的可能性来讲，或者从两国现在人口三千万同七百余万的巨大差距来讲，都可以这样说。正如《新闻周刊》所说的，伊朗国王似乎已经自封为波斯湾的盟主了。证明这点的也有实际事例。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伊朗占领了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霍尔木兹海峡的三个小岛。阿拉伯国家提出了强烈的抗议，但结果并未抵抗。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能够通过超级油船，宽度是十二英里，阿拉伯国家如果要从这个岛阻碍通过波斯湾的油船是很容易的。由于占领了三个小岛，伊朗就得到了支配世界生命线之一的据点，掌握了成为波斯湾盟主的前提。

伊朗现在最担心的是阿曼南部“阿曼人民解放阵线”的动向。如果这一阵线再往北进，霍尔木兹海峡就有危险。伊朗接受阿曼的请求，出兵阿曼，两国联合对该阵线进行了作战，正在取得成功。但若万一失败，发生阿曼赤化的事态，那就会成为对伊朗领导权的严重挑战。

伊朗在波斯湾，还有伊拉克这另一个挑战者。两国间不仅有国境河川所有权的争议，又有因意识形态不同而来的内政干涉问题。两国对立的根子是很深的。最近由于苏联加强了对伊拉克的军事援助，使伊朗更加提心吊胆。目前伊朗对于以色列，在石油供给方面采取了友好措施，目的是为了要同以色列保持密切的联系，适时地把伊拉克的目光移向以色列。

在第四次中东战争前，伊朗同阿拉伯国家之间，只有约旦和摩洛哥是比较友好的。但到战后，由于阿拉伯世界一般都由稳健派所领导，关系也就改善了。上月，国王访问埃及、叙利亚和约旦期间，除提出经济援助以外，还表明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阿拉伯世界对伊朗这个过分友好的姿态，莫不感到惊奇。除约旦另作别论，国王还向埃及提供战斗机，而埃及和叙利亚都是所谓阿拉伯的进步派。由此可见，伊朗的态度是突变了。据说，伊朗同阿拉伯世界的接近，交换条件是要求它们出来调停伊朗和伊拉克的关系。假如这个根深蒂固的问题能够解决，恐怕苏联对波斯湾的影响力就将大大削弱。不过，当前美国正在通过加强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的军备，强化对波斯湾的影响时，恐怕还不容易发生那样的事吧。

总之，伊朗的突然乘机转变，据阿拉伯看来，是基于以下这个深谋远虑的：在第四次中东战争后，阿拉伯世界的地位已经提高，所以在尽可能广泛的范围内，同阿拉伯世界保持共同的地位，对伊朗较为有利。这样可以强化石油输出国组织，加强对伊

斯兰教圈的影响力,为此,不惜冒同以色列关系恶化的风险。

只要看穿了伊朗国王是根深蒂固地抱有这样一种信念的,即“(伊朗)是雅利安人种,比阿拉伯更接近西洋文化”,那末,上述对于阿拉伯的这种看法,就会感到不太可信。因为从埃及向东,到除了沙特阿拉伯以外的波斯湾地区,曾经是古代波斯的一部分。因此,决不能说伊朗国王不抱有把他的领导权扩及到整个阿拉伯世界的雄心吧。

对于一心想富国强兵,铺平走向世界强国道路的伊朗国王,毋宁说,也有各种各样的批评和恐惧的。在国内,“白色革命”的目标虽然正在完成,但是还缺乏有能力的技术人员,教师也还不足。此外,知识分子对于国王的独裁行政,反感也很强烈;到国外留学而不归国的学生也很多。所以,也有人这样批评国王的:“日本搞了一百年的事情,想在二十五年里搞好!”一九七三年以来的加强军备,虽然以迅猛的步调前进,但不能断定国内的这种不满和不平会不会发展到军队的政变。在美国的政府内部,有人把国王称为“不久要甩开美国的怪物”、“夸大妄想的狂人”、“暴君”,但也有把他评价为“对共产主义的中东防波堤”的。尽管有形形色色的评价,但至少没有人叫他是民主主义者的。

我们现在来如实地评价一下国王吧。他在实施“白色革命”时说过:“我国需要的革命,是我领导的。”这是国王自己想出来的革命,成败的责任都由他负。而国王也在积极地担负着责任。无论国防或外交,一切都由他作主负责。国王也说过:“我们除自己以外,什么人也不依赖。”“我不接受任何人的指令。”这是从他作为国王的亲身体会中流露出来的话。他将继续走他自己信奉的道路,他对他自己是国王这一点,也是深信无疑的。

(摘译自一九七五年四月特大号日本《中央公论》杂志
孙怀仁译)

“《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

据苏修《真理报》等报刊报道：苏联政治书籍出版社在最近出版了第五版的《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该卷书由苏修中央马列主义学院编辑，主编者是A·Γ·叶戈罗夫和Π·Н·费多谢耶夫。在书中共收集了五百篇左右的文章、讲话、书信、电报、笔记、札记和其他材料。

据报道，这些文献是从各个方面收集起来的，其中有些是从苏联党和国家的档案库中新近“发现”的，有些是个人“赠送”的，有些是从苏联和国外私人那儿“买来”的，有些是由各国政府“转交”，有些是在期刊中“发现”的。期刊中的那些材料原不署名，或者署的是至今还不为大家所知的假名。据说，经过“专家”的“研究”才确定了它们的“可靠性”。

卷首的一篇是读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一八五〇年）的笔记和其他一些材料。其他如，《纪念马克思逝世三十周年文章的提纲草稿》，《俄国党内斗争的历史意义》一文的提纲，为《马克思主义和取消派》一文而准备的材料，《致中央委员会俄国局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的信，给工农检查部副人民委员B·A·阿瓦涅索夫的两封信，以及一九二〇年三月十三日在俄罗斯共产党（布）莫斯科省第十七次代表会议上所作报告的速记记录。

在第三十八卷中，有一个材料的题目是：《事情的叙述。有争执款项的起源》。据报道，材料的主要内容是，莫斯科社会民主党党员施密特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中被捕，死于监狱。临死的时候他把自己的财产遗赠给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一〇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一月全体会议上，布尔什维克同意把属于他们的款项移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公用，条件是孟什维克也要这样做并停止分裂活动。为了进行监督，曾指定了三个“掌管人”（即仲裁人）——考茨基、梅林和蔡特金。后来，因为孟什维克违反中央委

员会全体会议的决议,继续出版自己派别主义的机关报,保持“自己”的现金,拒绝协助在俄国和在国外的党中央,列宁就向“掌管人”提出把钱归还给合法占有者布尔什维克的要求。当要求遭到拒绝后,他认为可以把这个问题提交给民事法庭解决,所以写信给社会党人律师 K·茨格拉根、久科·德·拉·埃依等。材料说,列宁曾就这件事指出,这场冲突的背后是一场布尔什维克为保卫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政党而展开的原则性斗争。这篇材料是几年前从法国律师久科·德·拉·埃依那儿“买来”的。

(复旦大学外语系工农兵学员 于国畔)